

大兴安岭南麓连片特困区及周边贫困县 农村金融能力分析报告

2017年8月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Visa 公司

编委会：

杨子强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贝多广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孙杰光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王东 Visa 公司

报告主要编写人员：

莫秀根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耿传辉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岳杨祺 Visa 公司

报告参与编写人员：

闫爽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任春玲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张传娜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张文娟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张亦淮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胡璇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杨燕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张晓峰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彭雪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摘要

本报告基于对大兴安岭南麓连片特困区及周边贫困县的一项基线调查数据，分析普惠金融特别是金融能力的现状，探讨影响金融能力的各种因素，讨论金融能力与改善生活、扶贫之间的关系，提出通过金融教育，提高金融能力的建议。

普惠金融已成为当前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手段，金融扶贫也成为国家扶贫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各大金融机构纷纷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或农村金融部门；金融科技公司利用技术优势，迅速占领广大城市消费客群。然而，在大兴安岭南麓连片特困区这样经济相对滞后的地区，无论是传统或者是新兴的金融机构，其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提升，市场竞争不充分。

长期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加速，大多数金融机构具有向城市聚集的趋势。为了平衡发展，政府采取相关措施，着力提升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得贫困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很大改善。例如在每个乡镇至少设立一家银行的分支机构，在每个自然村设有助农取款点(或金融综合服务站)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政府对补贴发放实行数字化的举措大大提高了贫困地区银行账户的持有率。

分析发现，相对于金融基础设施，贫困地区的金融能力较为滞后，成为当前影响金融扶贫效果的关键制约因素。造成金融能力滞

后的局面，与个人及家庭的金融素养、金融行为和金融偏好有关，也受到政府的政策导向、教育体制、以及金融机构缺位等因素的影响。

除了受到诸如金融基础设施相对滞后，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外部金融环境的制约外，一些内在的因素也导致贫困人口不能有效地利用金融服务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分析发现，贫困人口由于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限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少，融资金额小。加上自身的主动性不足，拉大了使用金融服务的差距。特别是在数字化的背景下，贫困人口面临着数字鸿沟与普惠金融鸿沟的双重挑战。

基于此，本报告认为，金融扶贫应立足于解决制约金融能力发展的内部与外部因素，并通过金融教育提升贫困人口对数字金融服务的使用能力。

目录

一、 地区基本情况	4
(一) 大兴安岭南麓连片特困区整体情况介绍	4
(二) 政策背景与改革亮点	15
二、 研究方法 with 样本描述	19
(一) 数据来源	19
(二) 受访者基本情况	20
三、 金融能力分析	25
(一) 可支配收入水平较低, 制约了金融能力的提高	26
(二) 投资理财: 收入高的家庭拥有银行存款比例高, 理财受个体特征影响大	30
(三) 片区家庭融资能力较弱, 主要受制于抵押担保不足, 信用记录缺乏及融资渠道单一等因素, 服务质量也存在地区差异	35
(四) 家庭风险管理意识比较淡薄, 个体特征对风险管理决策影响较大	45
(五) 数字账户与支付: 相比于基础设施的相对滞后, 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能力, 增加数字金融服务的使用率更加迫切	52
(六) 金融教育供给不足是影响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提升的重要原因	71
四、 金融能力的影响	81
五、 金融能力与贫困	97
六、 结论与建议	107
案例集	113

在长期的扶贫实践中，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金融在扶贫开发中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其目的就是让弱势群体有更多的机会获得金融服务。普惠金融发展涉及到金融市场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同时因为市场失灵的原因，政府也需要发挥相应的作用。要达到金融普惠的目标，需要金融服务的供给方、需求方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看，普惠金融属于采用金融手段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发展。金融手段避免了救济式扶贫的弱点，更强调提高弱势群体的生产能力和效率，即在增加货币资本投入的同时，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增加其生产和生活的可持续性。也就是说，在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要着力于提高金融消费者的金融能力。金融能力

(financial capability, Johnson et al, 2007) 常常包含金融知识、技能、自信心与动机等方面的内容。

2016年1月，由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发起、Visa公司独家赞助、以推动东北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和减少贫困为宗旨，在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建设“中国普惠金融教育‘金惠工程’国际示范区项目”。该项目是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主导的公益项目，是“金惠工程”开展以来，资源投入最多且涵盖子项目最全的专项项目区。项目通过开展调研、能力建设、金融教育与倡导，全方位、系统性地推进片区金融能力建设，从而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项目将于2016年至2018年期间，在大兴安岭片区内的黑龙江省、吉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3省

(区) 33 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面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和培训活动，活动面向农民群众、基层领导干部、乡镇中学生、基层金融机构从业人员。项目自启动以来，已惠及 180 万农村居民与 3 万 6 千名基层干部。

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的 14 个贫困片区之一，包含黑龙江、内蒙古自治区、吉林 3 省区的 19 个县(见图 1)。“中国普惠金融教育‘金惠工程’国际示范区”不仅涵盖这个片区的所有县份，还包含了周边的部分国家级贫困县(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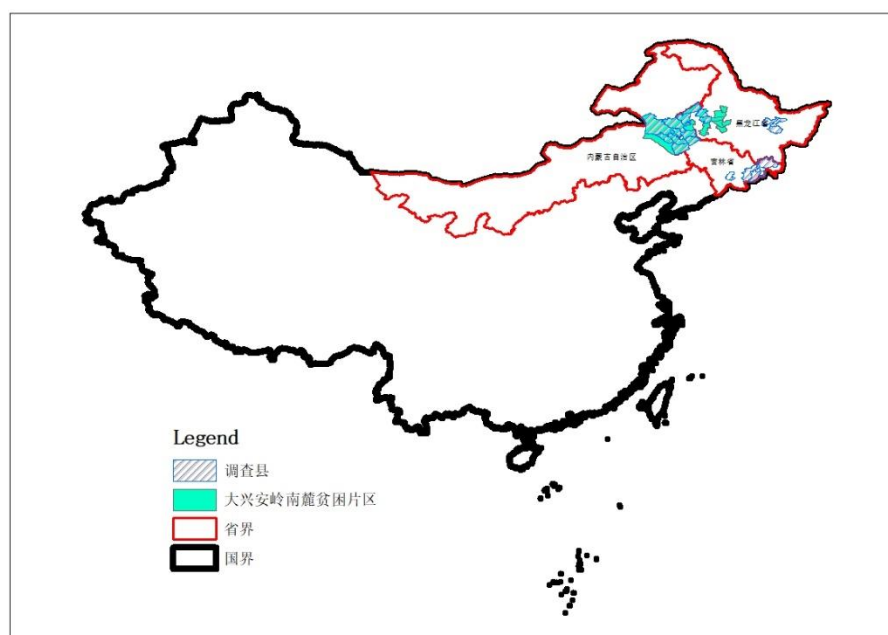


图 1 大兴安岭南麓连片贫困区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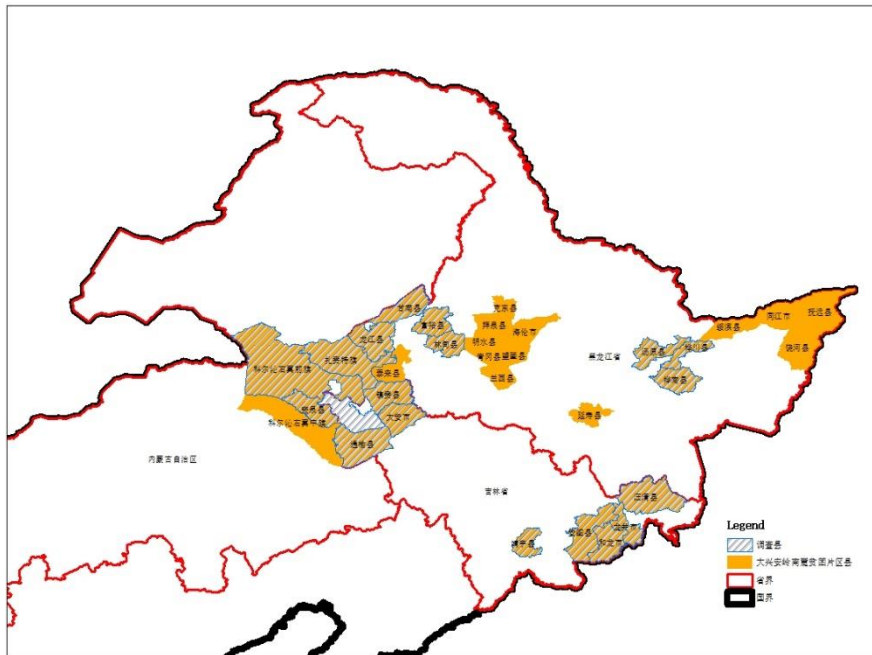


图 2 大兴安岭南麓片区规划区和基线调查区域分布图

作为金惠工程的重要内容，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受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委托，于 2016 年 6 月赴吉林和 2017 年 6 月赴黑龙江和内蒙古 3 省/自治区 18 个国家级贫困县和 1 个省级贫困县开展基线调研¹。基线调研对农村住户进行问卷和访谈，分别形成了吉林 1258 份和黑龙江和内蒙古 1752 份有效问卷。在对问卷数据的编码

¹问卷调查由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统筹组织，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具体实施。在问卷设计过程中得到中国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院与 Visa 公司的指导，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长春中心支行、兴安盟中心支行、延边州中心支行、白城市中心支行、佳木斯市中心支行、齐齐哈尔市中心支行、大庆市中心支行、龙井市支行、和龙市支行、汪清县支行、安图市支行、靖宇县支行、大安市支行、镇赉县支行、通榆县支行、桦川县支行、桦南县支行、汤原县支行、林甸县支行、富裕县支行、甘南县支行、龙江县支行、突泉县支行、科尔沁右翼前旗支行、扎赉特旗支行、洮南市支行以及各级农信社、农商行等机构的大力支持。

¹长春金专金惠工程调查项目领导小组：

组长：孙杰光、张炳辉

副组长：张杰、赵剑辉、张晓晖、张炳钦、于金欢

组员：吕鹰飞、赵明、韩国薇、王文娟、徐丽、高同彪、陈廷勇、任宝权、耿传辉、徐东、沈军、刘净彤、殷树友、徐巧月、任春玲

执笔人：耿传辉、任春玲、张文娟、张亦滩、张传娜、胡璇、杨燕

和清理的基础上，我们对大兴安岭南麓连片特困区(包含周边贫困县，下同)农村金融能力进行深入分析。分析结果证明，相对于金融基础设施，农村金融能力发展相对滞后，是农村金融扶贫发挥作用的主要阻碍因素。针对贫困片区，政府需要动员金融机构、社会和政府的资源和力量，加大贫困地区金融能力建设的力度，增加金融扶贫的效果，使扶贫的效果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报告将首先对大兴安岭南麓连片特困区的社会经济、金融现状和改革进行分析；然后在第二节对问卷数据进行综合描述；第三节分析片区农村的金融能力；第四节分析金融知识可能对农户产生的影响；第五节讨论金融能力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第六节做出总结同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地区基本情况

本文所分析的大兴安岭南麓连片特困区共包括 33 个市县，其中包括黑龙江省 20 个贫困县，吉林省 8 个贫困县，内蒙古自治区 5 个贫困县。本节将首先就 33 个贫困县的一些基本经济数据介绍该片区的总体经济情况，其次根据选取的片区中的 4 个典型的贫困县的一些金融服务和互联网覆盖等情况进行介绍，管中窥豹，帮助读者了解该片区的基础金融服务情况。

(一) 大兴安岭南麓连片特困区整体情况介绍

1、片区整体经济情况介绍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城镇和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低于全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而通过表 2 内显示的 33 个片区县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贫困县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离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可见这 33 个县的经济状况还存在着很大的改善空间,人民生活水平目前暂未达到全国人民平均生活水平,扶贫任务还需要继续进行。

表 1 三省人均可支配收入

地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内蒙古	30594.1	10775.9
吉林	24900.9	11326.2
黑龙江	24202.6	11095.2
全国	31194.8	11421.7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6》国家统计局

表 2 大兴安岭南麓连片特困区各区县基本经济数据

地名	年末常住人口(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人均生产总值(元)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阿尔山市	6.8	168104	24627	22171	7906
科尔沁右翼前旗	29.6	966020	32625	20918	7881
科尔沁右翼中旗	24.8	634138	25534	20018	7325
扎赉特旗	38.9	898774	23100	20921	7803
突泉县	26.71	734116	27464	20382	7562
镇赉县	27.47	1355421	49333	18665	7221
通榆县	36.5	1198485	32835	18060	7282
大安市	39.81	1418453	35631	18365	6237
龙井市	16.56	389718	23534	18128	7381
和龙市	18.11	556015	30695	18135	7214
汪清县	22.91	664733	29015	18067	7146
安图县	20.68	682493	33003	18378	7183
靖宇县	14	686994	49071	18071	7085
龙江县	59.5	925872	15562	16147	11413
泰来县	31.28	452310	14460	15440	5860
甘南县	38.48	683503	17763	14959	5696
富裕县	28.96	666572	23013	19794	7484
克东县	28.78	393612.4	13676	14129	8854
拜泉县	57.41	931021	16216	15181	5950
林甸县	26.34	521177	19789	14148	6093
望奎县	45.86	735385	16035	15734	9593
兰西县	49.56	592821	11961	14075	6723
青冈县	51.39	578852	11264	14590	8195
明水县	34.35	609605	17744	14170	7602
延寿县	25.3	749173	29611	18245	6347
绥滨县	18.57	500785	26961	19007	4791
饶河县	14.22	497874	35021	20110	5318
桦南县	42.27	1157518	27384	20437	4657
桦川县	20.81	536289.6	25772	18320	5051
汤原县	24.86	794333.5	31956	19057	3921
抚远县	8.36	505208	60458	20928	3967
同江市	17.62	1072961	60908	19978	5885
海伦市	78.16	1239662	15861	17850	8422

数据来源：《内蒙古 2015 统计年鉴》 内蒙古统计局

《吉林省 2015 统计年鉴》 吉林省统计信息网

《黑龙江省 2015 统计年鉴》 黑龙江统计局

但是在片区内部，经济情况也不尽相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最高的县为龙江县，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和全国平均水平差不多的，但是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即使在贫困县中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也仅属于排名比较靠中间水平。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县为汤原县，仅为 3921 元，但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057 元）虽然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其在 33 个贫困县区中已经算是比较高的水平了。可见这 33 个县虽然都是贫困县，但是县域之间的经济情况存在着差异，我们在进行扶贫时也不应当一概而论，而应当结合每个县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政策进行扶贫。

2、片区整体金融情况介绍

表 3 所显示的是贫困片区中的 33 个贫困县的 2000 年和 2015 年的居民存款储蓄余额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人均值，并通过简单计算求出了这 16 年内该两项数据的年均增长率。我们可以发现，在这 33 个贫困县中，省与省之间，以及在省内不同的贫困县这 16 年的发展不尽相同。

而在各省市内部，首先看内蒙古的几个贫困县，我们可以发现内蒙古贫困县的存款增长速度基本是与全省平均的存款增长速度持平的，其中三个县的增长速度是大于全省的增长速度。而贷款增长率则全部低于省平均贷款增长率，说明资金向这几个贫困县流入的速度是低于流入全省其他县的速度。

其次我们看吉林省的数据，可以发现，吉林的贫困县的存款增长速度全部低于省平均贷款余额增长速度，而贷款增长速度来说，存

在两个县的贷款增长速度高于全省贷款余额增长速度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这两个县在过去十几年中吸收资金是比较多的，推测流入这两个县的投资会多一些。

最后看一下黑龙江省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黑龙江省贫困县的存款余额增长率是十分喜人的，证明这些贫困县居民的财富水平提高的还是比较快的，但是比较令人意外的一点是，即使黑龙江省均贷款余额增长率已经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了，但是在诸多贫困县中，除了3个贫困县的贷款余额增长率高于省均水平，其余贫困县的贷款增长率十分低，甚至有一个县出现了负值。

表 3 部分贫困县 2000 年与 2015 年存贷款余额

	人均城乡居民存款储蓄余额 (元)		人均城乡居民存款储蓄余额增长率	人均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元)		人均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长率
	2000年	2015年		2000年	2015年	
内蒙古自治区	3691.37	35840.06	16.36%	5339.46	68262.34	18.52%
阿尔山市	4117.11	30015.20	14.16%	6706.22	30014.20	10.51%
科尔沁右翼前旗	683.40	6625.52	16.35%	3609.61	12363.55	8.55%
科尔沁右翼中旗	675.79	8243.76	18.15%	4427.25	9569.80	5.27%
扎赉特旗	806.85	9609.74	17.96%	3386.85	16866.72	11.30%
突泉县	863.56	9751.25	17.54%	2725.02	10858.78	9.65%
吉林省	5769.57	35850.64	18.93%	10090.93	57109.46	12.25%
镇赉县	1793.72	18380.30	16.78%	5690.38	47980.81	15.27%
通榆县	1100.90	11046.30	16.62%	1537.16	14362.05	16.06%
大安市	2178.19	18114.71	15.17%	4786.67	28191.56	12.55%
龙井市	4558.58	34422.65	14.43%	7962.58	14411.24	4.03%
和龙市	5122.41	26393.56	11.55%	5925.09	23740.67	9.69%
汪清县	5568.77	30940.74	12.11%	5439.85	17721.17	8.19%
安图县	6695.36	34177.38	11.48%	6941.05	30004.81	10.25%
靖宇县	4990.28	23404.79	10.85%	5138.40	22254.21	10.27%
黑龙江省	10798.19	55663.43	11.55%	10188.21	42536.46	10.00%
龙江县	1279.45	9687.28	14.45%	3531.39	10230.02	7.35%
泰来县	1384.83	12111.29	15.55%	3384.68	10296.74	7.70%
甘南县	2457.99	17070.88	13.79%	3085.67	22419.00	14.13%
富裕县	2042.14	16945.10	15.15%	3735.72	9092.17	6.11%
克东县	1546.50	12224.66	14.78%	3039.96	10062.79	8.31%
拜泉县	1173.70	8774.98	14.35%	2101.34	6143.35	7.41%
林甸县	2143.46	17139.50	14.87%	3875.91	47590.42	18.20%
望奎县	1483.30	12606.80	15.33%	3798.48	5670.78	2.71%
兰西县	1367.72	10654.86	14.67%	3893.80	5888.22	2.80%
青冈县	1514.35	9855.76	13.30%	3240.89	5596.33	3.71%
明水县	1559.59	8208.94	11.71%	3939.88	6000.31	2.84%
延寿县	715.42	15729.12	22.88%	6013.08	10318.72	3.67%
绥滨县	3675.86	35676.92	16.36%	19678.28	18546.15	-0.39%
饶河县	6668.24	53792.71	14.93%	21922.43	30363.86	2.20%
桦南县	2409.29	12002.90	11.30%	3825.34	5978.88	3.02%
桦川县	2436.77	15014.30	12.89%	6820.80	61609.65	15.80%
汤原县	2847.41	18985.84	13.48%	5337.81	17705.24	8.32%
抚远县	5781.22	34904.33	12.73%	12128.57	24468.44	4.79%
同江市	4075.00	31840.36	14.69%	21012.50	60879.18	7.35%
海伦市	1650.00	11393.90	13.75%	3722.81	15862.59	10.15%

数据来源：《内蒙古 2015 统计年鉴》 内蒙古统计局

《吉林省 2015 统计年鉴》 吉林省统计信息网

《黑龙江省 2015 统计年鉴》 黑龙江统计局

表 4 反映的是我们在这次活动中所抽样调查县的各种金融服务类机构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基本各类金融机构在这 18 个县内都是可以找到的，但是数量相较于全国是偏少的，以 ATM 机和 POS 机举例，全国每万人均 POS 机、ATM 机数量分别为 182.63 和 6.8 台，贫困县和全国的均值水平差距还比较大，可见贫困片区的金融服务相较于全国还存在劣势。

表 4 抽样县市金融服务情况

县(市)	5、保险网点数量(家)	银行网点数量(家)	类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家)	ATM机数量(台)	万人均ATM机数量(台/万人)	POS机数量(台)	万人均POS机数量(台/万人)
吉林省							
龙井	4	8	0	52	2.74	100	5.26
和龙	13	7	3	72	4.00	383	21.28
安图	2	11	4	97	4.85	962	48.10
汪清	4	50	2	64	2.78	781	33.96
靖宇	7	38	19	56	4.00	291	20.79
大安	17	65	8	125	3.21	1398	35.85
镇赉	15	45	56	100	3.70	563	20.85
通榆	15	44	15	83	2.31	509	14.14
黑龙江省							
龙江	13	56	3	45	0.75	438	7.30
甘南	14	33	4	47	1.27	856	23.14
富裕	13	36	53	34	1.13	675	22.50
林甸	39	36	5	69	2.56	458	16.96
汤原	11	46	1	61	2.65	628	27.30
桦川	8	7	3	39	1.70	595	25.87
桦南	15	54	83	88	2.00	286	6.50
内蒙古自治区							
突泉	27	36	1	67	2.23	1429	47.63
科右前旗	17	7	2	26	0.65	813	20.33
扎赉特旗	14	45	5	80	2.00	491	12.28

数据截止时间：2017 年第一季度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注：类金融机构网点包括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租赁公司

等

3、以片区内四县为例分析贫困片区金融情况

在本段中，根据上述数据选取了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县进行分析。片区内贫困县的目前经济情况，首先选取了吉林省镇赉县、通榆县、大安市三个贫困县区，选取这三个县的原因是大安市整体经济情况看表 2 数据是十分可观的，第二表 3 中镇赉县的贷款余额增长率十分突出，而通榆县则是吉林省贫困县中比较穷的县，之所以选择同省进行分析，是因为同省的经济政策大体相同，笔者认为更具有比较意义。其次选取了黑龙江省的绥滨县，原因是表 3 中绥滨县的贷款余额增长率是唯一一个出现负值的。

(1) 以吉林省镇赉县、通榆县、大安市为例分析贫困区县域金融状况

从图 3 我们可以发现，从 2002 年到 2015 年，我们所选取的三个贫困县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在过去十几年中有了很大的上升，从 2002 年的人均 2000—3000 元到 2015 年一万多元，其中两个县人均存款余额达到了一万八千多元。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贫困县的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始终位于全省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下方，说明虽然贫困县居民的经济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距离全省的平均水平还有着一定的差距。而从图 4 我们可以看出和储蓄存款余额相似，贷款余额也存在着相似的趋势，该三县的贷款余额是有很大幅度的上升的，但是距离全省人均贷款余额还有一定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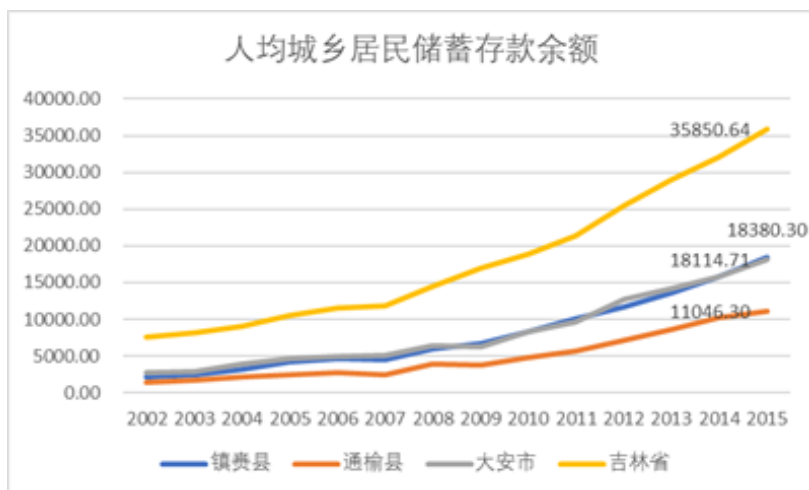


图3 三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单位: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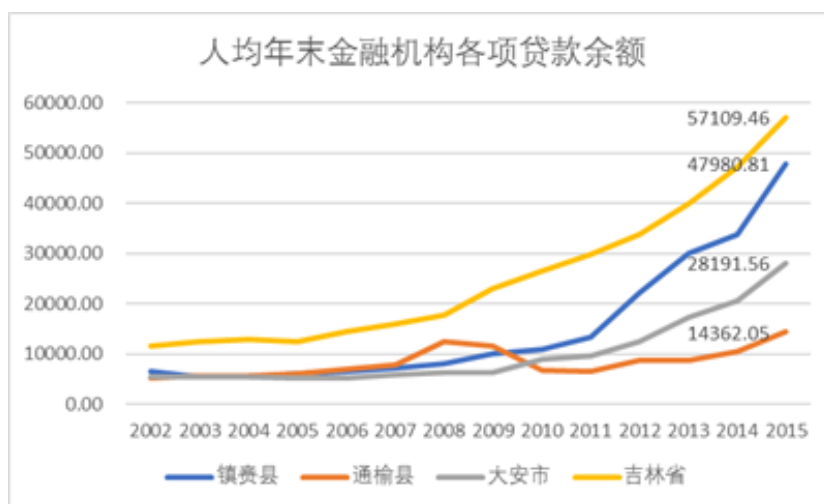


图4 三县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单位: 元)

同时，从图3和图4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不同的贫困县的发展状况也存在着区别。例如我们分析中所选择的通榆县，通过上图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通榆县无论是人均存款余额还是贷款余额在三个县中都是最低的，而且其人均存贷款余额的增长速度是慢于全省和其他两县的人均存贷款增长速度的，尤其是人均贷款余额，其与省人均贷款余额的比例从1:2扩大到1:4，说明贷款投入到该县的比例总

体处于一种下降的趋势，资金长期不流入到该县，长此以往该县的经济将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

而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分析中选取的镇赉县，从图 4 中我们可以看出，镇赉县的人均贷款余额增长速度十分迅速，从 2002 年县人均贷款余额比省人均贷款余额约 1: 1.8 到 2015 年 1:1.2，同时经过简单计算，镇赉县从 2002 年到 2015 年人均贷款余额增长了 6 倍多，而省人均贷款余额增长了不到 4 倍。可见虽然都属于片区内的贫困县，经济状况也都比较差，但是这些贫困县的发展速度是不一样的，依照此趋势发展，有一些县可能先一步脱贫，而另一些县则可能“贫困县”的帽子长期摘不下来。

表 5 三县互联网、保险投保的覆盖情况

	镇赉县		通榆县		大安市	
	2014	2015	2014	2015	2014	2015
年末总户数(万户)	12.64	12.61	15.27	15.18	17.4	17.17
年末总人口(万人)	27.54	27.41	36.68	36.43	40.46	40.08
年末农村人口(万人)	18.03	18.42	25.04	25.36	28.03	25.16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万元)	830843	833683	675092	797372	1062646	1248295
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万元)	441728	496268	376357	408713	646517	742703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万元)	944936	1295482	387082	531396	842967	1155854
固定电话用户(户)	25500	24719	29800	28990	60835	58754
移动电话用户(户)	269417	271302	345800	345990	95256	97363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户)	18647	21723	22897	24950	16235	1843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7203	18665	16347	18060	17004	1836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6508	7221	6636	7282	5790	6237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人)	24025	23754	17359	17753	34852	35810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人)	48026	48226	64992	63152	150178	83996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人)	15109	15182	14598	13718	15236	14311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人)	176483	167615	228608	232499	213521	207573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人)	83790	88946	94508	89201	102767	104310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人)	9621	9642	13900	13978	14057	13911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人)	22180	26128	18300	18300	32084	19495

数据来源：《吉林统计年鉴 2016》、《吉林统计年鉴 2015》吉林统计信息网

从表 5 我们可以看到在吉林省的 3 个片区特困区中，新农合医疗保险基本可以覆盖各县农村人口，医疗保险的覆盖是比较全面的。与之相比，新农合养老保险的覆盖率是很低的，不足农村人口的 50%，这可能和医疗保险给生活带来的好处更直观有关，加入新农合医疗保险之后，农民看病买药会报销一定比例，自己在看病就医这一方面的额外支出减少，可以实实在在在目前的生活中看到好处，所以十分受欢迎，投保率高，而养老保险因为是年老才给付保险金，不能在目前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所以可能农民的投保意愿不强，投保率是偏低的。

此外，从表 5 中我们还可以分析发现，移动电话的推广率是十分高的，几乎人手一台手机，这意味着我们在推广数字金融服务的时候，设备几乎不会造成太大难题，为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提供了便利条件。

(2) 以黑龙江省绥滨县为例分析贫困县金融情况

图 5 显示的是黑龙江省绥滨县自 2002 年至 2015 年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与人均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数据变化图，从图 4 我们已知绥滨县 2000 年至 2015 年人均贷款余额增长率为负，于是我们把他单独拿出他历年的数据制成图表，如图表所示，绥滨县的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一直保持着上升的趋势，但是其人均贷款余额始终在一万到两万两千之间波动。且 2015 年的人均贷款余额甚至低于 2002 年人均贷款余额。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象限，在分析时我们发现绥滨县人口数变化很小，一直保持在 13 万人口左右，而其农村人口

基本保持在 10 万人口关。由于人均存款余额是不断上升的，说明其实人民的财富水平其实是逐步提高的，但是由于贷款始终保持在很低的水平，意味着在此地投资比较少，大量存款外流，长期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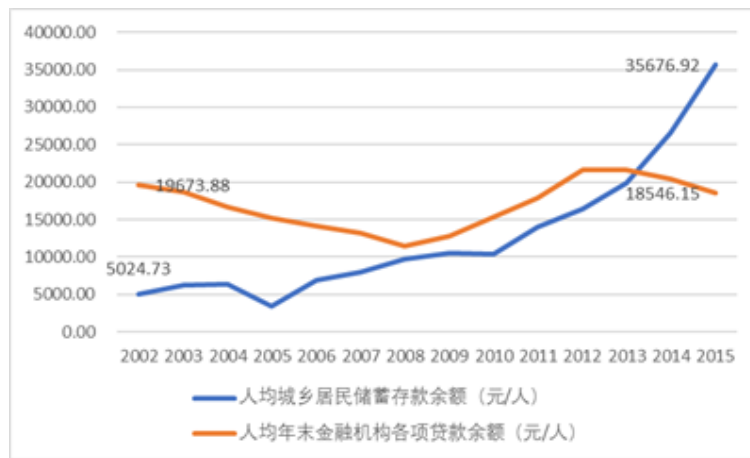


图 5 绥滨县历年人均存贷款变化图

数据来源《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2003~2016

(二) 政策背景与改革亮点

2013 年，国务院对《大兴安岭南麓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作出正式批复；2014 年，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印发了《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结合片区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等实际，人民银行三省（区）分行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市场化运作，积极推动扶贫开发各项金融服务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出台了黑龙江省为落实

《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关于促进全省农机具抵押贷款业务开展的指导意见》、《关于优先支持黑龙江省现代农机合作社规范社融资需求的通知》、《连片特困区金融服务工作规划》；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编制了《金融扶贫富民工程指导意见》和《大兴安岭南麓贫困片区（兴安盟）区域与发展与扶贫攻坚实施规划》；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制定了《金融扶贫攻坚总体意见》和《2014年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方案》。

以上政策的相继推出，增进了片区金融产品创新，提高了金融服务质量，提升了片区的协同效应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例如，在信贷产品创新层面，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紧紧抓住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这一重要契机，在大兴安岭南麓片区贫困县域积极拓宽“农村、农场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农机具抵押贷款”、“各类商品、货物仓单等多种组合联合增信贷款”、“信贷、保险、担保、合作社、协会、公司等多种组合联合增信贷款”“小企业联保贷款”、“支持住房类贷款”以及“农户联保、保证等其他类型贷款”等八大类、16种创新型金融业务。截至2014年6月末，新型贷款余额95.8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17.6%（谭伟、赵安，2015）。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利用支小再贷款，与内蒙古银行研发的“银行+公司+农户+贴息”的模式将央行支小再贷款资金3.7亿元专项用于兴安盟农牧产业化龙头企业、三农三牧等行业，重点支持了29户小微企业，利率较其银行平均利率水平低3.6个百分

点，为企业节约利息 0.13 亿元（谭伟、赵安，2015）。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创新推出的“惠农卡”、“公司+农户”、“林权抵押”、“动产抵押”、“承包权抵押”等金融产品 14 项，较好解决了农村因抵押品少而造成的“贷款难”问题。

吉林省与黑龙江省同属我国粮食主产区，在两国施行的国家级农村金融改革对于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落实差异化的监管措施与货币信贷政策、发展普惠金融具有重要意义。2014 年 5 月，人民银行、发改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会同中央农办、财政部、农业部结合黑龙江省实际，制定并印发了《黑龙江省“两大平原”²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金融改革方案》。“两大平原”是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通过实施农村金融改革，目标在“两大平原”地区率先建立现代农业金融组织体系，探索现代农业发展的风险分担机制，构建金融支持现代农业的政策支持体系。

2015 年 12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印发《吉林省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方案》，吉林省成为全国第一个省级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田。而在此之前，吉林省一直努力通过金融的改革和创新，来推进农业现代化，参与了全国农村信用社改革、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和农业保险首批试点，首创了直补资金担保贷款、土地收益保证贷款等新型金融产品。吉林省总结农村金融改革的三大痛点为：增信手段少、融资成本

² 黑龙江两大平原指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

高、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不健全。因此，在吉林农村金改大框架中，创新设立了以“三支柱一市场”为核心的物权融资服务体系，即物权增信服务支柱、信息信用服务支柱、基础金融服务支柱和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流转市场。

2016年1月18日，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为我国普惠金融的推进确立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总体目标。该规划成为我国在普惠金融领域内制定的首个国家级战略纲要，旨在目标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建立多层次、广覆盖的普惠金融体系。规划中明确提出了金融服务应满足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需求，重点服务贫困人群、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群体、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国务院，2016）。规划从金融服务机构、产品创新、基础设施、法律法规、金融教育与消费者保护等方面提出发展路径与政策安排。

为贯彻落实规划精神，吉林省与内蒙古自治区结合实际，相继出台了省、自治区普惠金融发展五年规划。以保险为例，两省（区）在同时提出健全保险市场主体、扩大险种和覆盖面的基础上，内蒙古自治区目标进一步扩大农牧业政策性保险范围，力争把全区包括马铃薯、肉牛、肉羊、绒山羊等在内的主要农畜产品纳入保险补贴范围，并使农业保险参保农牧户覆盖率提升至95%以上。吉林省则强调围绕中小微企业需求创新保险产品，为高新技术型小微企业提供创新创业风险保障；在支农支弱层面创新保险业务，实现农业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和家庭财产保险全省全覆盖。此外，吉林省还鼓励农村各类有条

件的经济组织和地区吸引社会资本，开展互助保险试点。

二、 研究方法 with 样本描述

(一) 数据来源

本报告所使用的数据，除特别注明来源的以外，均取自于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委托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在大兴安岭南麓连片特困区开展的农村居民金融情况调查项目。

农村居民金融情况调查项目自 2016 年开始，已经开展了两轮调查。2016 年首轮调查采用三阶段分层抽样方法抽取了“金惠工程”国际示范区吉林省 8 个县的 1258 个样本，即第一阶段根据各贫困县所辖乡镇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确定调查乡镇，再在调查乡镇根据人口分布及经济发展状况抽取调查村，最后在调查村中随机抽取受访者。

2017 年第二轮调查对调查问卷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增加了关于金融培训、数字普惠金融及金融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问题。本次调研抽选了黑龙江省 20 个“金惠工程”国际示范区中的 7 个（其中 4 个属于大兴安岭南麓山区，3 个属于国定贫困县）、内蒙古自治区 5 个“金惠工程”国际示范区中的 3 个（均属于大兴安岭南麓山区），抽样方法为多阶段分层抽样，共获得了 1752 个有效样本。具体样本分布情况见表 6：

表 6 2016-2017 年度调查样本分布情况表

调查地点	分区	调查年度		总计
		2016	2017	
黑龙江省	——	0	1139	1139
大庆	——	0	166	166
林甸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0	166	166
佳木斯	——	0	478	478
桦川	国定贫困县	0	177	177
桦南	国定贫困县	0	147	147
汤原	国定贫困县	0	154	154
齐齐哈尔	——	0	495	495
富裕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0	151	151
甘南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0	173	173
龙江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0	171	171
吉林省	——	1258	122	1380
白城	——	485	122	607
大安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194	0	194
洮南	金专定向扶贫点	0	122	122
通榆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130	0	130
镇赉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161	0	161
白山	——	169	0	169
靖宇	国定贫困县	169	0	169
延边	——	604	0	604
安图	国定贫困县	85	0	85
和龙	国定贫困县	206	0	206
龙井	国定贫困县	102	0	102
汪清	国定贫困县	211	0	211
内蒙古自治区	——	0	491	491
兴安盟	——	0	491	491
科右前旗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0	171	171
突泉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0	173	173
扎赉特旗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0	147	147
总计	——	1258	1752	3010

(二) 受访者基本情况

通过查阅有关金融能力的文献,我们认为受访者的个人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及婚姻状况等)及家庭基

本情况（家庭人口数、未成年及老年人数、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等）都可能会影响其金融能力。受访者的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见）如表 7 和表 8。

表 7 受访者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表（分类变量表）

序号	类别	1	2	3	4	5	说明
1	性别	59.17 %	40.83 %	—	—	—	1. 男性 2. 女性
2	受教育程度	8.24%	37.21 %	40.76 %	10.70 %	3.09%	1. 不识字 2. 小学 3. 初中 4. 高中、职高和中专 5. 大学及以上
3	健康状况	42.40 %	28.39 %	19.50 %	8.42%	1.30%	1. 很好 2. 好 3. 一般 4. 不好 5. 非常不好
4	婚姻状况	90.72 %	1.86%	4.29%	3.13%	—	1. 已婚 2. 离异 3. 丧偶 4. 未婚
5	是否贫困户	23.80 %	76.20 %	—	—	—	1. 是 2. 否
6	是否加入合作社	19.47 %	80.53 %	—	—	—	1. 是 2. 否
7	职业	77.82 %	3.94%	4.38%	2.94%	10.92 %	1. 务农 2. 自主创业、经营个体或私营企业 3. 受雇于他人或单位 4. 在外打工 5. 其他 ³

表 8 受访者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表（数值变量表）

序号	类别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说明
8	年龄	15	95	50.47	12.98	
9	老年人比例	0	100%	28.38%	0.37	家庭中 60 岁以上老人占比
10	未成年人比例	0	75%	13.13%	0.17	家庭中未成年人占比
11	识字比例	0	100%	73.66%	0.35	家庭成员中识字比例
12	在校学生占比	0	75%	13.50%	0.17	家庭中在校学生比例
13	初中学历占比	0	100%	27.18%	0.31	家庭中初中学历人数占比
14	高中学历占比	0	100%	7.67%	0.17	家庭中高中学历人数占比
15	大学学历占比	0	100%	4.97%	0.14	家庭中大学学历人数占比

³ 其他：主要是无业人员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

16	研究生占比	0	40%	0.21%	0.03	家庭中研究生学历人数占比
17	家庭纯收入	-27800.00	2000000.00	42480.33	96033.64	
18	家庭总支出	13.00	5152000.00	53518.48	142873.46	
19	人均纯收入	-9266.67	666666.67	12879.04	30699.48	
20	人均支出	100.00	1288000.00	17700.37	46068.40	

从表 7 和表 8 可以看出：

1. 受访者男性多于女性，其中：男性比例为 59.17%，女性比例为 40.83%，略高于调查地区的男女比例（分别为 50.33%⁴，49.67%）；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及以下，占比达到 86.21%，且女性受教育程度比男性低，其中：过半数（54.84%）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男性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占比仅为 38.97%（见表 9）。

表 9 性别与受教育程度分布表

类别	性别比例	不识字	小学	初中	高中、职高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总体	——	8.24%	37.21%	40.76%	10.70%	3.09%
男	59.17%	4.94%	34.03%	44.13%	13.19%	3.71%
女	40.83%	13.02%	41.82%	35.88%	7.08%	2.20%

男女性别差异可能导致二者风险偏好显著不同，进而在金融活动中表现迥异。从受访者中男性多于女性，也可以看出男性与女性在面对选择时的行为是不同的。这背后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依然存在；二是由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不如男性，因此女性受到采访时倾向于逃避，选择让家里的男性来接受采访。

2. 年龄和健康状况直接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可能对金融能力

⁴ 数据来源：由《黑龙江省统计年鉴（2016）》、《内蒙古统计年鉴（2016）》和《吉林省统计年鉴（2016）》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有较大影响，尤其是对保险及理财决策影响可能较大。受访者平均年龄为 50.47 岁，表明受访人群以中老年为主（见图 6），这与当今农村青年或者在学校学习、或者进城打工，留下中老年人在农村生产生活的社会背景相一致；受访者的健康状况普遍较好，健康状况较好的受访者占比达到 70.70%，随着受访者年龄的增加，健康状况有恶化的趋势（见图 7）。

3. 受访者家庭需抚养人口比例较大，对提高金融能力也是一种制约。从表 8 可以看出，受访者家庭老年人平均占比为 28.38%，超过了四分之一，远超过全国老年人抚养比（14.3%⁵），表明农村家庭老龄化程度较高，也验证了受访者以中老年人为主的合理性。未成年人平均占比较低，仅为 13.13%，比全国少儿抚养比（22.6%⁶）低。家庭平均需抚养人口占比总计达到了 41.51%，家庭抚养负担较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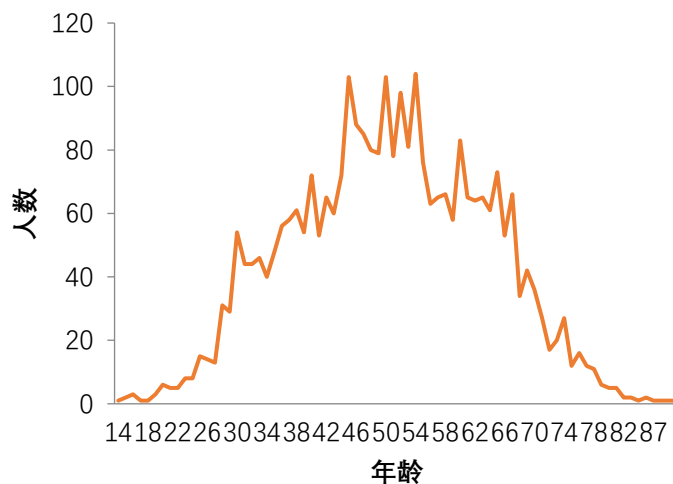


图 6 受访者年龄分布图

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⁶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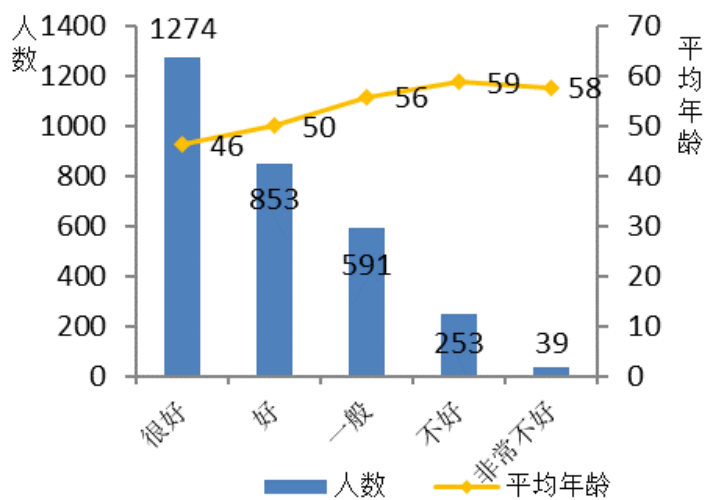


图 7 健康状况与年龄交叉分布图

4. 受访者家庭学历水平对家庭的金融决策与行为可能会有较大影响。从调查数据来看，受访者家庭中初中学历所占比重较大，为 27.18%，大学和研究生所占比重较小，分别为 4.97%和 0.21%。受访者家庭中，在校学生比例平均为 13.50%，略低于全国平均在校学生比例（15.37%⁷）。

5. 受访者的职业主要是务农，自主创业/经营个体或私营企业、受雇于他人或单位、在外打工的占比较小。其他职业主要是无业者及学生，还有部分靠出包土地为生的人。

6. 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是家庭金融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均纯收入直接影响家庭能够用于从事金融活动的资金量。本报告的收入为扣减了农业生产经营性成本的人均纯收入，从调查数据来看，人均纯

⁷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收入两极分化严重，从图 8 中具体来看：

受访者家庭上一年度人均纯收入最小值为—27800 元，最大值为 200 万元，平均水平为 42480.33 元，中位数为 20000 元；人均纯收入⁸最小值为—9266.67 元，最大值为 66.67 万元，平均水平为 12879.04 元，中位数为 5418.33 元。从人均收入分布曲线来看，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家庭人均年收入在 3000 元以下，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占比为 23.80%基本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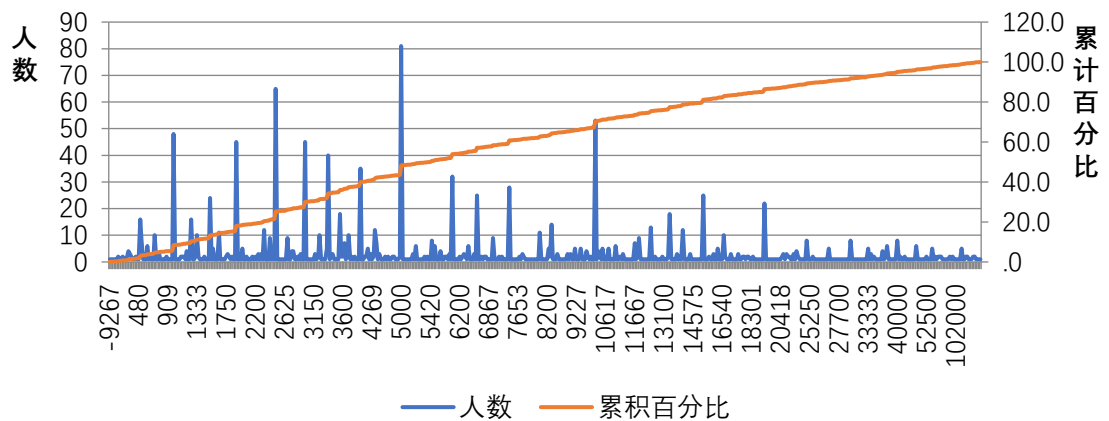


图 8 人均收入分布曲线

三、金融能力分析

当前，我国农村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户数的 48.45%⁹。了解农村家庭的金融活动，分析农民金融能力的具体情况，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推动农村家庭参与金融活动，有效地利用普惠金融体系为其增加收入。

农村居民作为金融服务的消费者，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用金融服

⁸ 由于 2017 年第二轮调查才开始调查家庭人口数，因此人均纯收入是基于 2017 年的 1752 个样本

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务使家庭收入得到提高，改善生活水平。为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对家庭的收入、支出进行规划，合理使用融资扩大生产，利用储蓄及其他投资工具进行理财，以及使用保险等工具进行风险管理。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消费者掌握相关的金融知识、技能以及对待金融服务的态度改善及基于最优决策的最终金融行为，也就是农村居民自身要具备一定的“金融能力”，另一方面还需要有外在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及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这两方面的结合，才能使金融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农村居民的金融能力将直接影响到扶贫开发最终效果。

本报告对片区农村居民金融能力的分析将围绕这两方面，也即农民自身的金融能力及外部金融基础设施及服务质量等影响因素展开，针对家庭主要的金融行为，如收入支出管理、融资、投资理财、家庭资产风险管理等进行分析。由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及金融教育在未来会对农村居民的金融能力起到重要影响，本报告也将进行详细分析。

(一)人均纯收入水平较低，制约了金融能力的提高

1.人均纯收入分布差异明显

家庭收入是进行投资理财、融资、风险管理等金融行为的基础，因此分析农村居民的收入、消费水平与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在随后对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可以观察到，收入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的各类金融决策。为此，我们将先就片区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进行考察。

从调查数据来看，调查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较低，分化严重。

如上文所述，受访者家庭上一年度人均纯收入从 27800 元到 200 万元之间；家庭人均人均纯收入从 9266.67 元 66.67 万元之间，分化非常严重。而且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均纯收入在 3000 元以下，贫困人口比例非常高。

家庭收入仍以农业收入为主。农业是片区农村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平均占家庭收入的 62.90%；其次是工资性收入，平均占家庭总收入的 12.53%；转移性收入也是农村家庭收入比较重要的来源，平均占家庭总收入的 7.23%；工商业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比重比较小，分别为 6.63%和 5.40%（见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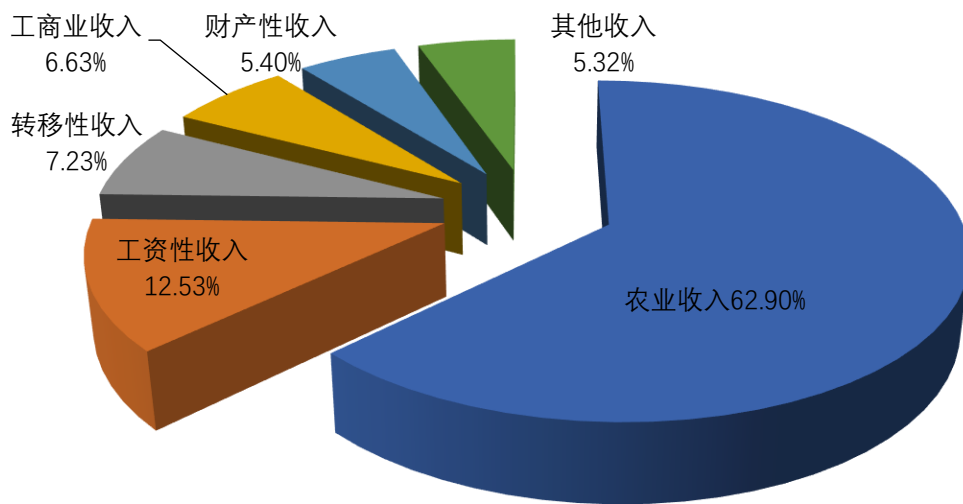


图 9 家庭收入构成情况

家庭消费支出以日常消费为主。受访者家庭上一年度消费支出最小值为 15 元，最大值为 23 万元，平均水平为 25016.16 元；人均消费支出最小值 15 元，最大值 10.1 万元，平均水平为 8016.71 元。

从家庭消费支出构成来看（见图 10），日常消费支出所占比例最大，约为 52.15%；教育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分列第二和第三位，占比

为别为 18.64%和 17.68%；养老支出和交通支出占比相对较小，分别为 4.23%和 3.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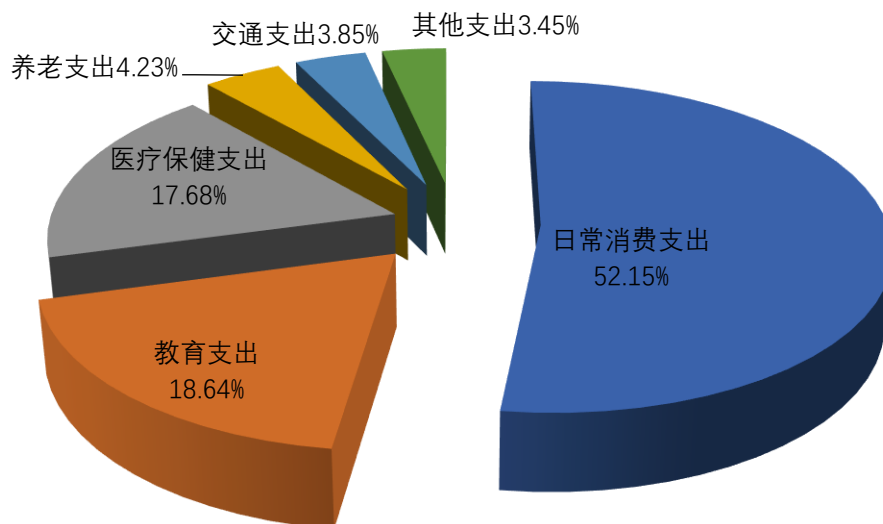


图 10 家庭消费支出构成情况图

多数家庭收入扣除支出后有结余。通过对数据的分析还可以发现，受访家庭中上一年度有 17.23%的家庭结余为负数，2.62%的家庭收支平衡，80.15%的家庭有正的结余（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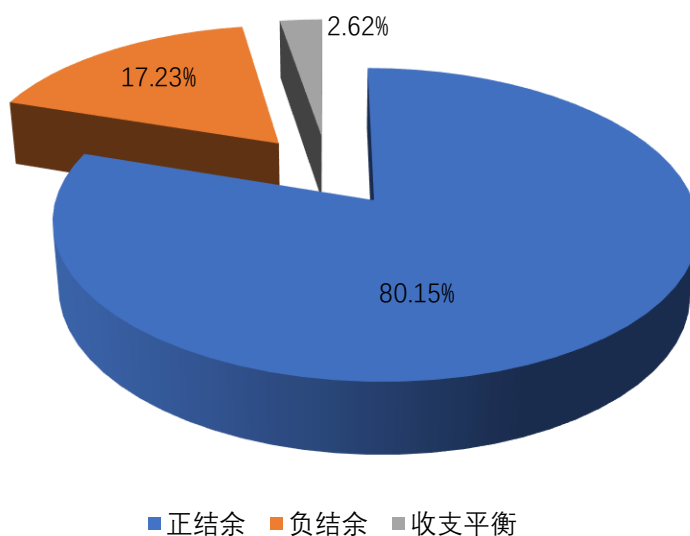


图 11 家庭结余情况图

2. 加入农村合作社的农户收入水平要高于未加入合作社的。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加入农村合作社的农户收入水平要高于未参加合作社的居民。有 33.11% 加入农村合作社的农民年收入在 5 万元以上，而未加入合作社的，仅有 15.06% 年收入在 5 万元以上（见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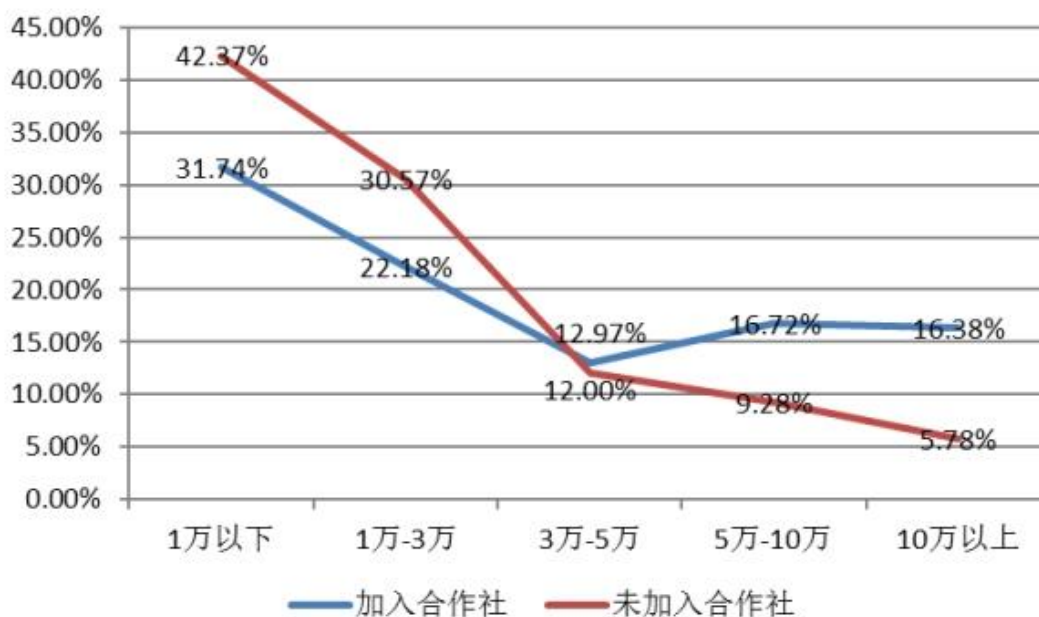


图 12 加入合作社与未加入合作社的收入对比

从这组数据中不能得出加入合作社就一定会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但至少说明这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关性。而且加入合作社对农民而言，除去生产互助外，还有其他的好处，其中之一就是组织性会更加好。比如参加集体农业技能培训，金融知识培训，甚至成立信用互助社进行融资等，这对其金融能力的提升会起到积极作用。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虽然多数家庭有一定的收入结余，可以用于投资理财、融资、风险管理等金融活动，但受访者家庭人均纯

收入较低导致其结余较低，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其金融行为，从而阻碍了农村居民金融能力的提高。

(二) 投资理财：收入高的家庭拥有银行存款比例高，理财受个体特征影响大

家庭投资理财的目的是在可承受的风险水平下，通过投资于一系列的金融产品，如银行存款、证券（股票、债券）、基金、保险等，实现财富的保值和增值。投资理财能力是衡量居民金融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如上文所述，调研地区 80.15% 的家庭收支有结余，为这些家庭接受金融服务提供了基础条件。通过调查发现，农村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及收入水平等因素将直接影响其投资理财决策。

通过对本次调研的数据进行分析，在投资理财决策方面，受访者家庭有以下几个特征：

1. 收入水平低的家庭银行存款比例低，但这一比例随收入增长而快速增长

在 3010 个受访者中，有银行存款的人数为 681，比例为 22.62%。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一比例会大大增加（如图 13）。纯收入水平在 1 万元以下的家庭，拥有银行存款的比例仅为 11.60%；而收入水平在 10 万元以上的，拥有银行存款的比例达到 48.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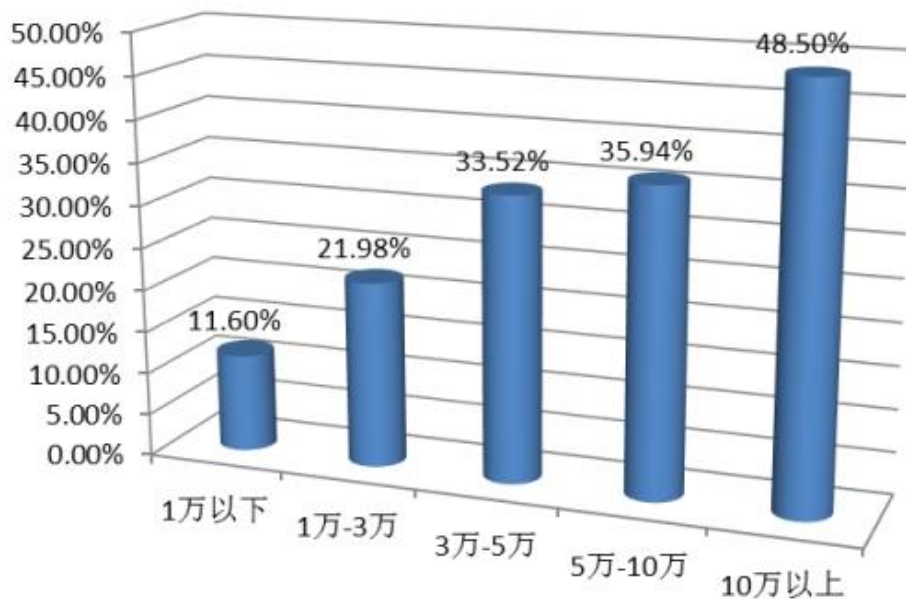


图 13 各收入水平有银行存款的人数比例

2. 购买除银行存款外理财产品人数较少，购买决策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年龄、健康程度等个体特征影响明显

除银行存款这种理财方式外，受访者中仅有 56 人购买过其他种类的理财产品。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渠道是银行柜台，56 人全部购买了除存款外的其他银行理财产品。此外 56 人中，还有 9 人通过第三方平台（支付宝、微信及 P2P 平台）购买过理财产品，其他渠道主要是保险公司（见图 14）。拥有股票、证券及基金等金融资产的受访者仅有 9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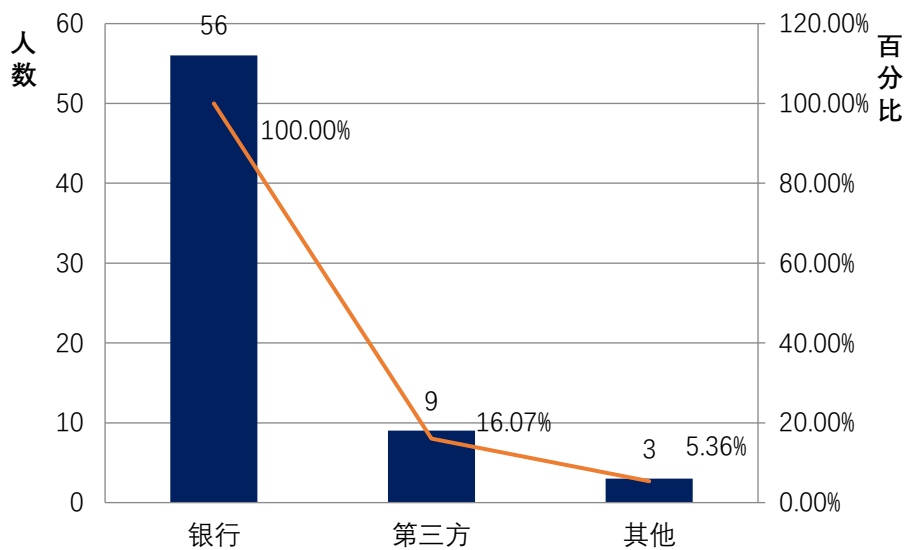


图 14 购买理财产品的渠道

受教育程度越高，购买理财产品的比例越大。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购买理财产品的比例接近 10%，而不识字的农民，购买理财产品的比例还未达到 1%（见图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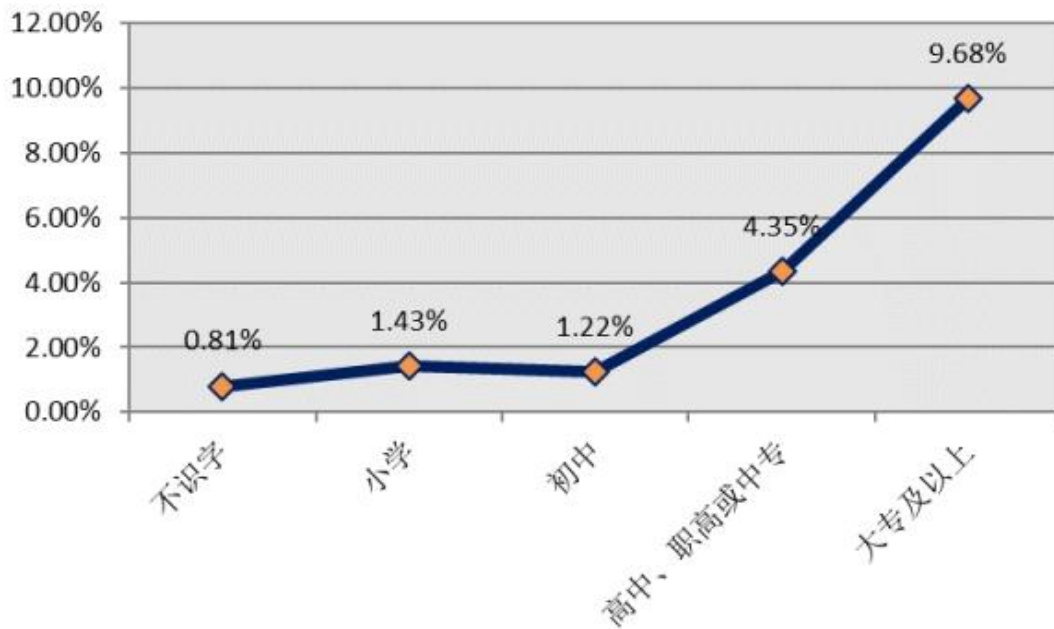


图 15 不同受教育程度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收入水平高的家庭购买理财产品的比例较高。随着家庭收入的提

高，农民的理财意愿随之增加。家庭收入在 3 万元以下的农民，购买过理财产品的比例仅为 2.35%，而家庭收入在 10 万元以上的农民，购买过理财产品的比例达到 5.93%（见图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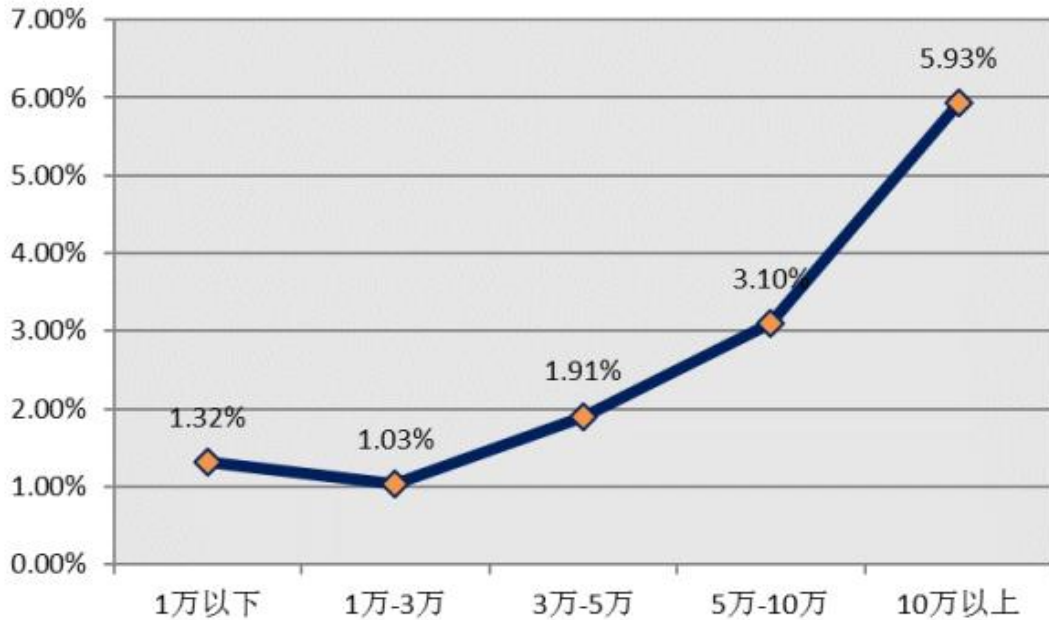


图 16 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18-35 岁年龄段的受访者购买理财产品的比例相对较高。这一年龄段购买过理财产品的受访者占其总数的 3.63%。随着年龄增长，购买过理财产品的比例呈下降的趋势，老年（65 岁以上）购买过理财产品的比例仅为 0.5%（见图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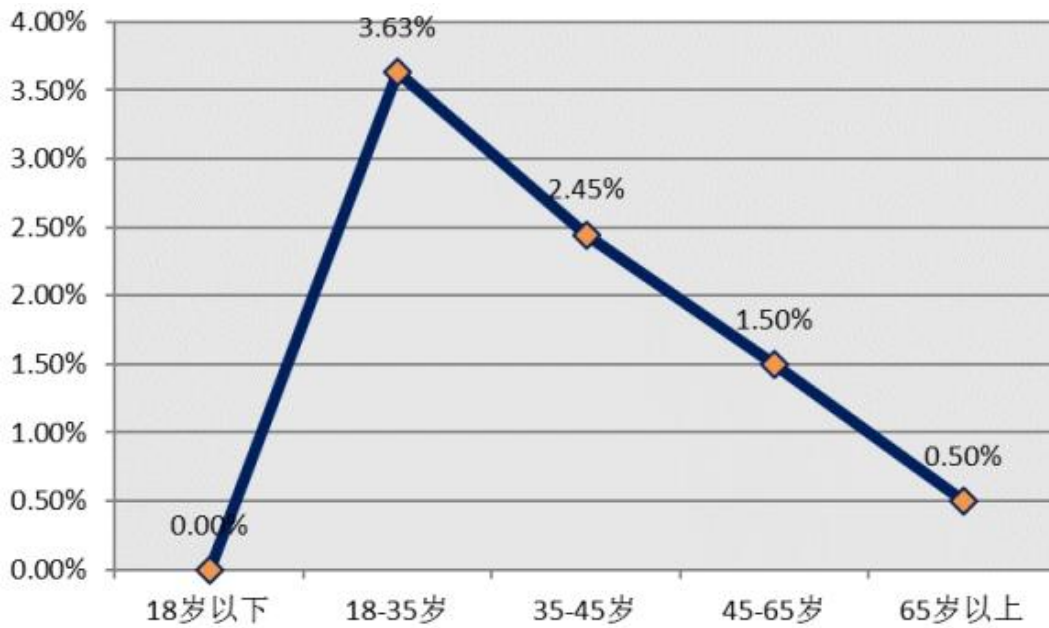


图 17 不同年龄段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身体健康的农民，更倾向于购买理财产品。家庭购买理财产品的决策与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状况密切相关。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农民，购买理财产品的比例为 2.43%，而身体状况较差的农民，则一般不会购买理财产品（见图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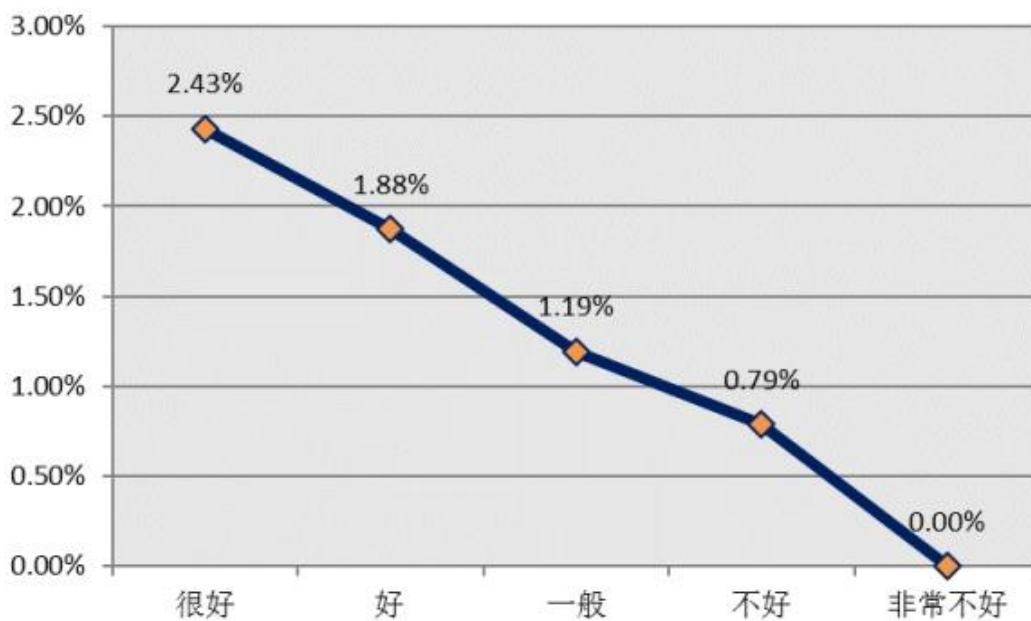


图 18 不同身体健康状况下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受制于收入水平较低等因素，所调查地区农村居民利用收入结余进行投资理财的平均水平较低，而没有投资理财，又会一定程度上降低其收入水平，减少抵御通胀的能力。另外，如果仅从“是否购买过理财产品”的比例而不考虑其购买金额角度来分析的话，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是影响这一决策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因此提高教育水平及增加收入是提升金融能力的重要方面。

（三）片区家庭融资能力较弱，主要受制于抵押担保不足，信用记录缺乏及融资渠道单一等因素，服务质量也存在地区差异

农民通过银行等渠道进行融资，合理选择融资产品，以平衡当前和未来生产、生活资金需求这些金融决策行为，是衡量其金融能力的重要指标。研究农民的融资渠道、融资服务的使用情况以及偏好等问题，对于了解农民融资管理能力，分析限制农民金融能力提高的因素，探索提高贫困地区农民金融能力的对策，使弱势群体充分享受普惠金融的福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家庭负债用途以生产性借款为主，其他负债中医疗支出为主因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户的资金需求不断增加，借款用途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负债用途仍以生产性借款为主。根据调查数据的分析返现，负债的主要用途仍然以生产性借款为主。在 3010 个受访者中，1049 人目前有负债。负债原因为农业及工商业借款的有 679 人，占持有负债人数的 65%，人均负债为 53,783.06 元；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农村生

活水平的提高，农民房屋借款需求也在增加，排在了负债用途的第二位，有 178 人，占 17%，人均 56991.01 元；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借款的数量显著增加，有 116 人有教育借款，占 11%，人均 19755.17 元，这一方面表明教育问题越来越多地被农民所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教育投资对于农民仍然是较重的资金负担。另外，在农村地区也出现了金融投资性借款，虽然数量较少，但仍体现出调研地区对投资理财的意愿在提升，同时也说明在调研地区相关金融服务市场空间较大（见图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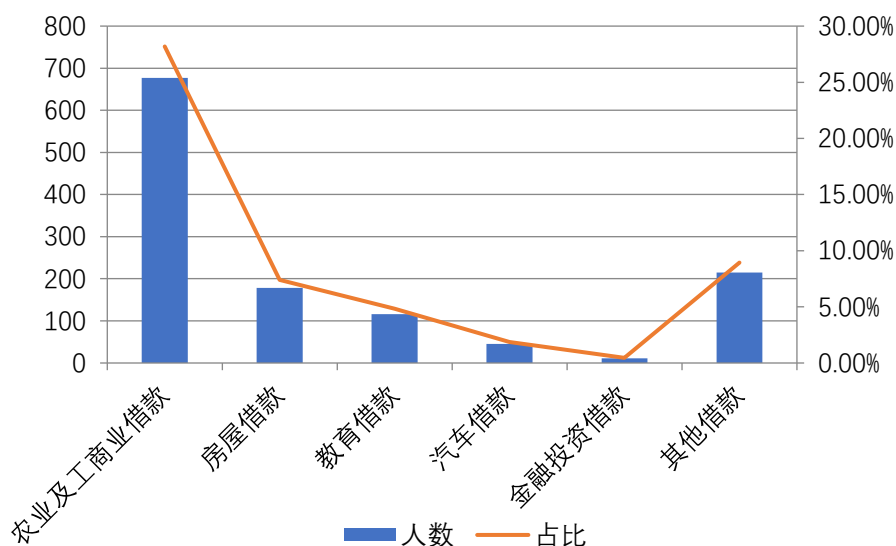


图 19 家庭各种负债的人数分布情况

负债金额最多的是汽车及房屋借款。如果考察负债金额，最大的两个选项是汽车及房屋借款，农业及工商业借款仅排在第三位。这说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对出行及居住质量的需求在快速提升（见图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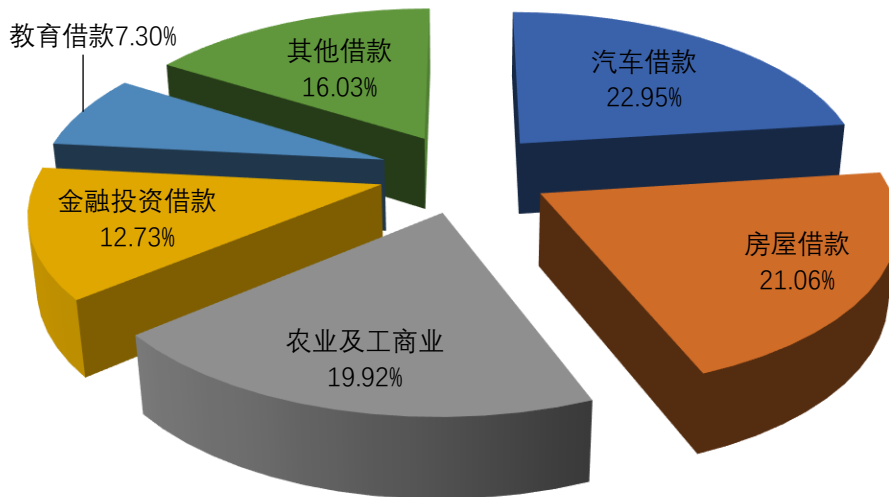


图 20 各种负债金额比例情况

在其它负债用途中，用于看病等医疗支出的借款人数排在首位。这说明在农村贫困地区，看病仍然是农民的主要资金负担之一。如何解决贫困地区的基本民生问题，是值得普惠金融重点关注的。除看病外，受访者所选借款用途依据选择频次排序依次为小额日常消费、耐用品大额消费、娶媳妇和外出打工（见图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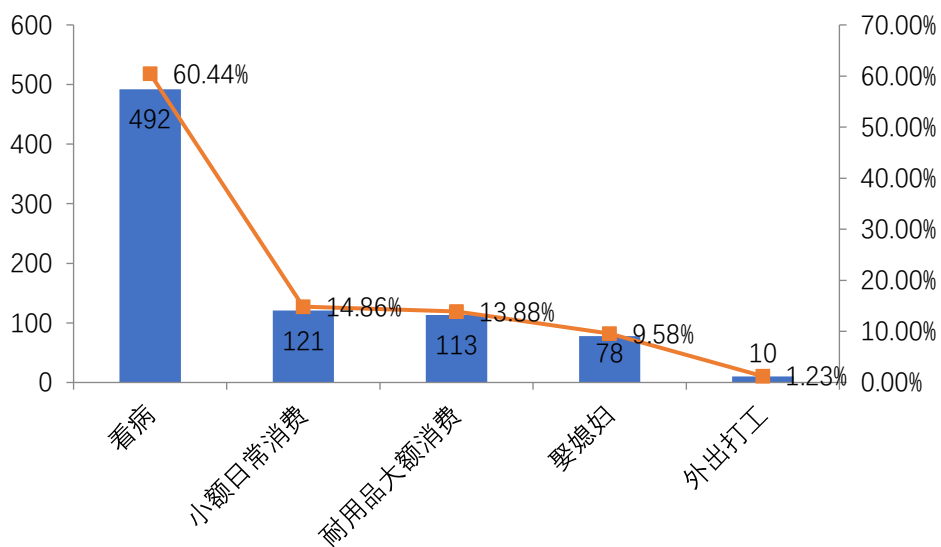


图 21 家庭其它负债原因

2. 正规融资渠道较为单一，贷款审批时间较长，有效抵押不足是贷款难的重要原因

一是金融机构类型较为单一，这种外部环境成为制约农民金融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在调研地区，正规融资渠道的金融机构类型较为单一，农信社、农行是调研地区农户进行贷款的主要渠道，通过其他渠道申请贷款的农户家庭较少（见图 22）。在 1752 个受访者中，过去一年从正规金融渠道申请过贷款的人有 426 人，比例达到了 24.32%。而根据其申请贷款的渠道频次来计算，有 415 人次通过农信社及农行进行贷款，占到了所有贷款的 93%¹⁰。其他渠道融资的频数仍然较低，如村镇银行，邮储银行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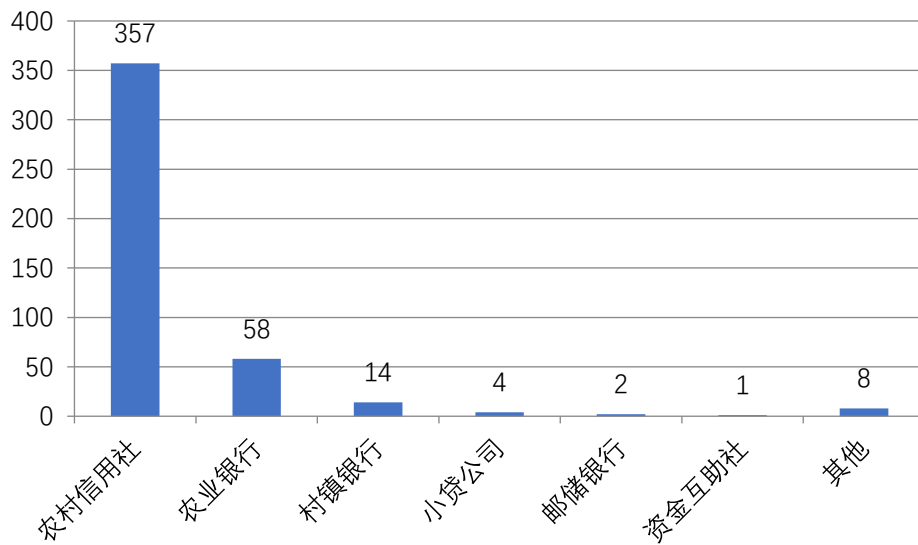


图 22 正规金融渠道贷款的分布情况

如果考察所申请贷款的类型，农村居民申请的贷款类型中，无需抵押贷款（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比例较大，分别占到有申请贷

¹⁰ 贷款的 426 人中有些会通过多个途径进行融资，总共的贷款频数为 444，见图 22。

款总人数的 84.23%和 72.07%¹¹（见图 23）。这说明，农民倾向于进行信用贷款及联保贷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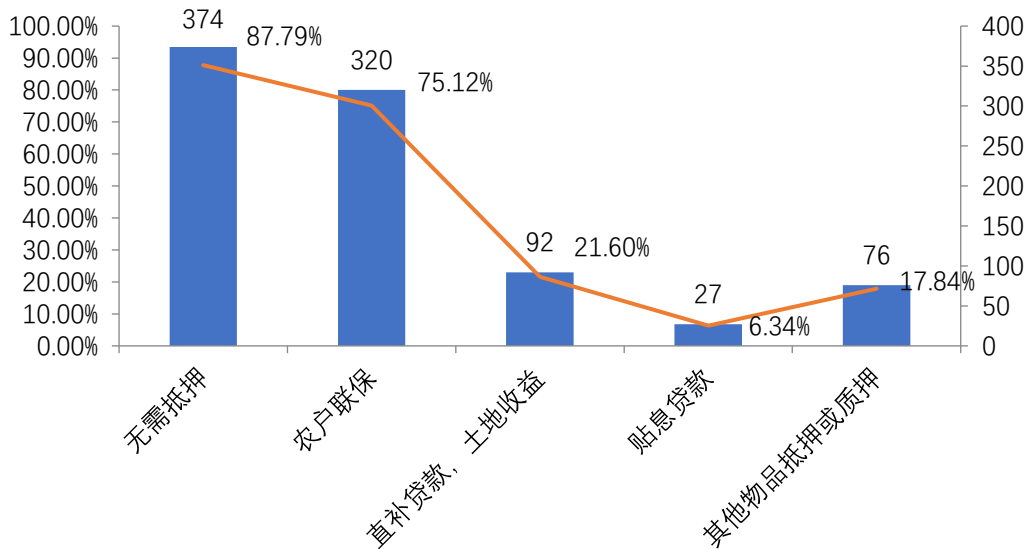


图 23 贷款类型分布

从农民申请到获得贷款的天数来看，片区金融机构放款速度相比经济发达的地区¹²较慢。绝大多数农民在 15 天内获得贷款，占 78.34%，平均天数为 16.51 天（见图 24）。这需要农民及金融机构双方积极构建信用体系，如此可以缩短贷款审批时间，降低贷款发放周期。

¹¹ 在申请贷款时，受访者可以选择多个类型。

¹² 如在浙江的乐清市，对于有信用记录的家庭，农民的贷款发放时间一般会当天到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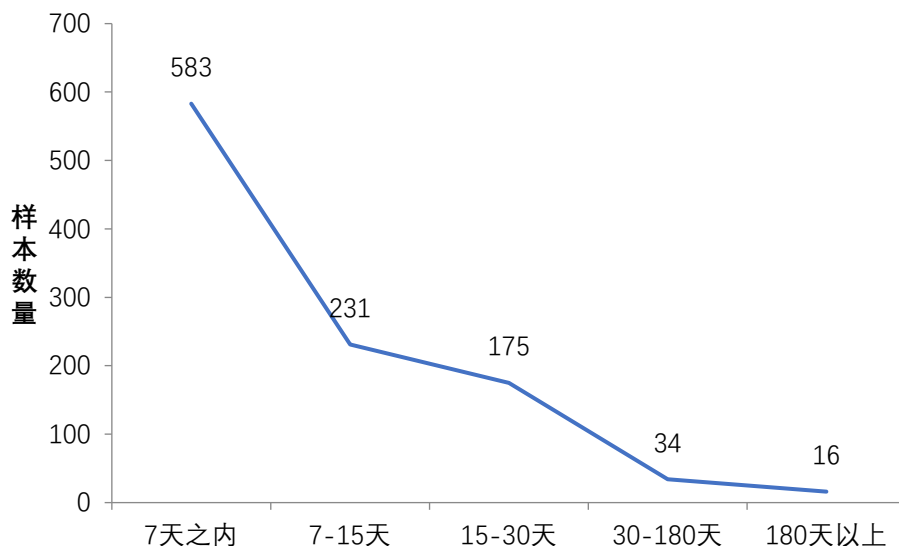


图 24 贷款审批时间分布情况统计

二是贷款的需求额度集中在 1-10 万元这一中间段，资金用途多元化。融资额度在 1-10 万元区间的占比最大，接近 77%（见图 25），贷款金额在 1 万元以下或高于 10 万元这两端的比例都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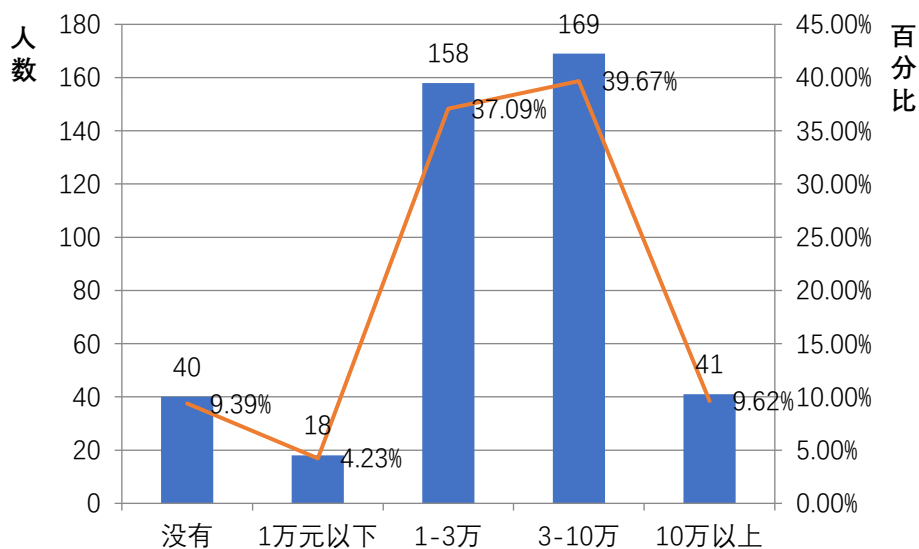


图 25 去年从银行渠道申请贷款金额分布情况

在贷款用途上，正规渠道与家庭总负债的用途一致，也是生产性借款，这一比例占到 48%，但与家庭总负债不同的是，贷款金额也是农业生产金额最大，而非汽车及房屋贷款。贷款用于农业生产的有 205 人次（见图 26），平均额为 94516.19 元；用途为经商的有 35 人，平

均金额 56371.74 元；用途为买房、置地、修建房屋的有 50 人，平均额为 52200.1 元；用途为教育的有 58 人，平均额为 11732.75 元；用途为看病的有 61 人，平均额为 16347.54 元；用途为结婚或葬礼的有 32 人，平均额为 38140 元；用途为消费的有 57 人，户平均额为 19271.92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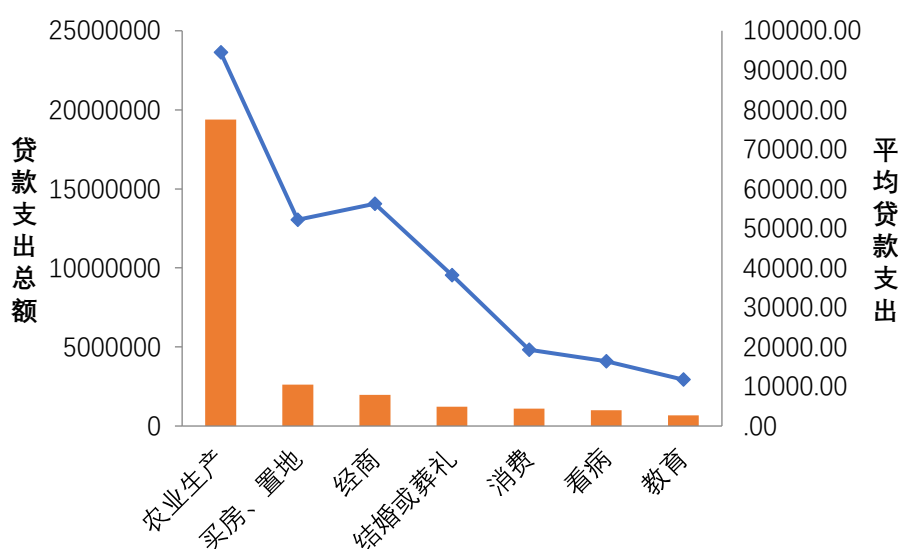


图 26 申请银行贷款用途分布

三是有效抵押不足、信用记录不良或缺乏信用记录是贷款不获审批的主要原因。在调查农户是否有过贷款审核未通过的情况时，有效样本为 426 人，有 178 人表示出现过审核未通过的情况，占 41.78%。进一步调查贷款审核未通过原因时，在 158 个人有效样本中，没有抵押或抵押物不足的为 71 人，占 44.94%；无人担保为 49 人，占 31.01%；信用记录不良为 18 人，占 11.39%；没有信用记录为 12 人，占 7.59%；没有收入或收入太低为 8 人，占 5.06%（见图 27）。可以看出，贷款难的主要症结仍然在于抵押、担保不足。值得注意的是，个人信用问题在调研地区较为突出，没有信用记录和信用记录不良比例高达 19%，

这不仅说明农民自身信用问题是其获得融资服务的重要制约因素，同时也说明信用体系建设不健全制约了农民普惠金融的可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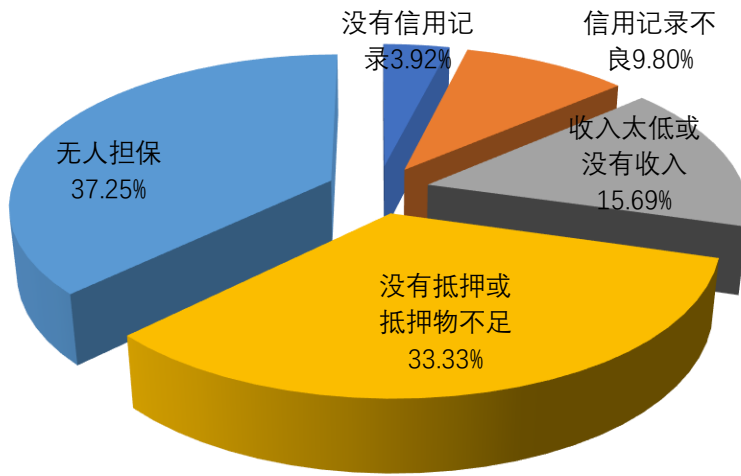


图 27 申请贷款未获批准原因

四是金融服务产品的推广程度直接影响农民贷款的可获得性。由于在吉林和黑龙江较早推出土地收益保障贷款这一金融创新，内蒙古相对较晚，前两省农民申请该种贷款的比例明显高于较为滞后的内蒙古地区（见表 10）。

表 10 三省农民申请过的贷款类型对比

省区	小额信用贷款		担保贷款		政府贴息贷款		直补贷款 土地收益贷款		网络借贷 资金互助社		总计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吉林	264	50%	165	31%	24	5%	68	13%	1	0.2%	522
黑龙江	38	22%	109	63%	2	1%	23	13%	0	0%	172
内蒙古	72	31%	152	66%	1	1%	1	1%	3	1%	229

3. 民间渠道融资作为一种补充方式，借款额度较小，以亲友借款为主

民间金融作为正规金融的一种补充形式，在满足农民资金需求时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 2879 个有效样本中，29.34%的受访者表

示通过民间融资渠道进行过融资。从地区分布来看，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兴安盟地区通过民间融资渠道进行融资的样本比例分别为 25.92%、24.69%和 39.1%。

在有民间融资的受访者样本中，主要的融资额度集中在 1-3 万元，占到了 52.6%，而如上文所述通过正规金融融资的贷款集中在 3-10 万元，占到了将近 40%。相比正规融资而言，其贷款额度较小。

从民间融资渠道来看，向亲友借款是最主要的渠道。在 895 个有效民间融资样本中，选择向亲友借款的人数为 799，占 89.2%；选择高利贷的人数为 79，占 8.82%，此外还有少量样本选择网络借贷和赊购等商业信用贷款的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农户选择民间融资的利率显著低于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的利率 8.72%，民间融资的平均年化利率为 6.86%，这与向亲友借款一般不支付利息或支付较少利息直接相关，或者说市场议价程度较好。

值得注意的是，在已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受访者中，仍有较大比例的受访者有过民间融资经历。在 426 名去年在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的受访者中，有 161 人同时有过民间融资行为，比例为 37.79%；其他 1326 名去年没有在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的受访者中，有 353 人有过民间融资行为，比例为 26.62%（见图 28）。这组对比数据说明，相对而言，有过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经历的受访者，其融资能力较强，不但体现在正规渠道中，同样也体现在民间融资渠道中，其获得贷款的比例都相对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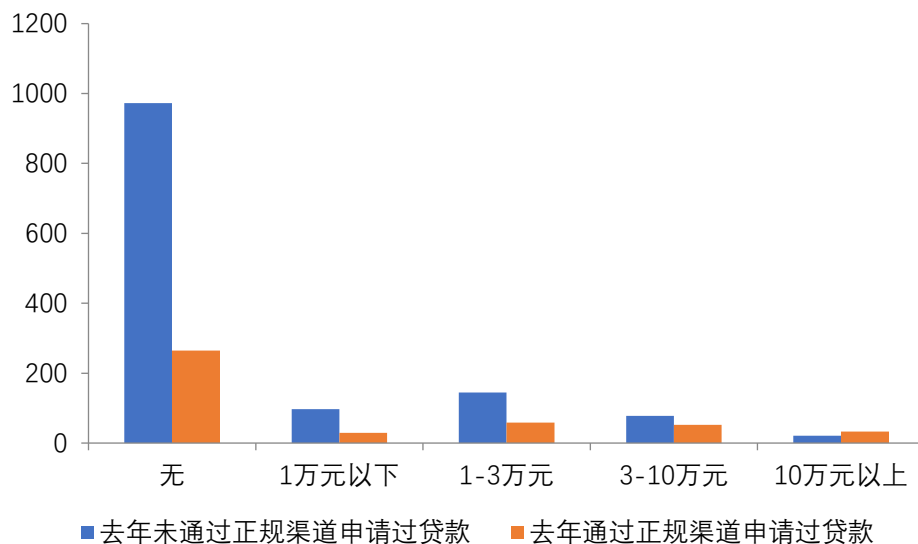


图 28 正规金融与民间融资情况汇总

4. 未来融资需求与融资渠道偏好

一是金融消费者主动获取金融服务的意愿较低，仍以小额借贷为主。在调查受访者目前是否有融资需求时，在 3010 个样本中，共有 389 人有融资需求，占 12.9%；其中 64.8% 的人预计借款额度为 5 万元以下，仍以小额借款为主。

二是片区农村居民在有融资需求时更倾向于使用正规传统金融渠道和亲友间借贷，而对其他融资渠道则缺乏了解，不愿意使用。在融资渠道选择上，希望通过银行进行融资的比例最多，达到 52.8%；希望通过亲友借款的占到 33.15%（见图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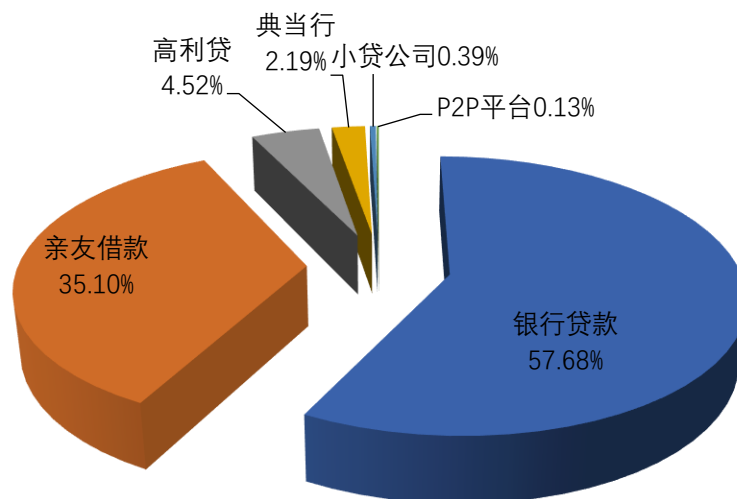


图 29 未来预期选择的融资渠道

另外，从融资成本方面看，经过简单算术平均计算，受访者愿意接受的平均年化利率为 7.45%，这一数字与 2015 年全国微型企业的平均融资成本 8.19%¹³相比较低，说明金融服务提供者的服务价格与需求者的预期仍有差距。

（四）家庭风险管理意识比较淡薄，个体特征对风险管理决策影响较大

农村家庭资产管理长期被忽略。很多人认为贫困人群资产少，谈不上什么资产管理。其实越是资源紧缺，越是需要进行管理。这里主要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分析大兴安岭南麓贫困片区对保险产品的购买及项目投资的风险偏好情况。

¹³ 之所以选择微型企业的融资成本，是因为微型企业在经营特征上，与家庭更为相似，数据来源为中国人民银行。

1. 医疗保险参保率低于全国水平，养老保险参保水平较低

如图 30，调查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 79.27%，但全国新型农村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已达到 98.90%，相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9.63%，从调研数据来看，片区内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率较低，还未达到样本量的五分之一，为 16.5%，而与之较为类似的对比数字是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¹⁴，将近 50%，虽然这是一种很粗略的计算方法，但也可以近似地得出结论：片区内养老保险的参与率很低。

此外，农村居民购买商业保险的比例更低。其中：农业保险参保率为 9.53%，财产保险参保率仅为 2.13%。农民购买的其他保险，主要是人身意外保险，参保率总共为 7.31%。



图 30 农民购买保险情况

¹⁴ 这一比率的计算方法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除以（全国总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的数据来源：2016 年度人社部统计公报。

2. 个体特征影响保险购买决策

35-45 岁年龄段的人群购买保险的比例相对较高。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 35-45 岁年龄段的人群购买保险的比例相对较高。18-35 岁的人群购买财产保险和农业保险的比例相对较高, 而老年人 (65 岁以上) 除购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比例较高外, 购买其他保险的比例都比较低 (见表 11)。

表 11 不同年龄段购买保险情况

年龄分组	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保险		农村养老保险		财产保险		农业保险		其他保险		总计
	参保人数	占比	参保人数	占比	参保人数	占比	参保人数	占比	参保人数	占比	
18 岁以下	6	77.78%	0	0.00%	0	0.00%	3	33.33%	0	0.00%	9
18-35 岁	276	77.97%	57	13.80%	17	4.12%	60	14.53%	33	7.99%	413
35-45 岁	441	81.35%	105	16.06%	23	3.52%	88	13.46%	58	8.87%	654
45-65 岁	965	78.55%	271	17.67%	20	1.30%	120	7.82%	113	7.37%	1534
65 岁以上	218	80.00%	56	14.00%	4	1.00%	16	4.00%	16	4.00%	400
总计	1906	79.27%	489	16.25%	64	2.13%	287	9.53%	220	7.31%	2193

受教育水平高的人群购买商业保险比率较高。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农民购买政策性保险的比例比较高, 而购买商业保险的比例比较低; 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农民购买商业保险的比例相对较高 (见表 12)。

表 12 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群购买保险情况

教育水平	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保险		农村养老保险		财产保险		农业保险		其他保险		总计
	参保人数	占比	参保人数	占比	参保人数	占比	参保人数	占比	参保人数	占比	
不识字	187	75.40%	28	11.29%	2	0.81%	7	2.82%	13	5.24%	248
小学	910	81.25%	135	12.05%	10	0.89%	69	6.16%	66	5.89%	1120
初中	996	81.17%	236	19.23%	35	2.85%	161	13.12%	95	7.74%	1227
高中、职 高或中专	240	74.53%	75	23.29%	11	3.42%	40	12.42%	30	9.32%	322
大专以上	53	56.99%	15	16.13%	6	6.45%	10	10.75%	16	17.20%	93

总计	1906	79.27%	489	16.25%	64	2.13%	287	9.53%	220	7.31%	3010
----	------	--------	-----	--------	----	-------	-----	-------	-----	-------	------

健康状况与购买保险呈现正相关。由于存在缺失数据，回答健康状况的样本量为 3005 个。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民，购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比例较高，而健康状况不好的农民，购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比例较低（见表 13）。

表 13 不同健康状况购买保险的情况

健康状况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农村养老保险		财产保险		农业保险		其他保险		总计
	参保人数	占比	参保人数	占比	参保人数	占比	参保人数	占比	参保人数	占比	
很好	1026	80.53%	220	17.27%	39	3.06%	145	11.38%	101	7.93%	1274
好	678	79.48%	131	15.36%	20	2.34%	84	9.85%	60	7.03%	853
一般	462	78.84%	95	16.21%	4	0.68%	47	8.02%	39	6.66%	586
不好	189	74.70%	34	13.44%	1	0.40%	8	3.16%	17	6.72%	253
非常不好	30	76.92%	7	17.95%	0	0.00%	3	7.69%	3	7.69%	39
总计	2385	79.37%	487	16.21%	64	2.13%	287	9.55%	220	7.32%	3005

收入水平高的家庭购买保险积极。收入水平在 3 万以下的家庭，购买政策性保险的比例在 80% 以上，而购买商业性保险的比例要比收入水平高的群体低，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购买商业保险的比例提高显著（见表 14）。

表 14 不同收入水平购买保险的情况

教育水平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农村养老保险		财产保险		农业保险		其他保险		总计
	参保人数	占比	参保人数	占比	参保人数	占比	参保人数	占比	参保人数	占比	
1 万以下	973	80.21%	156	12.86%	12	0.99%	48	3.96%	73	6.02%	1213
1 万-3 万	701	80.48%	118	13.55%	11	1.26%	72	8.27%	58	6.66%	871
3 万-5 万	280	76.29%	71	19.35%	11	3.00%	49	13.35%	33	8.99%	367
5 万-10 万	247	76.47%	66	20.43%	18	5.57%	57	17.65%	37	11.46%	323
10 万以上	185	78.39%	78	33.05%	12	5.08%	61	25.85%	19	8.05%	236
总计	2386	79.27%	489	16.25%	64	2.13%	287	9.53%	220	7.31%	3010

3. 项目投资风险偏好平均较低

投资风险偏好是消费者金融能力的重要组成因素，反映了消费者

对金融风险的态度。在 3008 个受访者中，73.90%的人是风险厌恶型的，其中：51.56%的人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22.34%的人可以承担略低的风险。只有 7.38%的人为了获得高回报，愿意承担高风险（见图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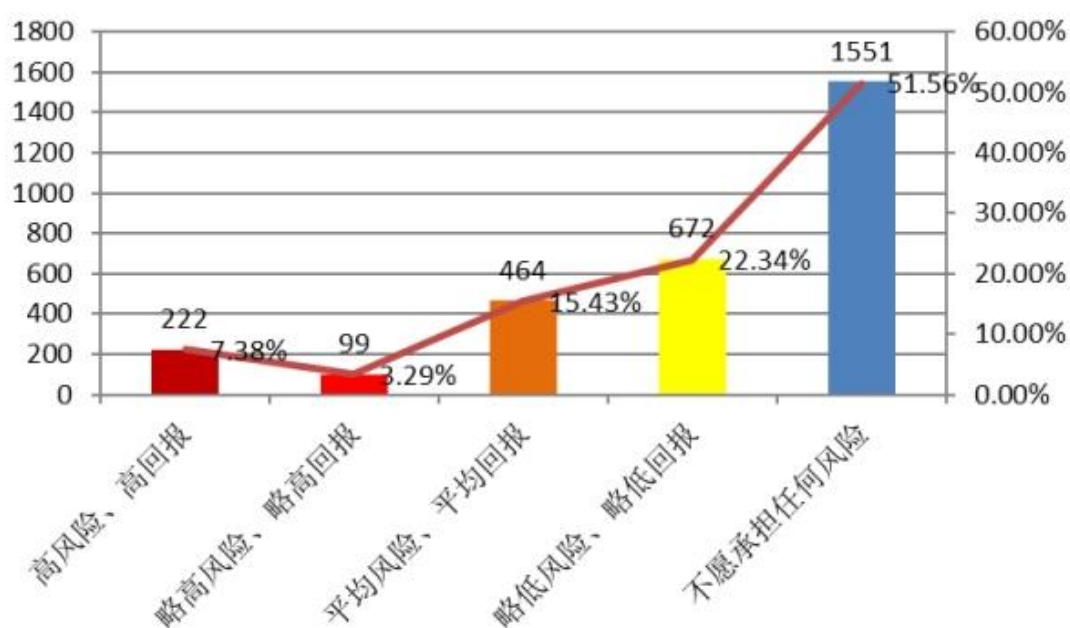


图 31 农民风险偏好情况

男性的风险偏好高于女性。通过独立样本的 T 检验，验证了男性和女性对风险的偏好显著不同。如图 32，男性选择高风险、高回报和略高风险、略高回报的比例要比女性高，而不愿意承担风险的男性比例要比女性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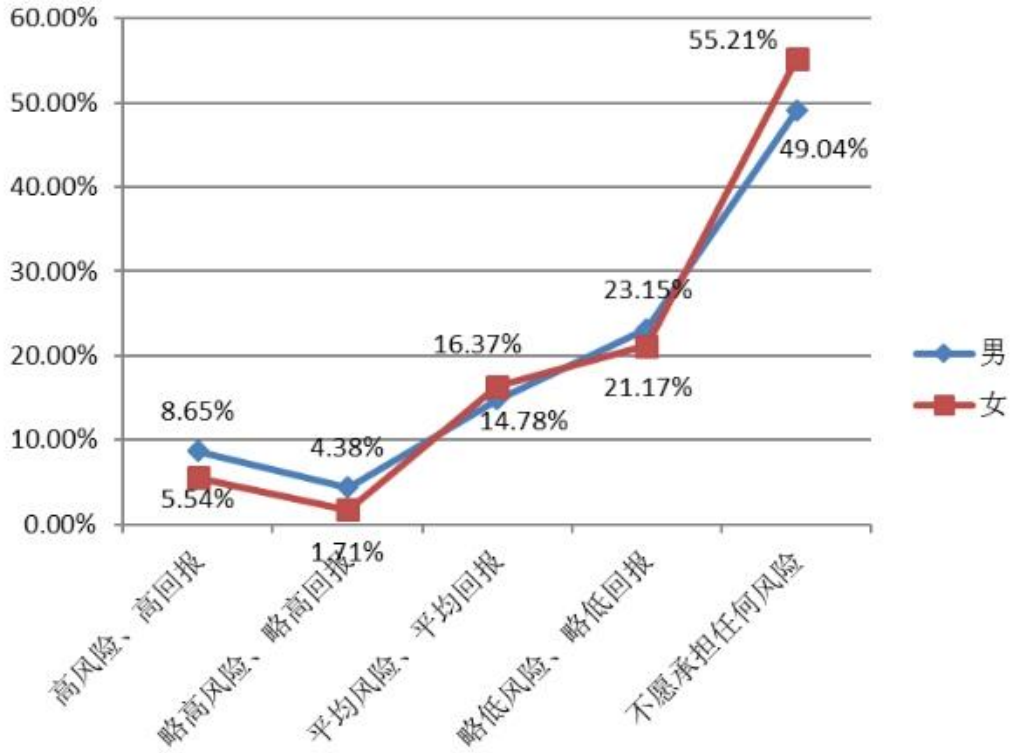


图 32 不同性别的风险偏好

受教育程度越高，对风险的偏好越强。受教育程度和对风险的偏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从表 15 可以看出，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调查地区的农民对风险的偏好在增强。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对高风险高回报资产的偏好达到了 10.75%，而不识字和仅有小学文化的农民对高风险高回报资产的偏好仅为 5.67%和 5.36%。近三分之二不识字的农民会选择投资于无风险资产，而仅有略高于三分之一的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会选择该类资产。

表 15 不同受教育水平风险偏好情况

	高风险 高回报	略高风险 略高回报	平均风险 平均回报	略低风险 略低回报	不愿承担任何风险
不识字	5.67%	0.81%	10.93%	15.79%	66.80%
小学	5.36%	2.86%	14.29%	21.88%	55.63%
初中	9.05%	3.26%	16.38%	23.88%	47.43%
高中、职高或中专	8.41%	3.74%	17.45%	24.92%	45.48%
大专及以上学历	10.75%	13.98%	21.51%	16.13%	37.63%

健康状况与风险偏好程度成正比。身体健康状况好的农民对风险资产的偏好要高于身体健康状况不好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好的农民更偏好无风险资产（见表 16）。

表 16 不同健康状况风险偏好情况

	高风险 高回报	略高风险 略高回报	平均风险 平均回报	略低风险 略低回报	不愿承担任何风险
很好	8.87%	4.16%	18.76%	21.19%	47.02%
好	7.74%	3.28%	13.95%	22.63%	52.40%
一般	4.62%	1.54%	14.21%	25.51%	54.11%
不好	5.14%	3.16%	7.91%	20.16%	63.64%
非常不好	2.56%	2.56%	7.69%	17.95%	69.23%

收入水平对风险偏好程度有正向促进作用。如表 17，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增强。家庭收入在 10 万元以上的家庭，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比例为 11.86%，而家庭收入在 1 万元以下的，选择高风险回报的比例为 6.69%。

表 17 不同收入水平的风险偏好情况

	高风险 高回报	略高风险 略高回报	平均风险 平均回报	略低风险 略低回报	不愿承担任何风险
1 万以下	6.69%	2.48%	12.30%	20.89%	57.64%
1 万-3 万	5.74%	2.64%	17.34%	23.42%	50.86%
3 万-5 万	7.90%	3.54%	21.53%	23.43%	43.60%
5 万-10 万	10.53%	5.57%	16.72%	22.29%	44.89%
10 万以上	11.86%	6.36%	13.14%	24.15%	44.49%

从上述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到，片区内的农村居民对风险管理的意识较为淡薄，基本医疗保险及养老保险的比率相对全国水平都较低，这很可能会导致其因病致贫，或者导致其丧失劳动能力后，收入缺乏保障。对于这些居民来讲，提高其风险管理意识迫在眉睫。

(五) 数字账户与支付：相比于基础设施的相对滞后，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能力，增加数字金融服务的使用率更加迫切

在数字信息技术深入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潮流中，信息采集、传播和处理效率的不断提升正在推动包括金融业在内的许多行业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也将对农民的金融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报告中，数字账户主要是指银行卡（储蓄卡与信用卡）、网上银行账户、手机银行账户、第三方支付账户等。

1. 片区的金融基础设施相对滞后

一是金融机构设置及机具投放相对较少。截至 2017 年第一季度，片区内有银行网点 624 家；保险公司网点 248 家；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租赁公司等类金融机构 267 家。片区内 ATM 机数量 1205 台，POS 机数量 11656 台，助农取款点数量 4344 家。如第一节所言，各类金融机构在片区内都有网点，而且各类金融服务机具都有分布，但相对全国水平偏少，这里不再赘述。

二是金融网点所提供的金融业务较为简单，贷款及代理保险等业务较少。在调研中，受访者表示银行网点可以办理的最多的三个金融业务分别是取现、缴费和存款（见图 33），分别为 1281、1248 和 1233 人次，另外有 595 人表示当地可以办理贷款业务，有 483 人表示当地可以办理保险业务，相对于简单的取现、存款等业务，调研地区的贷款业务和保险业务较为缺乏，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发展空间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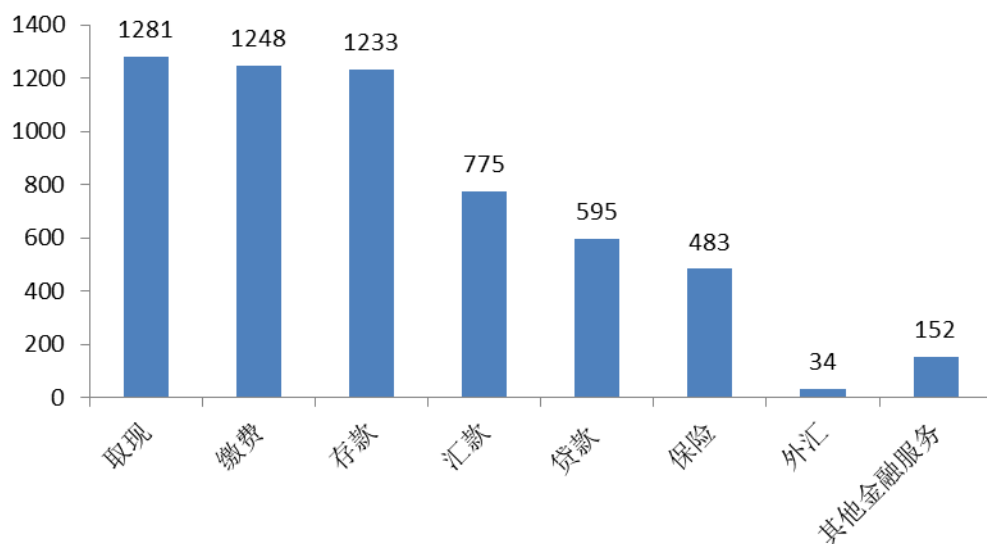


图 33 被调研地区（村）能做的金融业务情况

在 3010 个受访者中，对金融机构改善建议集中体现在简化手续、降低费用、增设营业网点和缩短审批时间（见图 34），这表示农民希望金融服务可以更加快速、便捷、便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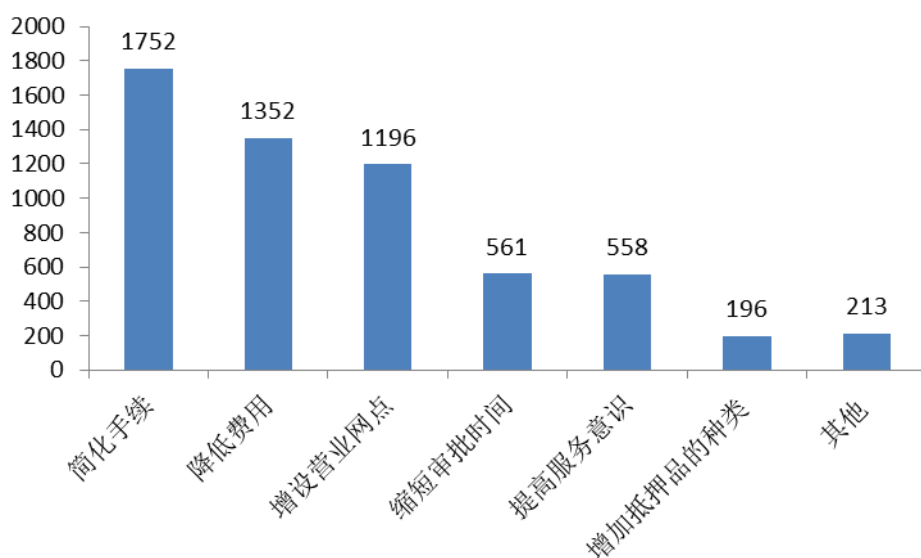


图 34 希望金融机构在哪些方面进行改善

2. 农村居民的支付、结算习惯仍然偏重于现金而非数字支付方式

在 1752 个受访者中，从获得收入的方式看，农业收入、工商业

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以现金为主，转移性收入以银行转账为主，虽然银行卡刷卡、第三方支付等方式均有使用，但使用率不高（见表 18）。

表 18 家庭收入获得方式

支付方式	农业收入		工商业收入		工资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现金	1389	85.90%	131	79.39%	260	77.15%	142	71.72%	194	22.40%
银行转账	186	11.50%	18	10.91%	67	19.88%	49	24.75%	651	75.17%
银行卡刷卡	15	0.93%	3	1.82%	3	0.89%	2	1.01%	19	2.19%
第三方支付	27	1.67%	13	7.88%	7	2.08%	5	2.53%	2	0.23%
现金	1389	85.90%	131	79.39%	260	77.15%	142	71.72%	194	22.40%
银行转账	186	11.50%	18	10.91%	67	19.88%	49	24.75%	651	75.17%

从发生支出的方式方面看，受访者最常使用的还是现金与银行转账这两种传统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微信钱包在水电费用开支、通讯费用开支、平时购物、餐饮支付和交通支付中的使用率较大（见表 19），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已有所普及，随着智能手机和微信软件的使用以及居民支付习惯的转变，农村地区在日常支出结算方式上的效率会不断提高。

表 19 家庭开支方式

支付方式	教育开支		医疗开支		水电费用开支		通讯费用开支		平时购物		餐饮支付		交通支付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现金	974	91.11%	1618	97.18%	1716	96.62%	1711	94.63%	1728	96.64%	1694	96.52%	1691	97.92%
银行转账	75	7.02%	32	1.92%	26	1.46%	23	1.27%	13	0.73%	9	0.51%	7	0.41%
银行卡刷卡	7	0.65%	11	0.66%	10	0.56%	10	0.55%	11	0.62%	17	0.97%	10	0.58%
第三方支付	13	1.22%	4	0.24%	24	1.35%	64	3.54%	36	2.01%	35	1.99%	19	1.10%

在 3010 个受访者中，现金、支付宝、微信、银行卡、手机银行、支票这些支付方式在日常消费中均被使用，其中现金的使用频率最高，微信和支付宝这种电子支付方式的使用频率位列第二（见图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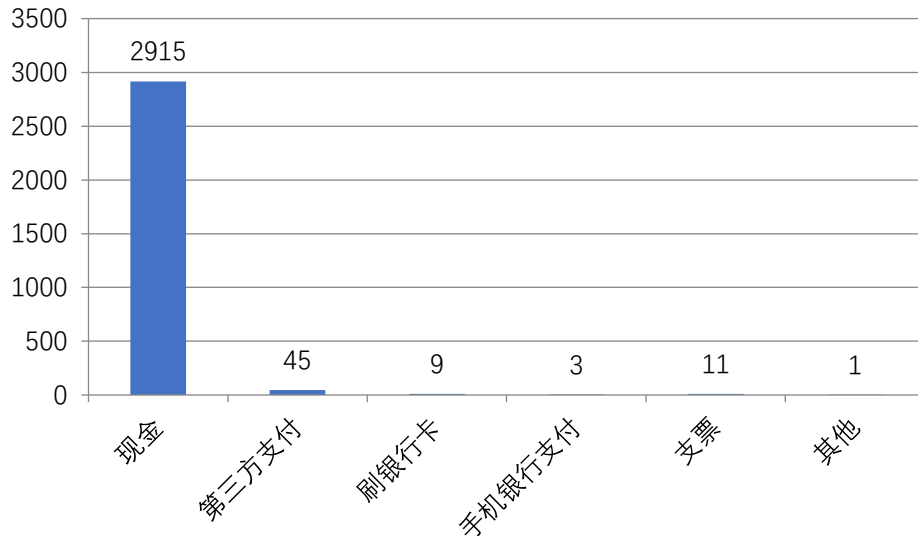


图 35 日常消费支付方式

数字支付的意识仍然薄弱。受访者最常使用现金的原因，有 2756 人表示习惯使用，有 181 人是因为金融机构网点少，有 66 人表示使用现金成本低，选择其他原因的人均表示除了现金以外不会使用其他的支付方式（见图 36）。这说明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进行数字化结算、支付的主要原因在于“习惯性”力量而非是硬件或者外部条件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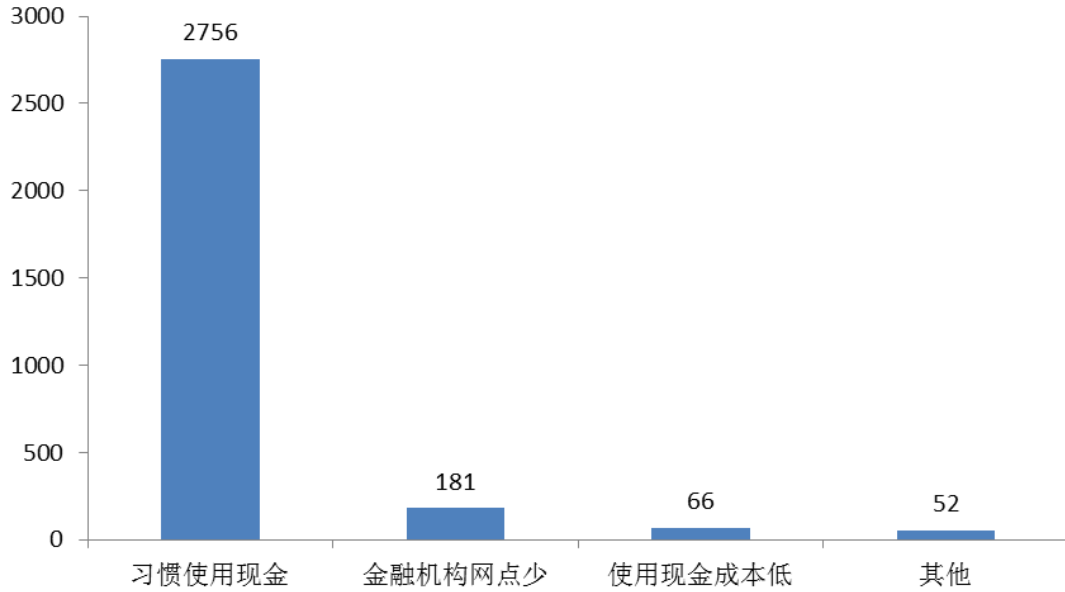


图 36 受访者偏好现金的原因

3. 银行账户的拥有率在提升，但功能使用不足，金融基础设施的使用率也较低

农民的银行账户主要有银行存折、定期存单和储蓄卡及信用卡。在 3010 个受访者中，拥有储蓄卡的人数为 1613 人，比例为 53.6%。（见图 37）。而拥有信用卡的人数为 86 人，比例仅为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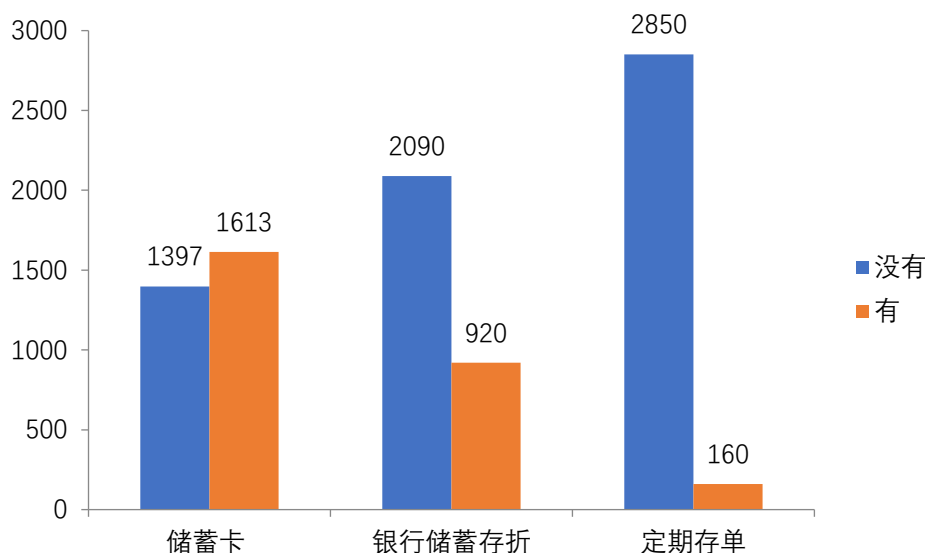


图 37 受访者拥有储蓄账户的情况

在银行账户的使用过程中，主要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一是金融基础设施的总体使用率偏低。在 1752 个受访者中，有 1292 人在银行柜台办理过业务，但只有 163 人超过 10 次；有 665 人在 ATM 机上办理业务，只有 118 使用超过 10 次；仅有 318 位受访者接受过助农取款点/综合金融服务站的服务，虽然助农取款点/综合金融服务站覆盖率高但使用率不高，这可能与助农取款点/综合金融服务站收费过高相关（见图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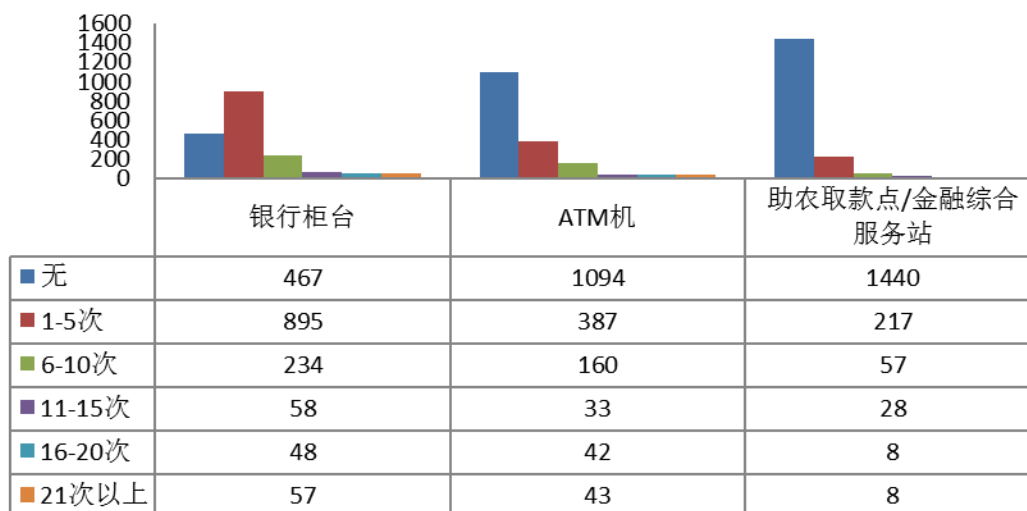


图 38 受访者使用金融机构、机具情况

二是银行账户功能使用不足，且为增值金融服务付费使用的意愿不高。农民申请银行账户的目的主要包括个人及家庭储蓄、领取政府补贴（见图 39），而在获得银行卡后，主要应用场景也多用于储蓄（见图 40）。总体而言，相对于储蓄，用于支付、融资、投资等其他用途的比例偏小。

在信用卡的使用方面，如上文所述，仅有 86 位受访者开通了信用卡，仅占全部受访者的 2.9%。这说明银行信用服务在农村地区覆盖率还非常低。在信用卡使用情况调查中，农民对信用卡使用并不熟悉，只有 24 人使用过信用卡透支服务，4 人使用过分期付款服务。

在是否愿为拓展业务办理银行卡并支付手续费的调查中，有 61.39% 的农民选择拒绝，可见农民对付费使用增值金融服务的意愿并不强烈。这在主观上将限制其潜在收入水平和金融能力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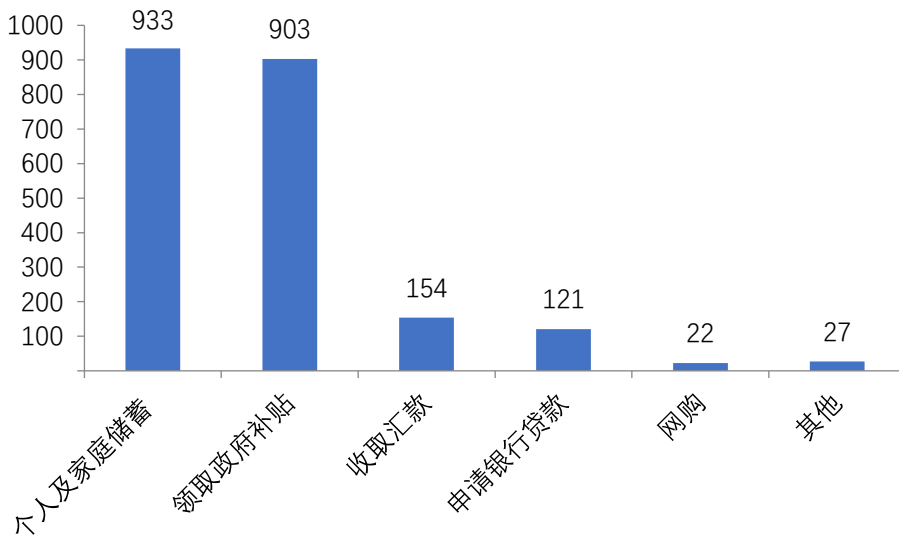


图 39 申请银行账户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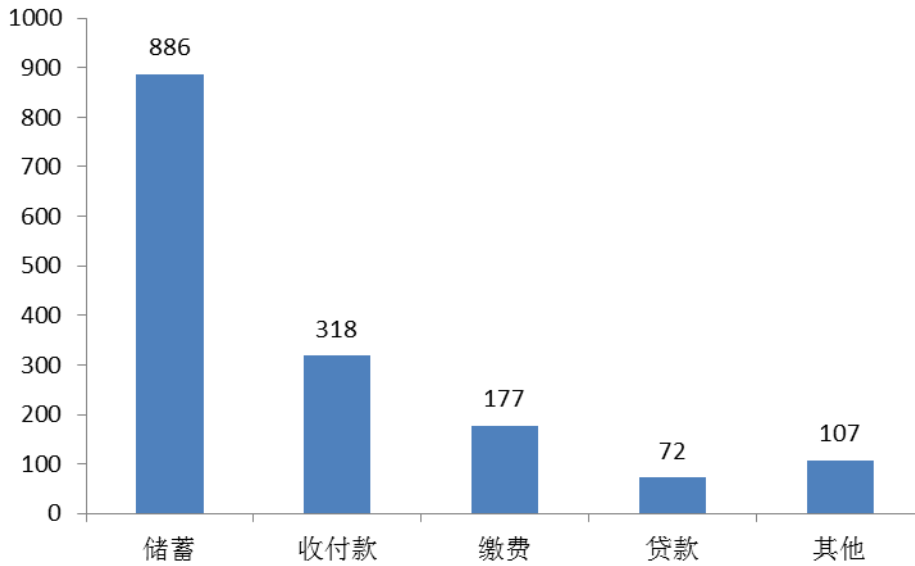


图 40 受访者银行卡主要应用场景

在调研中发现的亮点是：政府补贴数字化大大提高了银行卡的拥有率。过去农民获得政府补贴的方式是现金，采用银行卡方式发放政府补贴后，农民享受金融服务的基础得到了大幅提升。在参加调研的 1752 份受访者中，获得政府补贴的有 668 人，而在其中 79.79% 的人表示银行卡是其第一张银行卡，也就是说总体而言，有 30% 的受访者是在政府推动下拥有了其第一张银行卡，这将有力地推动农村普惠金融的数字化进程。

而且值得欣喜的是，多数受访者并不排斥使用银行卡发放政府补贴的方式。在 1752 个受访者中，有 903 人希望补贴能通过银行卡方式发放，占 51.31%；有 785 人希望能以现金的形式发放，占 44.60%；另外 64 人则希望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发放，占 3.64%（见图 41）。这说明农民对银行卡有一定偏好，但现金因其使用方便仍影响着农民

对银行卡的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定数量的农民选择微信或支付宝等第三方平台服务，这表明互联网金融已经开始进入到农村并影响到农民的支付偏好，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有进一步推进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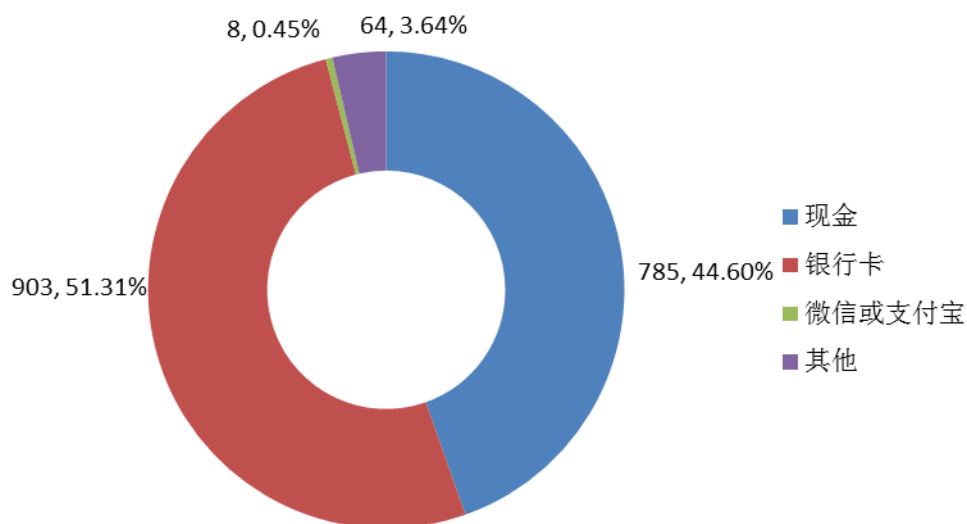


图 41 补贴发放方式偏好

但这些由于政府补贴所办的银行卡后续使用率有待提高。在获得政府补贴的 668 受访者中，87.13% 人的表示在其家庭获得补贴后选择取出现金，0.15% 的人选择转账，12.72% 的人选择继续留在卡上。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农村中，现金使用更便捷，占 57.03%，另一方面是急需用钱，占 38.02%。但也存在不知道可以将补贴继续保留在银行卡上和担心银行卡账户不安全的情况（分别为 1.24% 和 3.71%）（见图 42）。这说明农民对于基础金融服务虽然有初步了解且不排除，但银行卡后续使用则受家庭经济情况、外部支付环境和传统支付结算观念的制约，而且还需要进一步普及银行卡的使用方法。调查显示，76.95% 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政府补贴银行卡可以获取其他金

融服务,另外 23.05%的受访者使用该卡办理的也都是传统金融业务,办理频率最高的三种业务依次为储蓄、转账和缴费(见图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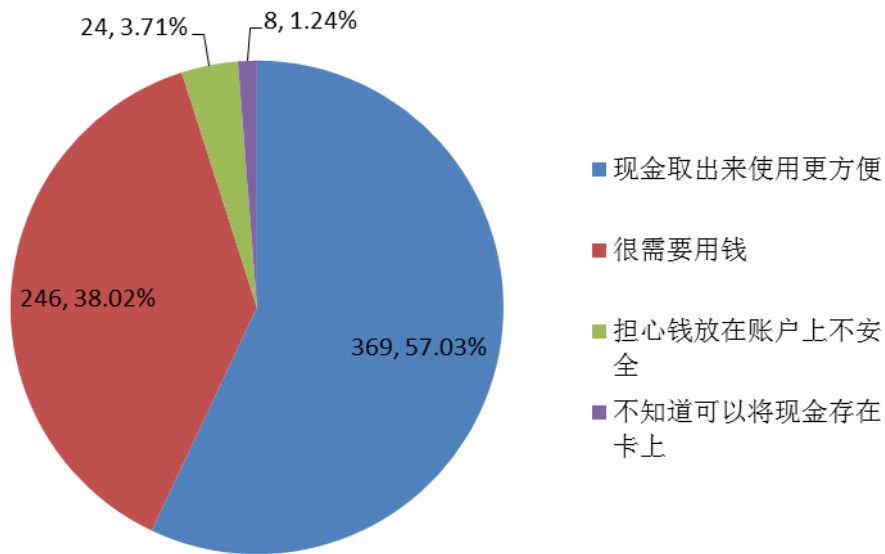


图 42 不用政府补贴卡存钱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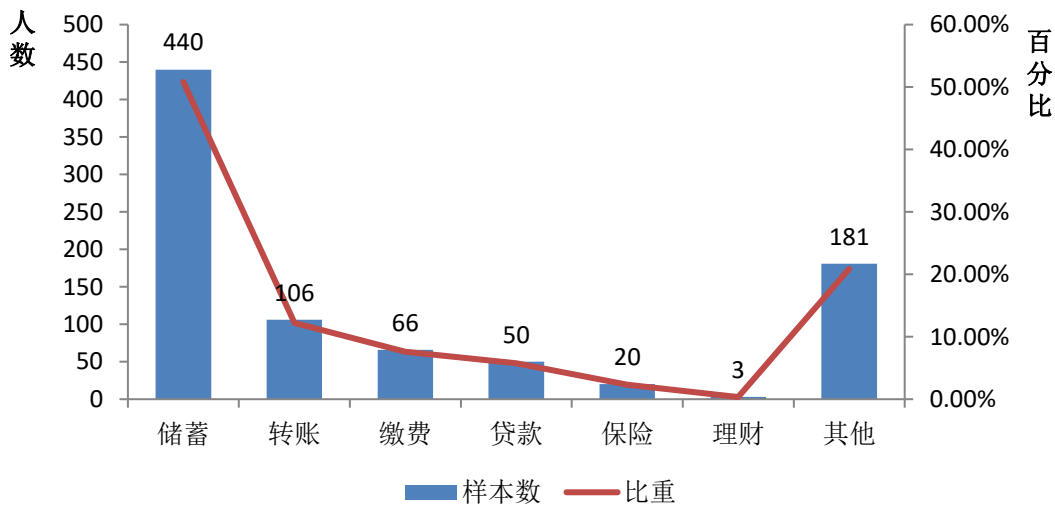


图 43 使用政府补贴银行卡办理过的金融业务

4. 网上银行普及率低

在 3010 个受访者中,68.58%的人表示家中没有电脑,92.59%的人表示从未使用过网上银行,这说明农民对互联网和数字金融的知识严重匮乏。在开通网上银行业务的受访中,使用网上银行主要办理转账业务,其余是网上购物、汇款、缴费和账户查询(见图 44)。只有

11.22%的受访者日常会进行网上购物，网购采取的支付方式依次为第三方支付、网上银行、货到付款（见图 45）。经过交叉分析发现，建档立卡贫困户受家庭经济情况影响，网上银行的使用率更低，仅占 5.04%；非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网上银行的使用率为 9.52%，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2 倍，但整体网上银行的使用率也并不高（见表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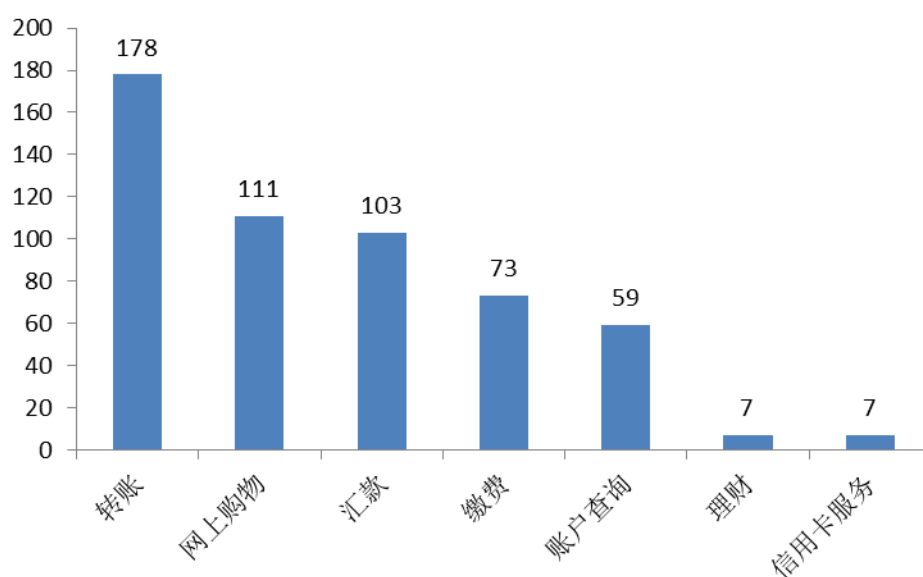


图 44 使用网上银行办理业务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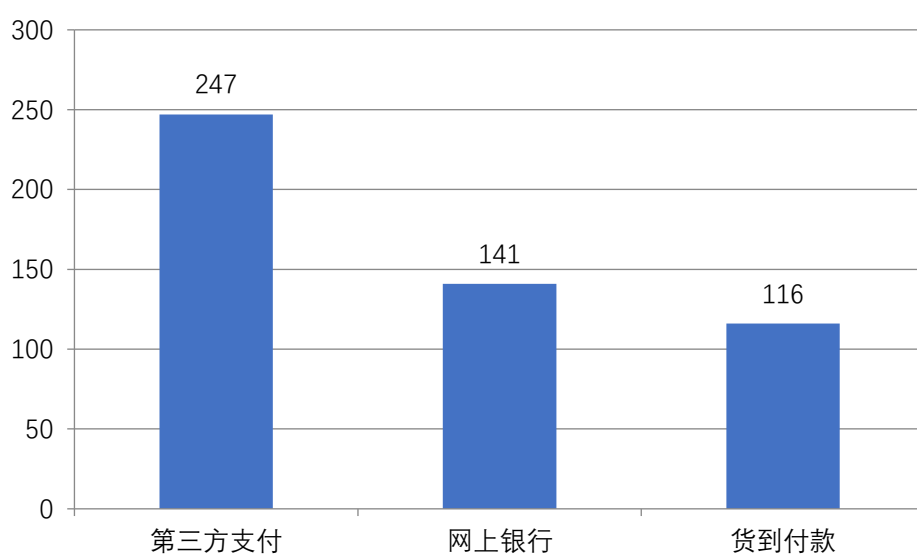


图 45 网购采用的支付方式

表 20 建档立卡贫困户使用网上银行的情况

		您是否使用网上银行	
		是	否
您家庭是否属于 建档立卡贫困户	是	20, 5.04%	397
	否	116, 9.52%	1219

5. 手机银行使用不足

目前，手机已在农村得到普及，在 3010 个受访者中，有 91.98% 的人使用手机，其中使用智能机的为 49.59%（见图 46）。但手机银行的使用在农村还未得到普及，仅有 11.21% 的受访者使用过手机银行，主要用于转账、汇款、缴费和网上购物，理财和信用卡服务使用率较低（见图 47）。经过交叉分析发现，建档立卡贫困户受家庭经济情况影响，手机银行的使用率更低，仅占 16.04%；非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手机银行的使用率为 20.73%，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 4 个百分点（见表 21），但整体上该地区手机银行的使用率也并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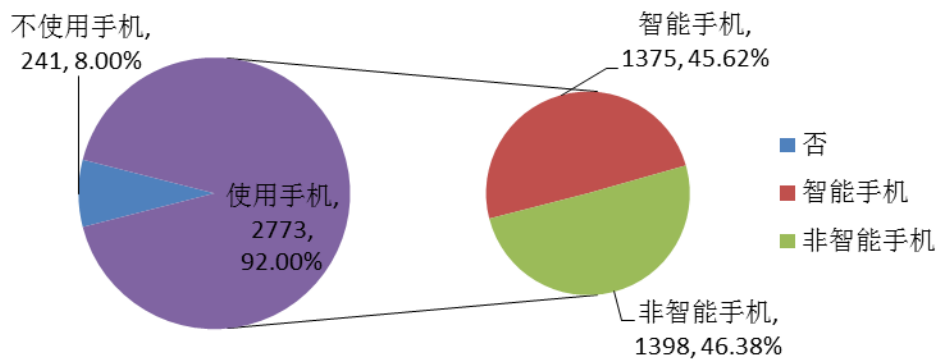


图 46 使用手机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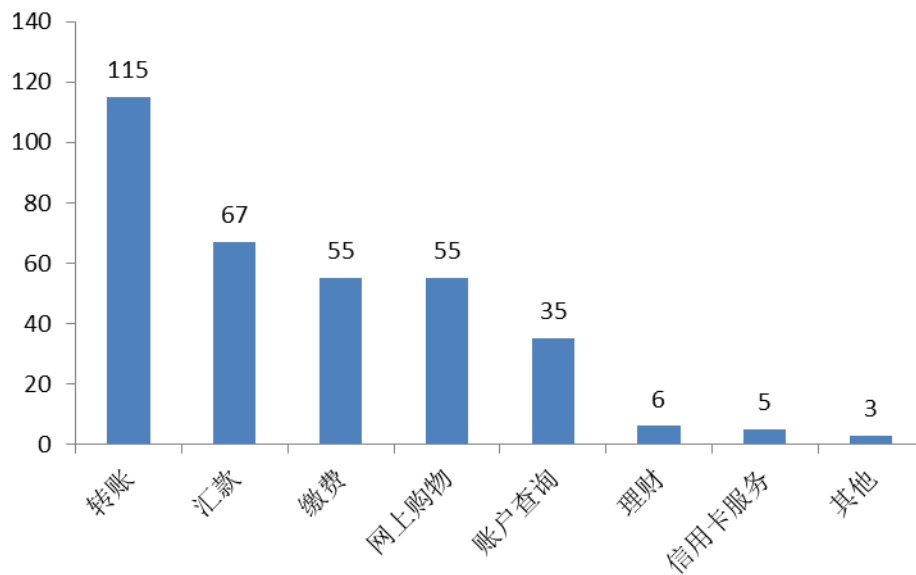


图 47 使用手机银行服务情况

表 21 建档立卡贫困户使用网上银行情况

		您是否使用手机银行	
		是	否
是		17, 16.04%	106

您的家庭是		130, 20.73%	627
否属于建档	否		
立卡贫困户			

6. 第三方支付服务使用频率不高

第三方支付作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近几年在我国发展速度较快，微信、支付宝等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支付方式。但被调研地区在第三方支付上的使用频率还不高，在 1752 个受访者中，微信是使用最多的支付方式，但也只有 444 人，而支付宝和京东则更少，只有 131 人和 25 人（见图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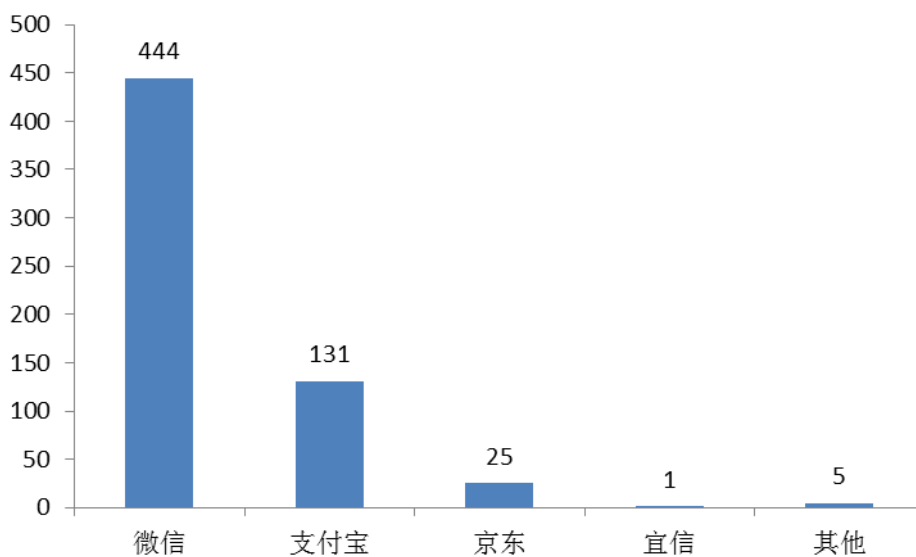


图 48 使用互联网公司的金融服务情况

在 444 个使用微信钱包的受访者中，33.33% 的人表示有微信账户但几乎不用微信钱包功能，27.25% 的人每月都用但使用次数不足 5 次（见图 49），使用功能主要的是红包，其次为收付款、手机充值、购物和缴费，而“微粒贷”和理财通等功能几乎很少使用（见图 50）。绑定银行卡的受访者比例也不高，仅有 53.6%（见图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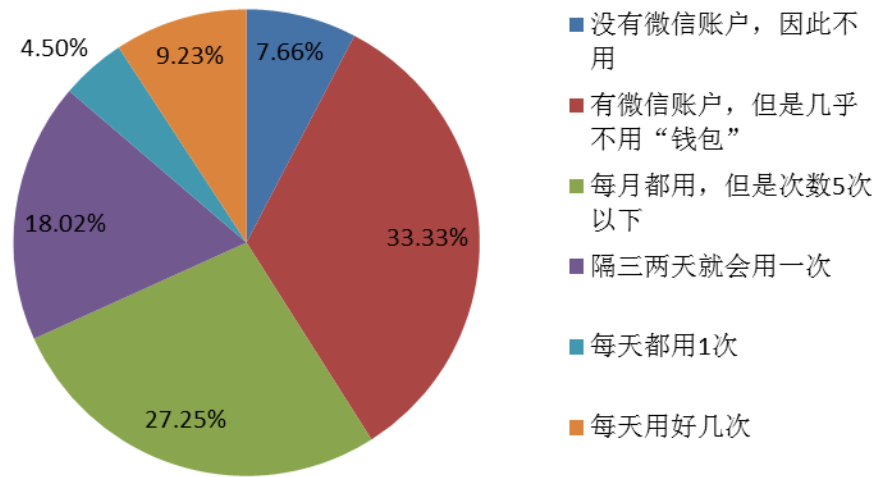


图 49 每月使用微信钱包频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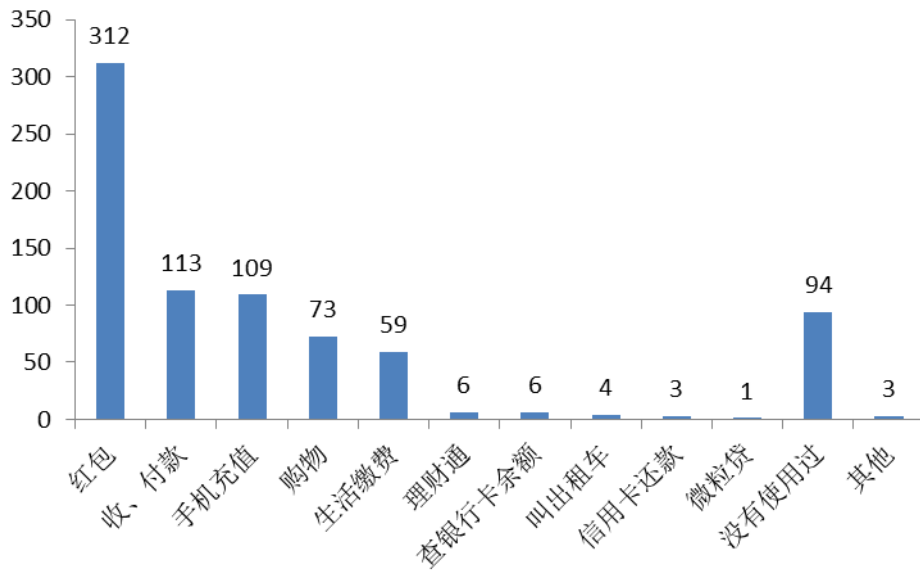


图 50 使用微信钱包功能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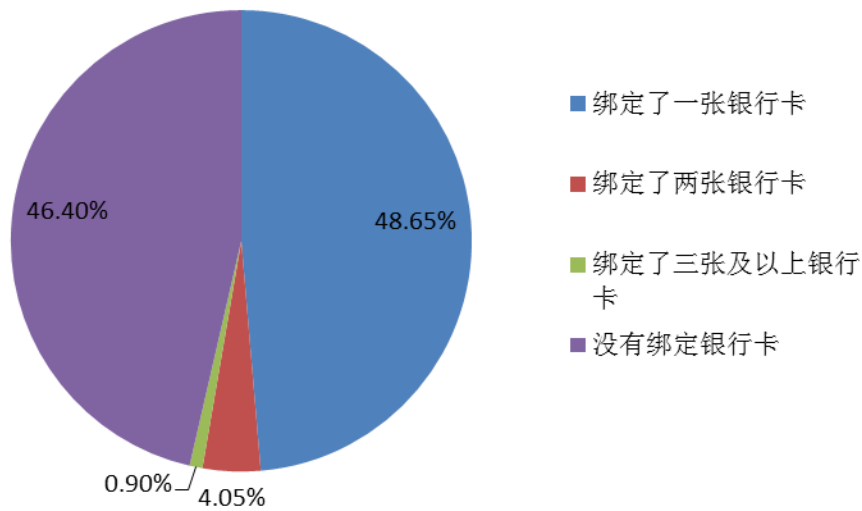


图 51 微信钱包绑定银行卡情况

在 131 个使用支付宝的受访者中，43.20%的人表示有账户但很少使用，29.60%的人表示每月都用但使用次数不足 5 次（见图 52），使用功能则多数是收付款、购物、手机充值和生活缴费这些基本功能（见图 53）。这说明即使使用微信钱包和支付宝支付方式，其使用频率也很低。但值得注意的是，从绑定银行卡的情况来看，在支付宝的使用者中，有 91.6%的人绑定了银行卡（见图 54），明显高于微信钱包的银行卡绑定率 53.6%，这说明受访者更认可支付宝的支付安全性，其原因是农民对微信钱包的使用最主要的不是其支付功能而是通信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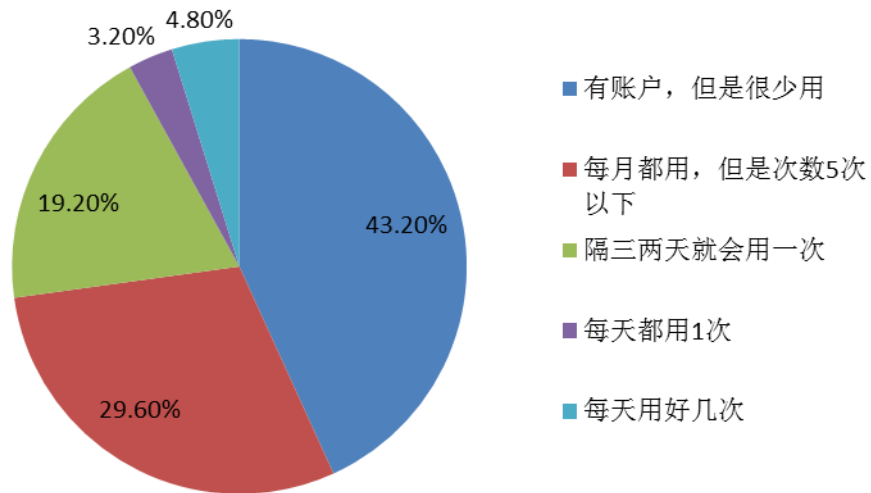


图 52 每月使用支付宝的频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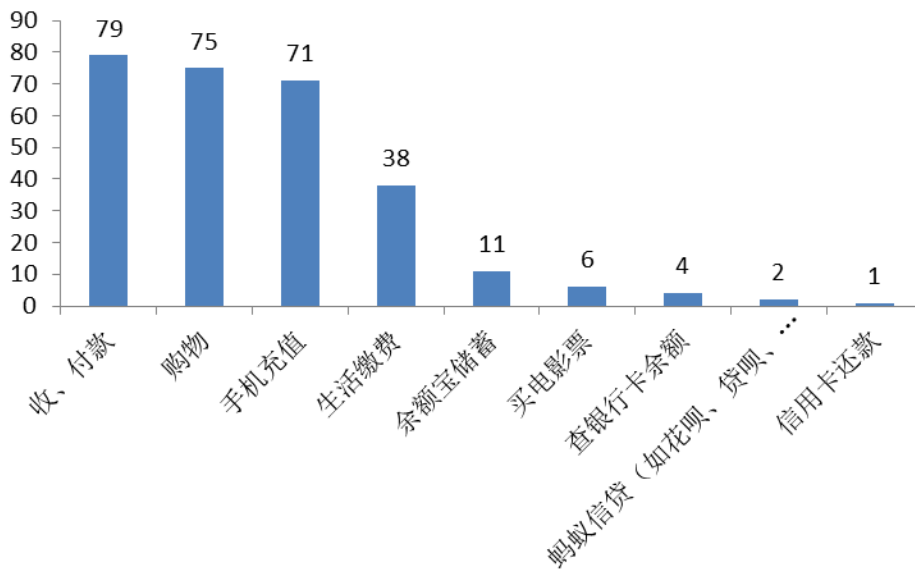


图 53 使用支付宝功能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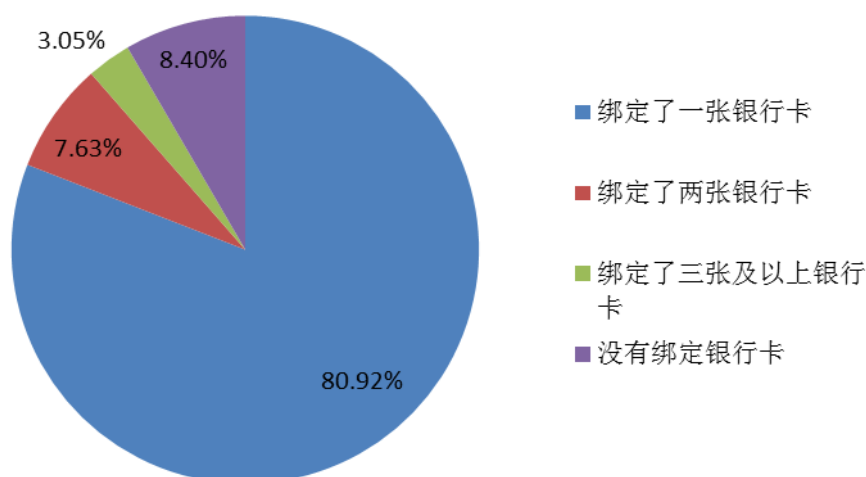


图 54 支付宝绑定银行卡情况

数字普惠金融依赖于数据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应用。一般而言，数据技术首先在城市和发达地区发展应用，在欠发达地区滞后。但是存在由于技术发展而使欠发达地区后发先至的可能性。目前中国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可以使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从低水平直接跃进到较高的水平。这种跃进是需要前提条件的，例如移动电话特别是智能电话的使用的拥有率等是手机银行和手机支付的必要条件。从上述的数据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智能手机在农村的覆盖范围已经较高，但手机银行及第三方支付服务的使用率低，其根源还是在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或能力较低。这说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更需要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能力。

（六）金融教育供给不足是影响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提升的重要原因

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金融知识的掌握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金融教育对金融能力的提高至关重要。金融教育对于普及金融知识、提高金融技能以及提升金融素养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需要从福利模式转型到能力模式，通过金融教育提高其金融能力，以确保低收入家庭可以获得合适的产品和服务。这也是我们在基线调查中的一个重要发现。

1. 金融教育供给不足，农村居民提升金融能力意愿不强烈

（1）金融教育培训供给主体单一、金融教育宣传较少

金融服务提供方、政府部门和教育机构是为农民提供金融教育培训的三大主体，但三大主体的参与度有较大差距。金融机构是主要的供给主体，政府部门和教育机构的贡献度相对较弱。155名参加过金融教育培训的受访者中，78%的受访者的培训是由金融服务提供方（包括银行、农信社、小贷公司）组织的，18.7%的受访者的培训是由政府部门组织的，12.9%的受访者的培训是由专业教育机构组织的（见图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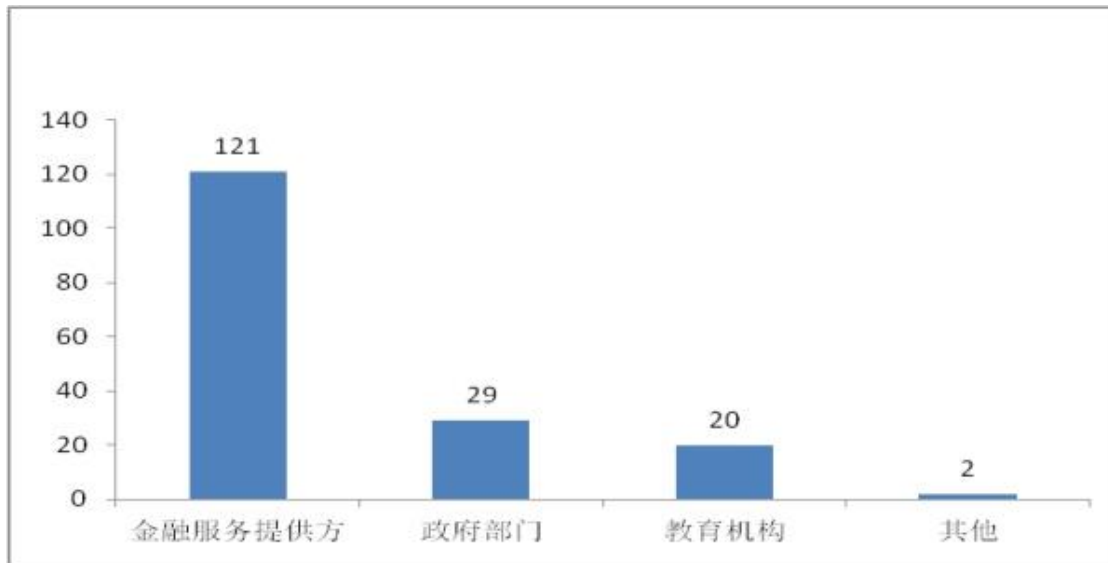


图 55 参加金融教育培训的主办方

此外，日常的金融知识宣传也是农户获取金融知识的有效途径。调研农民常去的银行或信用社是否有对其进行金融知识宣传一题中，我们了解到，64.73%的农民选择没有，13.7%的农民选择不知道，只有21.58%的农民选择有。这进一步说明农村金融教育的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金融机构应抓住各种机会对农民进行金融知识的普及宣传，政府和教育机构也应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受教育机会，通过提供金融教育，逐渐培养其金融素养，提升其金融能力（见图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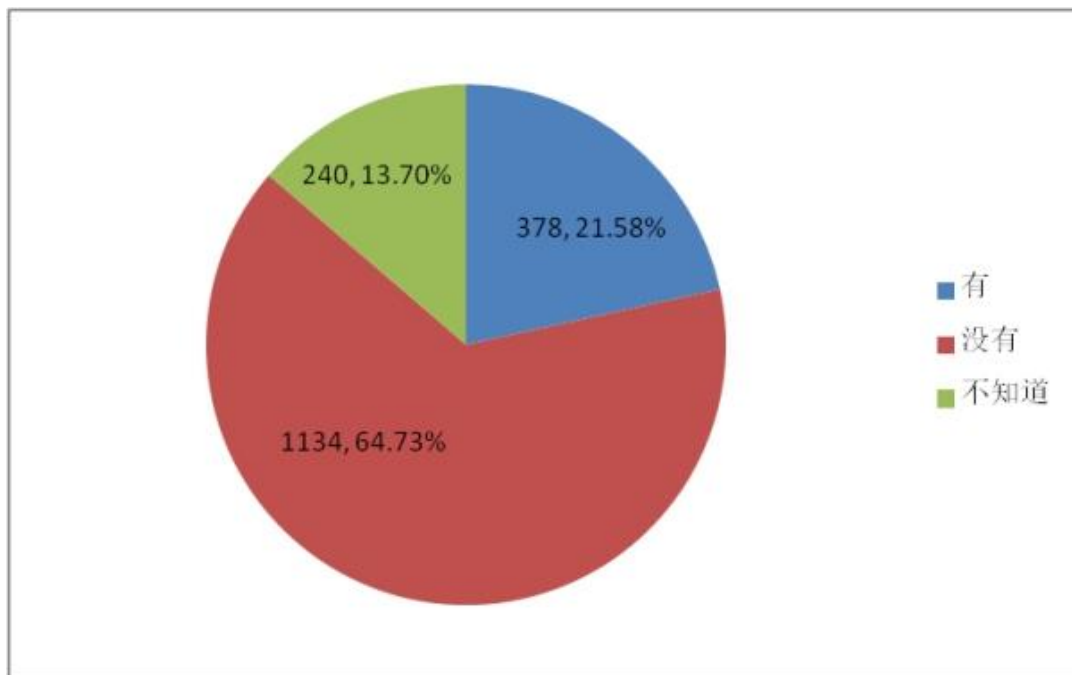


图 56 银行或农信社是否进行金融知识宣传

(2) 金融知识获取渠道有限

农民获取金融知识的渠道是影响农民金融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更多形式、更多途径去了解金融信息、利于农民接受金融知识。调研中发现，除了金融教育的培训，农民一般也会从观看电视节目、阅读业务宣传单等渠道进行金融知识的学习。1752 位受访者中，有 1094 人会通过观看电视节目了解金融知识，占绝对比重（62.4%），有 455 人通过阅读业务宣传单获取，通过阅读手机短信（114 人）和参加集中培训（138 人）获取金融知识的人数相近（见图 57）。可喜的是农民不拒绝获取金融知识，愿意通过看电视、阅读传单等途径学习金融知识。但是统计数据也表明，在信息化时代农民接受信息的渠道还是过于狭窄、多种获取信息的渠道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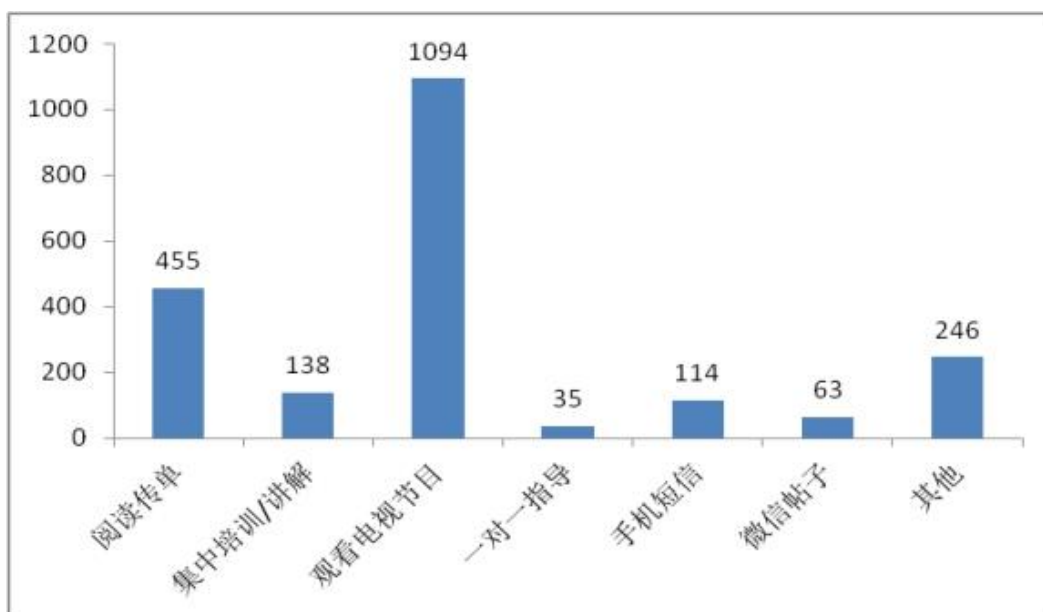


图 57 了解金融知识的渠道

在过去一年中，是否主动向亲戚朋友请教学习金融知识（如何申请贷款、如何存款、如何使用网银和手机银行）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 76.66% 的农民选择没有，11.42% 的农民选择不知道，仅有 11.33% 的农民进行过请教学习（见图 58）。大多数农民未主动向亲戚朋友请教学习金融知识，一方面，农民主观上金融意识淡薄，认为学习金融知识并不是必要的，金融需求不多且和自身利益关系不大；另一方面，这与农民及其周边亲戚朋友自身的金融教育水平都较低、农村整体的金融教育氛围不浓的现实情况也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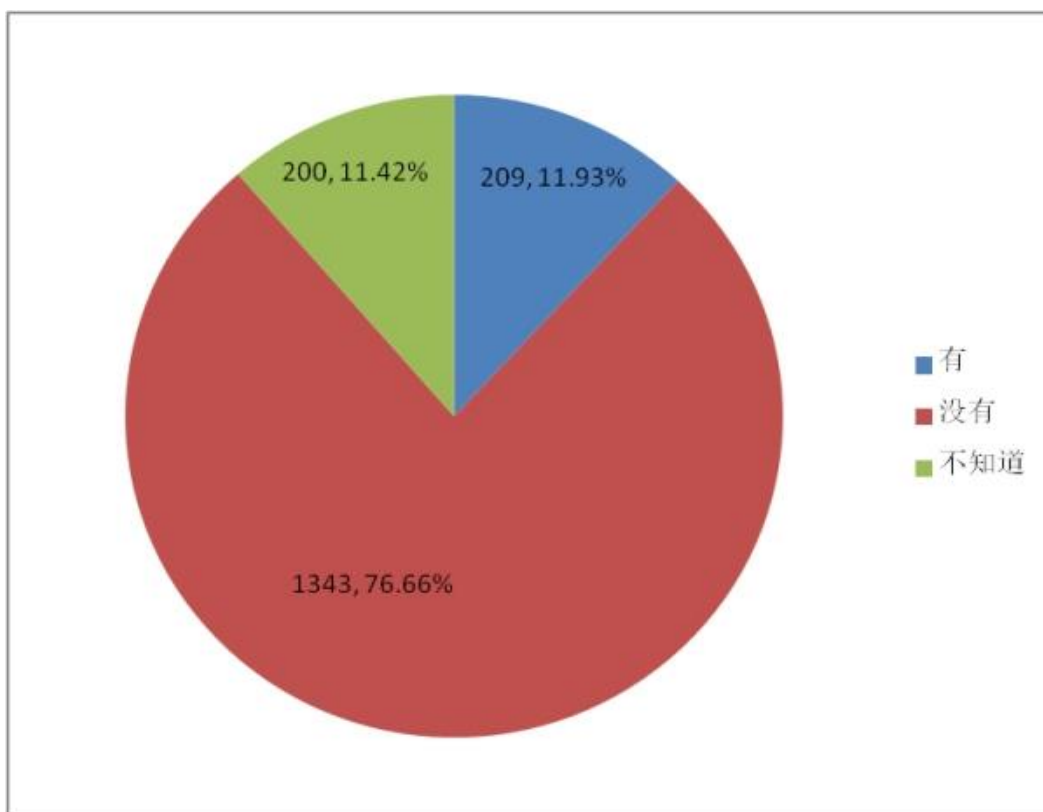


图 58 是否主动向亲戚朋友请教学习金融知识

(3) 金融教育培训参与比例低，提高金融能力的积极性不高

在 1752 个受访者中，过去一年里参加过金融教育培训的人仅占 8.85%（见图 59）。这说明农民金融意识薄弱，针对农民的金融教育培训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农民的金融教育水平较低直接导致农民的金融能力水平也较低。金融机构及相关机构应主动调研了解农民的金融需求和困难，有针对性地组织农民进行金融知识的学习，提高农民的金融素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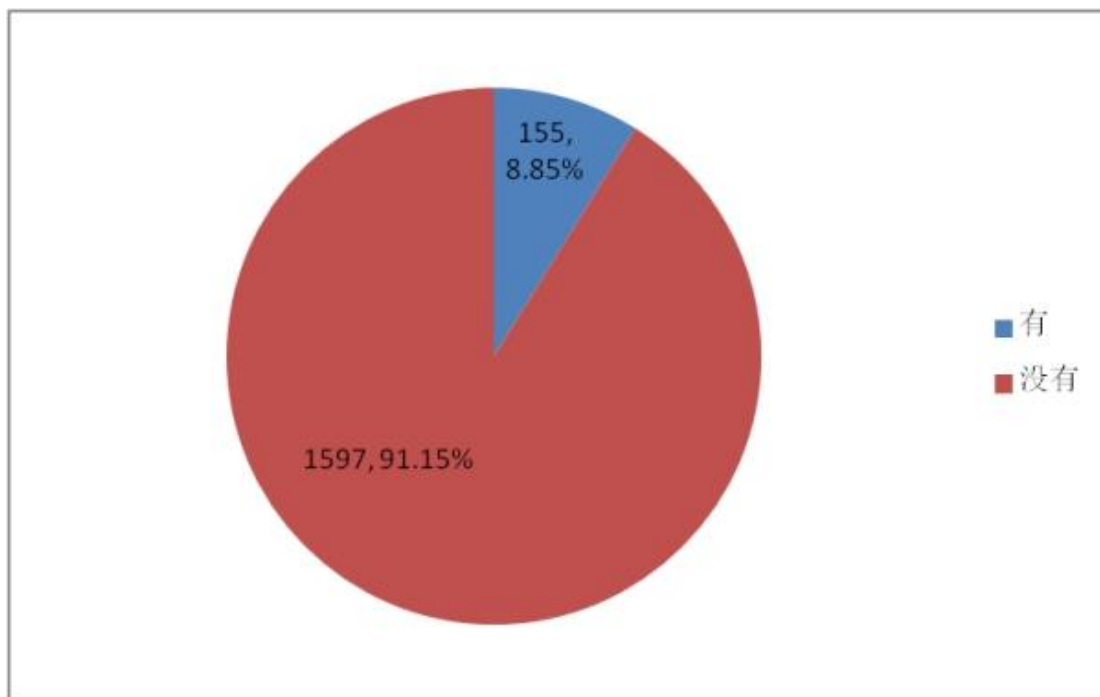


图 59 过去一年参加金融教育培训情况

金融知识掌握程度不高、金融素养偏低

在对金融知识掌握情况的调研中，只有如何区分假币这一项金融知识是农民普遍掌握的技能，对于保险、股票、期货方面的知识掌握几乎是空白，调研中，很多农民甚至不知道这些名词。农民的金融知识水平仅限于货币支付、贷款流程、真假币识别等，对于金融工具的运用情况几乎不了解。对于金融机构也仅限于知晓银行、农村信用社，对保险公司、期货公司知之甚少（见图 60）。一方面说明农户的金融知识及金融需求有限，金融能力较低；另一方面也反映农村金融教育比较落后，硬件条件、传播推广等都远落后于城市。通过数据可以分析，农民的金融知识普及、金融教育开展的任务任重道远。

在调查是否知道如何查询自己的征信记录一题中，统计数据比例十分悬殊。近 1:8 的比例（见图 61）又一次反映农民金融意识淡薄、

金融知识掌握程度不高、金融教育水平低，也凸显出金融排斥在农村的普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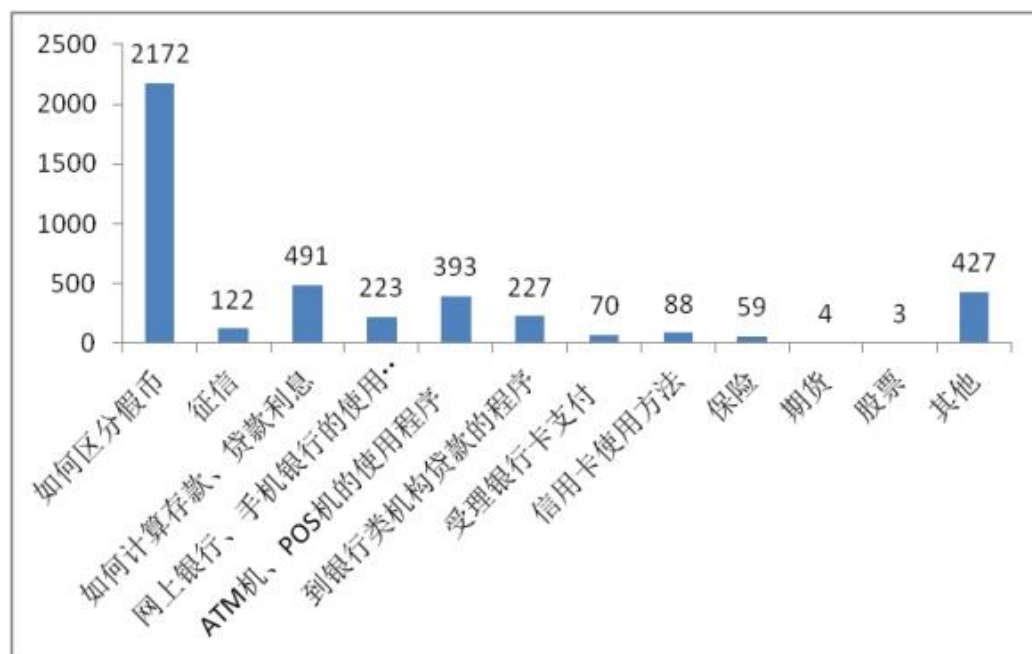


图 60 掌握金融知识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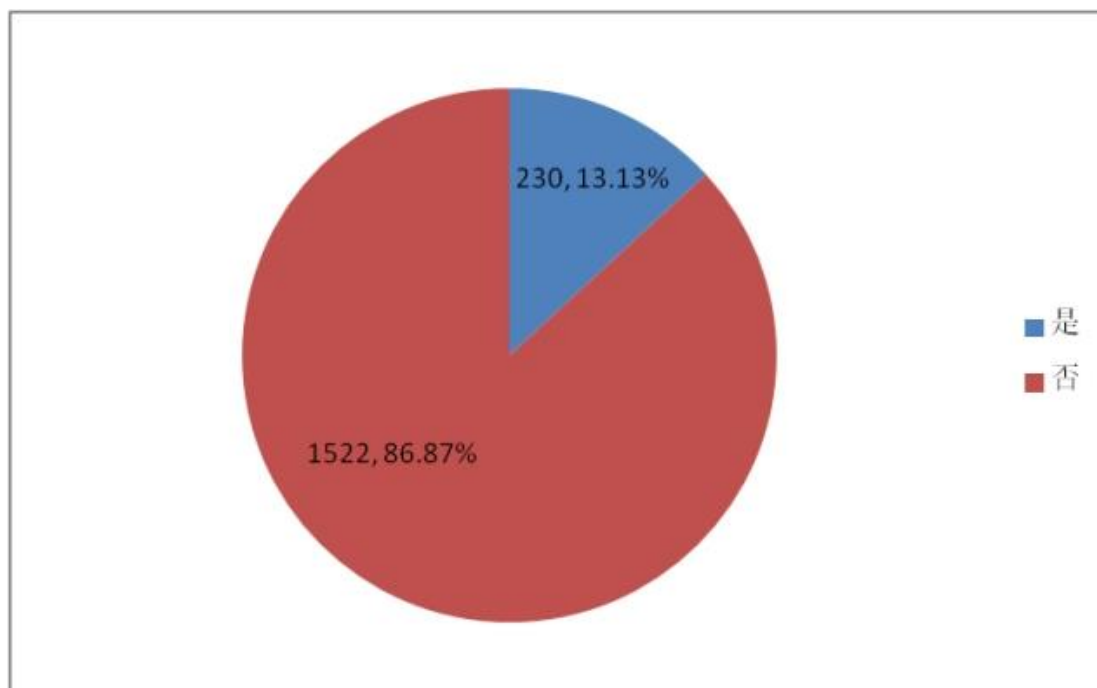


图 61 是否值得如何查询自己的征信记录

2. 受访者个体特征影响金融素养提高

(1) 男性比女性参加金融培训的比例更高

在全部的受访者中，男性、女性农民参加金融教育培训比例都较少，但女性受访者的参与度明显低于男性受访者。过去一年中，参加过金融教育培训的男性比例为 10.75%，女性比例则更少，为 5.72%，是男性比例的 1/2（见图 62）。因此，开展农村金融教育时，对女性的金融知识教育更需特别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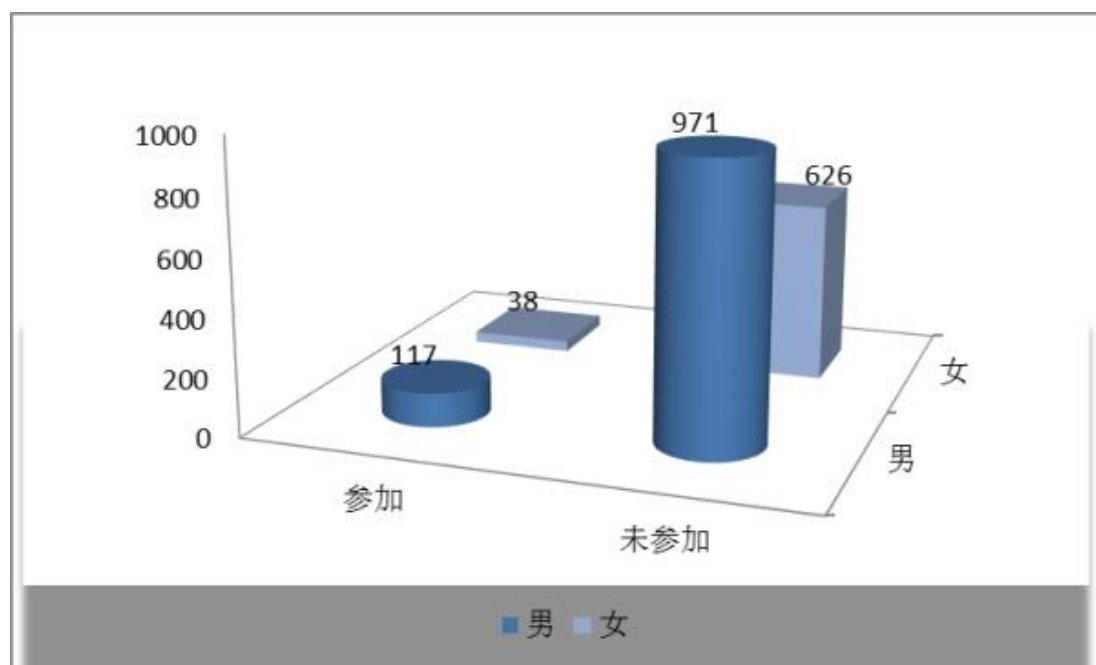


图 62 不同性别农民在过去一年中参加金融培训的情况

(2) 年龄差异抑制参与金融培训的积极性

受访者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35-65 岁，其中 45-65 岁占一半左右。但参加培训人群主要分布在 35 岁以下，其中，18 岁以下为 14.3%，18-35 岁之间为 16.3%（见图 63）。可以看出，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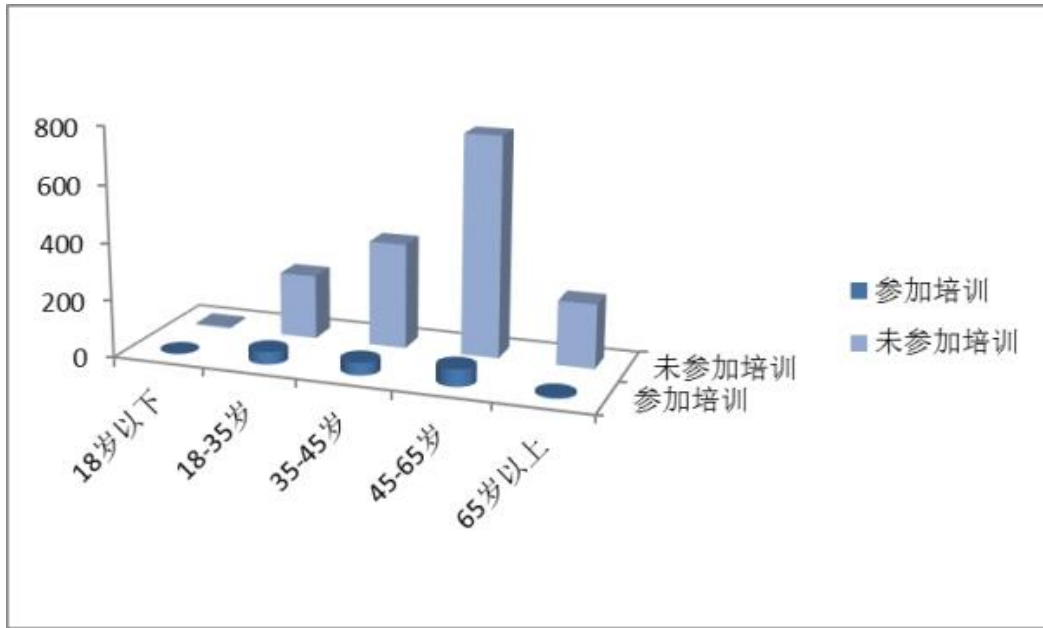


图 63 不同年龄段农户在过去一年中参加金融培训的情况

(3) 受教育程度影响金融知识学习态度

受教育程度是金融教育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金融素养与受教育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但随着农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参加金融培训的意愿增强，主观态度也更积极。受访者过去一年参加金融培训占比从 6.34%（小学以下学历）提升到 45.16%（大专及以上学历），（见图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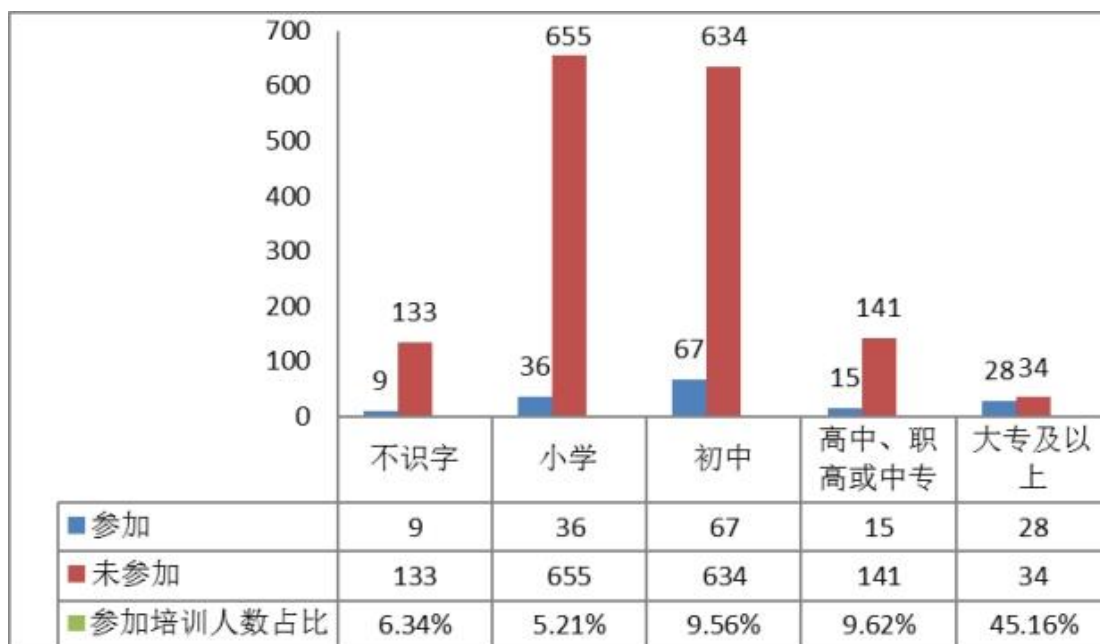


图 64 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户在过去一年中参加金融培训的情况

(4) 受教育程度制约数字金融使用

受教育程度高低会影响农民的金融意识和态度，更会影响其金融行为。随着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的使用率呈显著上升趋势。可见，受教育程度与数字金融的使用状况直接相关(见图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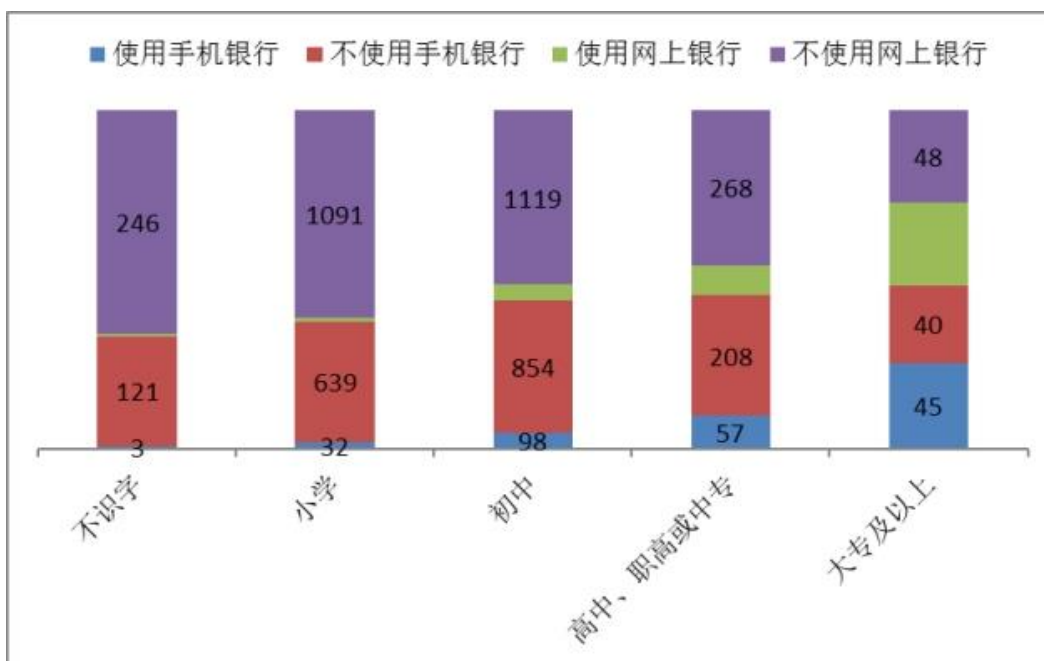


图 65 受教育程度与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使用情况之间的关系

(5) 金融教育培训影响风险偏好

调研显示，受教育程度、收入状况、贫困与否是金融教育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金融素养与受教育水平、家庭非贫困情况、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教育水平又影响农户的意识、态度、投资偏好、行为，而这些属于金融能力的范畴。参加金融教育培训的农民对风险和回报有更平静、理性的认识和选择，未参加培训的农民不太擅长做金融分析、决策，风险承受能力较弱，也不愿意承受风险（见图 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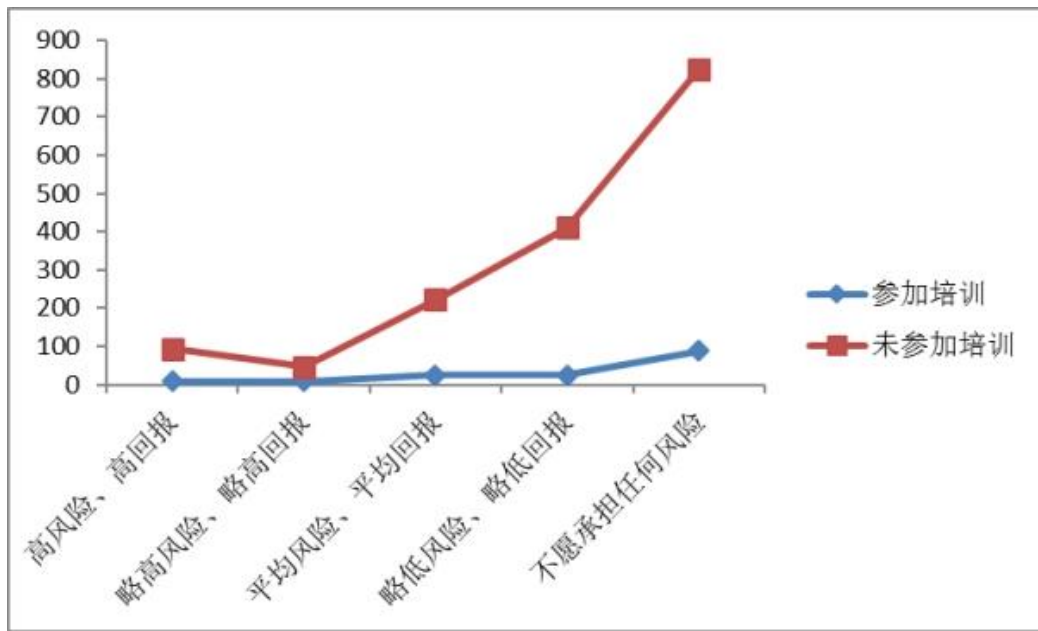


图 66 金融教育培训对风险承受能力影响情况

四、金融能力的影响

金融能力包含金融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其中金融知识是金融能力的重要基础，其内容也非常丰富，包含一些专门的知识，也包含无论是企业和个人都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利率知识就是一种基本的金融知识，反映资本的时间价值，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常常涉及和应用。为了便于分析，本节以“有无利率计算能力”作为代理变量，反影金融知识的作用和影响。必须指出的是，利率计算能力只是金融能力的一方面，不能代表全部的金融能力。

用于分析的数据包含大兴安岭南麓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三个省区 19 个县 3010 个农民，体现样本农民 2015 年和 2016 年的金融行为和生活状况。问卷包含一个问题“您掌握以下金融知识吗”，有 491 位受访者的答案是他们知道“如何计算存款、贷款利息”。这种肯定的答案体现他们具有相当程度的金融知识，对自己的金融能力比较有信心。这种金融知识和自信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在长期生产生活中，通过自发的和被动地学习，包括从电视、培训和朋友学到一定的金融知识。长期积累的金融知识转过来指导未来的金融决策，改善决策的质量，最终提高收入，改善其生活水平。

分析的方法是把调查问卷数据分为两样本，对比分析金融知识如何影响个人的金融行为、生产生活决策和生活水平。分析发现，在经济和金融知识在正规教育中缺失的情况下，人们只能从电视、宣传材料、培训、手机短信、微信帖子等途径获得金融知识。也证明这种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这些手段来有效地提高金融知识和能力。尤其是培训、手机和微信，已经成为了比较有效的普惠金融能力提高

的重要途径。分析也发现，金融能力的提高，可以增加金融服务的需求和使用，由此改善生活条件。

1. 什么因素影响金融知识传播

中国几十年的应试教育，导致从学校里学到的知识与实际生活的脱离。人们需要自学或者从别的途径来获得日常生活的知识和技能。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缺乏经济学的基础知识。经济活动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除了与经济和金融相关的学科，学生是从课堂上学到经济和金融知识的有限。结果使中国成年人口中具有金融知识的人口比例非常低。

在进行经济决策的过程中，需要使用到很多金融知识，其中利率计算是最常见和使用频率比较高的金融知识，是大多数成年人日常需要掌握的知识。可是在大兴安岭南麓贫困片区的调查中发现，只有16.3%成年人认为自己知道怎么计算利率。这样一个最基本常用的金融知识，竟然有83.7%成年人没有掌握，可见金融文盲率高的惊人。金融启蒙教育是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一个迫切需要的工程。

深入比较就可以发现金融教育中整个教育系统中的缺失。调查样本中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成年人超过55%。大大超过金融具有利率知识的比例，也就是，很多成人即使经过了初中以上的学历教育，也没有掌握利率运算能力。体现了正规的学校教育 with 金融素养没有直接的关系。大多数人是在教育体系之外通过自己途径获得金融知识的。当然良好的基础教育对从课堂之外获得金融知识是有贡献的。如图67所示，在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群中，受教育程度越高，掌握利率知识的

比例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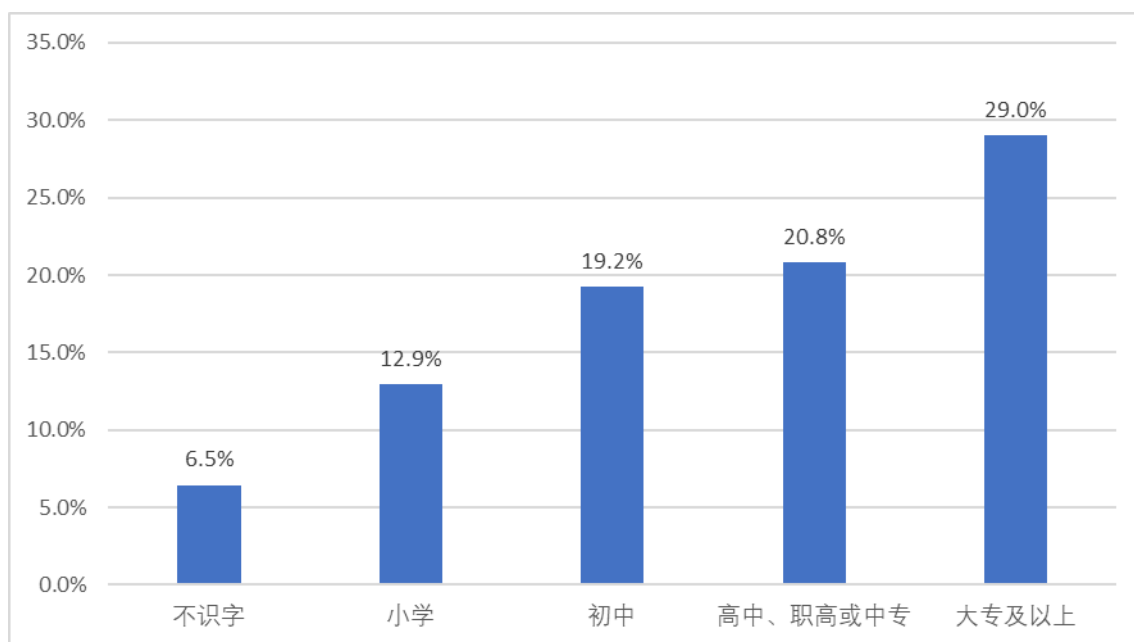


图 67 有利率知识成年人教育程度分布

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成年人，常常在社会和家庭经济决策中扮演重要决策，他们是否具有较高的金融能力影响经济的整体效率。但是调查发现，他们当中只有 29% 的掌握利率知识。具有初中和高中学历的成年人，也只有 20% 左右能够进行利率运算。可见无论是教育程度高低，大多数成年人都是金融启蒙教育的对象。

成年人学习模式是要满足实际需要的，多数情况下是在生活中遇到了问题，才会被动地学习。图 68 显示，是否有利率计算能力与职业有一定的关联。个体和私营企业主，由于经营活动中需要考虑成本，常常涉及利率计算问题，比较注意利率知识的学习，因此他们当中掌握利率知识的比例比较高，占 23.7%。诚然，这个比例也是比较低的，

还有 76.3% 的经营者不掌握利率知识，可见他们的金融能力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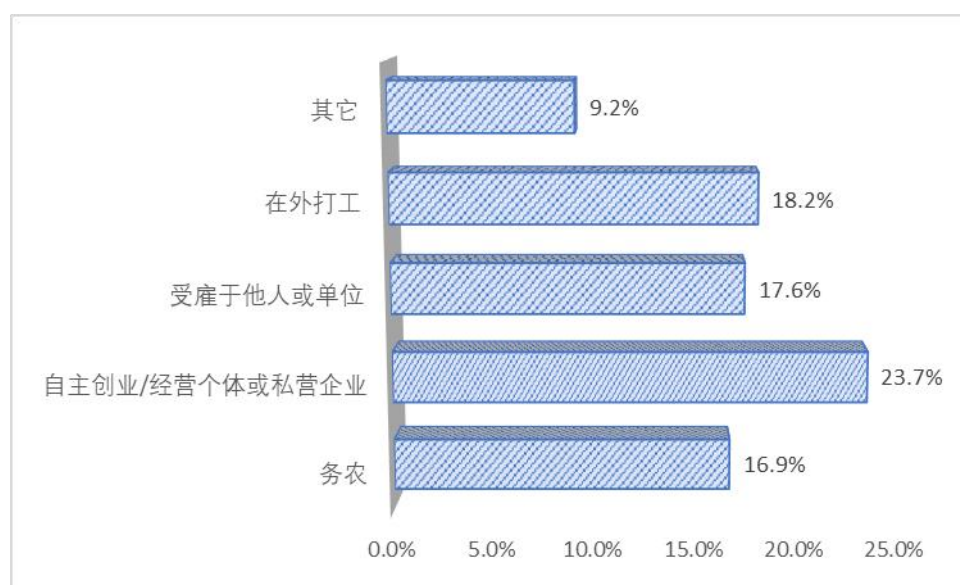


图 68 有利率知识成年人职业状况

开展金融启蒙教育，需要考虑年龄因素。调查发现，利率计算能力在各年龄段有比较规律的分布。如图 69 所示，大约在小于 40 岁的年龄段，随着年龄的增加，能够具有利率计算能力的成人比例在增加。因为在学校都没有正规的经济或金融知识学习，但由于生产生活需要，利率知识随年龄增长而积累；对于大于 40 岁的成年人，由于他们是在轻视利率的文化生产环境中成长的，加上文化程度相对低，年龄越大的人群，对利率越是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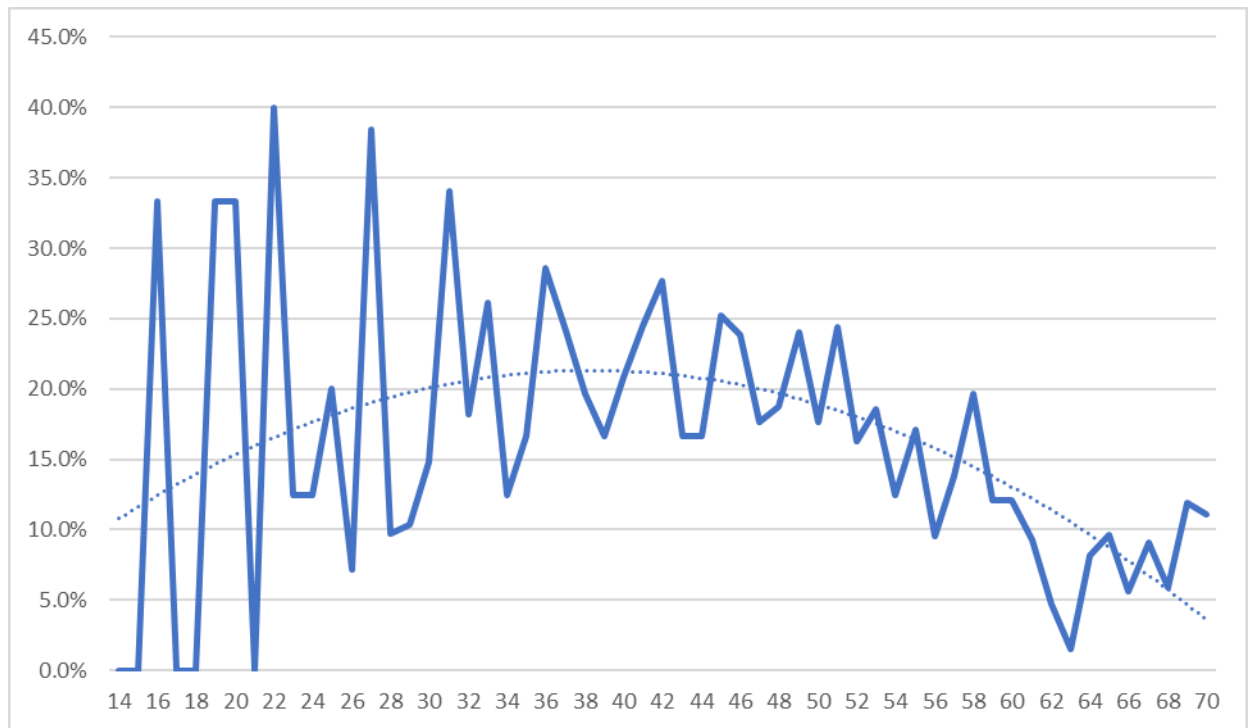


图 69 有利率知识成年人年龄分布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利率知识与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关联。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人群，利率计算能力比例越高。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两者是否有因果关系，这可能是年龄在背后起作用，年龄较大的成年人身体较差，同时利率能力低。另外，利率知识与性别有关，有 18% 男性和 14% 女性具有利率计算能力，可能是因为男性在经济活动中比较活跃，因而更注意利率知识的学习（图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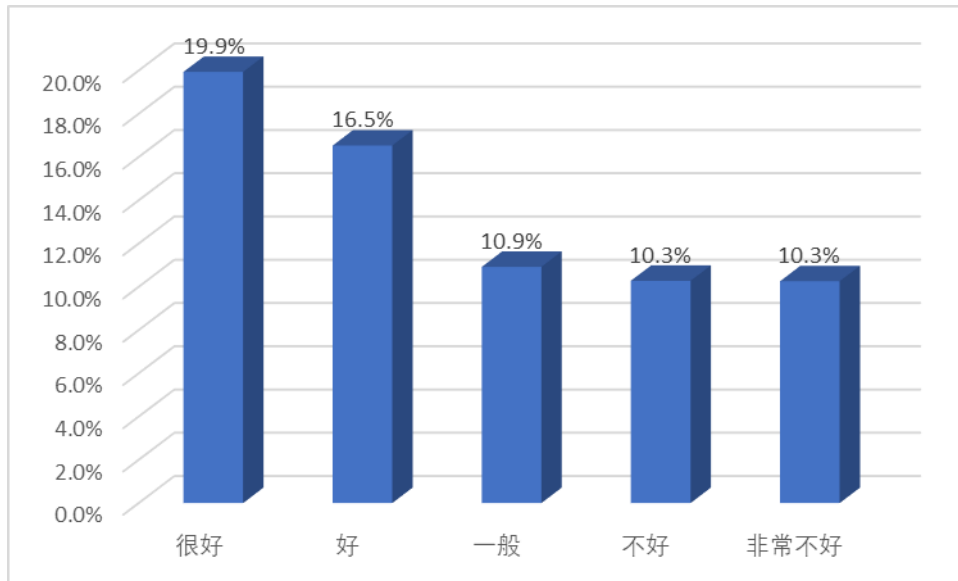


图 70 有利率知识成年人的健康状况

经济和金融知识还没有成为我国教育体系中必修的内容,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除了经济类毕业生,相当比例的成年人还属于金融文盲,缺乏金融知识,金融能力低。这种状况迫使人们在实践生产生活中,特别是与金融相关密切的人群,自发学习金融知识,造成国家整体金融能力低的现状。发展普惠金融,提高金融能力的任务很艰巨。

2. 从什么渠道能促进金融知识传播?

由于金融和经济知识没有被包含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中,培训是成年人掌握金融知识的重要手段之一。问卷调查发现,参加过培训的成年人有 16.8%掌握利率计算知识,在没有参加过金融培训的成年人中只有 13.2%知道如何计算利率。这个结果说明,培训的确可以增加金融知识,同时也说明培训不是学习金融知识的唯一渠道。表 22 中,参加过金融机构培训的成年人中有 17.4%掌握了利率计算方法,在明

确表示没有参加过培训的人中只有 14.7% 具有利率计算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大量的问卷是无效问卷，如果假设没有明确回答的受访者当作没有参加培训看到，其比例更低。政府举办的培训也是如此。总之，调查证明培训确实增加成年人的金融知识。

表 22 培训对金融知识的影响

获得金融知识的渠道			利息知识		合计
			无	有	
阅读传单	否	计数	1137	160	1297
		%	87.7%	12.3%	100.0%
	是	计数	378	77	455
		%	83.1%	16.9%	100.0%
集中培训 /讲解	否	计数	1404	210	1614
		%	87.0%	13.0%	100.0%
	是	计数	111	27	138
		%	80.4%	19.6%	100.0%
观看电视 节目	否	计数	578	80	658
		%	87.8%	12.2%	100.0%
	是	计数	937	157	1094
		%	85.6%	14.4%	100.0%
一对一指 导	否	计数	1485	232	1717
		%	86.5%	13.5%	100.0%
	是	计数	30	5	35
		%	85.7%	14.3%	100.0%
手机短信	否	计数	1441	197	1638
		%	88.0%	12.0%	100.0%
	是	计数	74	40	114
		%	64.9%	35.1%	100.0%
微信帖子	否	计数	1477	212	1689
		%	87.4%	12.6%	100.0%
	是	计数	38	25	63
		%	60.3%	39.7%	100.0%
其它	否	计数	1289	217	1506
		%	85.6%	14.4%	100.0%
	是	计数	226	20	246
		%	91.9%	8.1%	100.0%

问卷调查了受访者对传单、集中培训、电视节目、一对一指导、手机短信、微信帖子和其他途径的有效性情况，表 23 显示，似乎所有的方法都有一定的效果。最值得注意的是手机短信和微信帖子在传播金融知识具有很好的效果。在报告他们从手机短信和微信帖子获得金融信息的群体中，有 35.1%和 39.7%的人是掌握利率知识的，大大超过没有从手机短信和微信帖子获得金融知识的人群。当然我们掌握的数据还不能确切证明是手机短信和微信帖子增加了金融知识？还是金融知识促进人们从手机短信和微信帖子获得金融信息？

表 23 获得金融知识的渠道

获得金融知识的渠道			利息知识		合计
			无	有	
阅读传单	否	计数	1137	160	1297
		%	87.7%	12.3%	100.0%
	是	计数	378	77	455
		%	83.1%	16.9%	100.0%
集中培训 /讲解	否	计数	1404	210	1614
		%	87.0%	13.0%	100.0%
	是	计数	111	27	138
		%	80.4%	19.6%	100.0%
观看电视 节目	否	计数	578	80	658
		%	87.8%	12.2%	100.0%
	是	计数	937	157	1094
		%	85.6%	14.4%	100.0%
一对一指 导	否	计数	1485	232	1717
		%	86.5%	13.5%	100.0%
	是	计数	30	5	35
		%	85.7%	14.3%	100.0%
手机短信	否	计数	1441	197	1638
		%	88.0%	12.0%	100.0%
	是	计数	74	40	114
		%	64.9%	35.1%	100.0%
微信帖子	否	计数	1477	212	1689
		%	87.4%	12.6%	100.0%
	是	计数	38	25	63
		%	60.3%	39.7%	100.0%
其它	否	计数	1289	217	1506
		%	85.6%	14.4%	100.0%
	是	计数	226	20	246
		%	91.9%	8.1%	100.0%

3. 金融知识是否能增加使用银行等金融服务的能力？

在普惠金融框架下讨论金融能力，是要通过提高金融能力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但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就是，金融能力提高以后，人们会有什么表现？我们设想，有金融能力的人在经济活动中更能够掌握自己的主动性，更能够抓住机会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但是需要从调查数据中获得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设想的正确性。

具有金融知识使人能理解和关注其周围的金融服务状况,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不会浪费机会,主动利用金融服务来改善自己的生产生活条件。就金融服务而言,拥有银行卡是活动服务的开始,因此,有金融知识的人能认知到银行卡的重要性,拥有更多的银行卡。调查数据证明了这一点。表 24 是用统计学 T 测验来检验有无利息知识两组样本拥有银行卡数有没有显著的区别,其结果说明有利率知识的成年人无论储蓄卡和信用卡持有的数都比较多。

表 24 有无利率知识的持卡数差异

银行卡类别	利息知识		均值差 值	标准误 差值	t值	Sig. (双 侧)
	有	无				
储蓄卡数	2.28	1.87	.416	.050	8.307	.000
信用卡数	1.09	1.03	.056	.014	4.047	.000

银行卡的拥有并不意味着银行服务的使用,表 25 显示,掌握金融知识的人,更多地选择使用银行、小贷公司和保险公司服务,分别多出 3.7、0.6 和 4.8 个百分点。特别是在商业保险方面,如表 26 所示,无论在财产、农业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有金融知识的样本中购买这些商业保险的比例都比较高。

在使用数字金融服务方面,有利率知识一组也有良好的表现。在使用支付宝、微信、银行卡和网银支付的比例均明显增高,分别高出 6.6、7.7、5.0、1.6 个百分点。

表 25 有无利息知识的金融服务使用差异

			未使用金融服务			银行服务			小额贷款公司			保险公司		
			否	是	合计	否	是	合计	否	是	合计	否	是	合计
掌握 利息 计算 方法	否	计数	991	524	1515	546	969	1515	1499	16	1515	1428	87	1515
		%	65.4%	34.6%	100.0%	36.0%	64.0%	100.0%	98.9%	1.1%	100.0%	94.3%	5.7%	100.0%
	是	计数	164	73	237	76	161	237	233	4	237	212	25	237
		%	69.2%	30.8%	100.0%	32.1%	67.9%	100.0%	98.3%	1.7%	100.0%	89.5%	10.5%	100.0%
合计		计数	1155	597	1752	622	1130	1752	1732	20	1752	1640	112	1752
		%	65.9%	34.1%	100.0%	35.5%	64.5%	100.0%	98.9%	1.1%	100.0%	93.6%	6.4%	100.0%

表 26 有无利息知识的保险购买率差异

			财产保险			农业保险			农村养老保险		
			否	是	合计	否	是	合计	否	是	合计
掌握 利息 计算 方法	否	计数	1861	38	1899	1690	209	1899	1513	386	1899
		%	98.0%	2.0%	100.0%	89.0%	11.0%	100.0%	79.7%	20.3%	100.0%
	是	计数	378	26	404	326	78	404	301	103	404
		%	93.6%	6.4%	100.0%	80.7%	19.3%	100.0%	74.5%	25.5%	100.0%
合计		计数	2239	64	2303	2016	287	2303	1814	489	2303
		%	97.2%	2.8%	100.0%	87.5%	12.5%	100.0%	78.8%	21.2%	100.0%

4. 金融知识是否有助于提高信贷能力？

一般而言，具有金融知识的人会更有效地使用信贷，尤其是那些精于利率计算的人，更能够理解资本的使用成本。调查发现，在有利率知识的人中有 40.5% 去年申请了贷款，没有利率知识的只有 21.8% 申请了贷款。这也说明了“因缺乏金融知识而心存恐惧，继而回避金融服务”的观点。

金融知识对金融服务使用的结果还反映在信贷的使用上。具备金融知识，特别是利率知识，在信贷的使用上更加明智，他们把贷款主要用于生产投资而不是消费。在表 27 中，有利息知识组在农业及工商业和金融投资两个用途的借款，显著多于无利息知识信息组，特别是农业及工商业借款，相差到 1.09 万元，T 测验证明了这个差异的真实性。在其他用途的借款虽然也比较高，但是没有通过统计学的检验。这充分说明，金融知识可以改善决策的合理性。

不仅是在金融机构借贷有差异，有金融能力的一组平均从民间借贷达 50272 元，缺乏金融能力的一组的民间平均借贷额只有 33276 元相差近 1.7 万元，两组平均值的差异通过了统计学的显著性检验。

表 27 有无利率知识的借贷差异

收入类别	利息知识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值	t值	Sig. (双侧)
	有	无				
农业及工商业借款	23327.1	12396.8	10930.3	3775.8	2.8949	.0038
房屋借款	4969.2	3730.8	1238.4	1210.6	1.0229	.3064
汽车借款	1500.0	1003.9	496.1	785.5	.6316	.5277
金融投资借款	470.2	84.4	385.8	157.1	2.4556	.0141
信用卡借款	368.2	232.8	135.3	194.2	.6969	.4859
教育借款	1292.9	811.8	481.1	319.9	1.5040	.1327
其他借款	3788.1	3869.3	-81.2	1363.3	-.0596	.9525

利率知识最直接的应用就是在贷款时正确计算利率，避免高利率。调查发现，具有利率知识的受访者从金融机构贷款的平均利率为 5.9%，而没有利率知识的一组支付的平均利率为 7.43%。但是这种差异没有通过统计学的检验。在民间借贷的结果却相反，具有利率计算能力的一组表现得更敢于使用民间更高利息的借贷，其支付民间借贷的平均利率为 6.37%，而无利率计算能力组支付的民间借贷平均利率 3.7%。金融知识的效果显而易见。

在未来的贷款需求上，具有金融知识一组，有 27.2%表示未来借贷的意愿，无金融知识一组只有 17.9%有贷款需要。需求的额度也不一样，有利率计算能力的，借贷能力也高，表现在（图 71）他们在高额度借款的比例均高于无利率计算能力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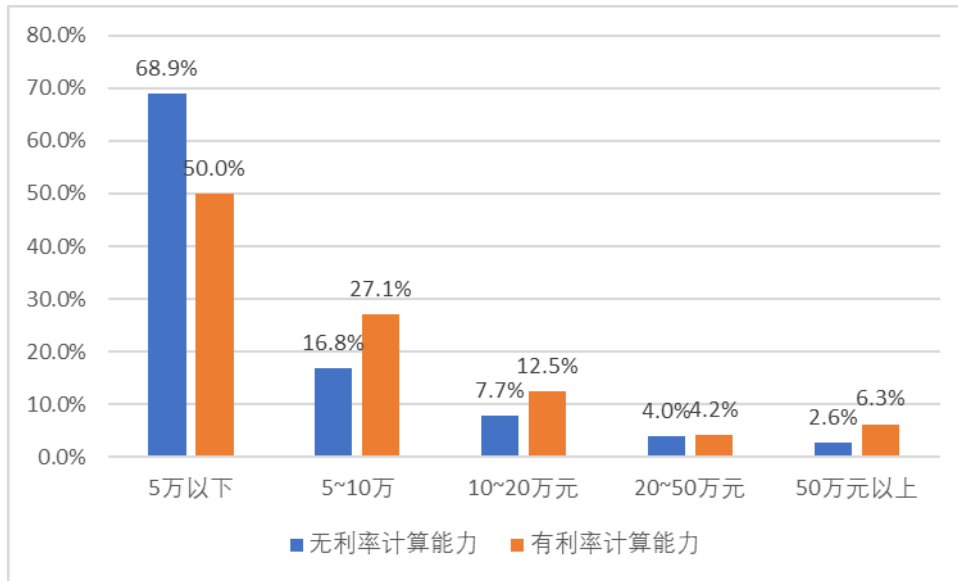


图 71 贷款计划比较

以利率知识有无来衡量金融能力进行的对比分析表明，金融能力提高可以增加贷款的能力，从贷款的额度和利率水平的接受能力，都体现了金融能力的显著作用。

5. 金融知识是否与生活水平相关？

无论是发展普惠金融，还是提高金融能力，其最终目的就是提高收入改善生活。一般来说，金融能力作为一种人力资本直接地和间接地投入生产活动。金融能力提高了融资能力、使用金融服务能力、在生产生活决策能力，其结果会导致与之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效率的提高，因此提高收入。表 28 显示，掌握利息知识的家庭中农业、工商业和工资收入都明显高于没有利率知识的家庭，T 检验达到 95% 的显著水平，说明两组家庭确实存在差异。而在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方面，两类家庭虽然有差异，但是 T 测验没有达到显著水平，没有把握说两组家庭的这两项差异有本质的区别。

表 28 利息知识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收入类别	利息知识		均值差 值	标准误差 值	t值	Sig. (双侧)
	有	无				
农业收入	37592.7	24600.0	12992.6	3523.8	3.6871	.0002
工商业收入	6792.3	2041.4	4750.9	1635.4	2.9050	.0037
工资性收入	9390.3	4529.5	4860.7	1234.3	3.9380	.0001
财产性收入	3664.4	2026.5	1637.8	1100.6	1.4881	.1368
转移性收入	4396.4	2811.8	1584.6	1189.4	1.3322	.1829

当前大多数研究聚集于如何提高金融能力，对金融能力提高以后会有什么结果的研究比较少。除了缺乏数据以外，由于金融能力造成的影响非常复杂，增加了评估的难度。另外就是大多数政策关注的是怎么做，都是在“金融能力的提高必然带来好结果”假设的基础上做出决策的。

从理论的角度，“培训-金融知识-金融能力-改善生产生活决策-改善生活”是一个合理的推理。部分研究已经从侧面证明了这个推理有一定的实证基础。Bernhait, Garret & Makit (2001) 研究发现，在开设金融必修课州成长的人比没有金融必修课州的人储蓄率高。Dane (2010) 发现，Collins (2010) 发现必修课对金融知识、行为、储蓄和征信有显著影响。Walstad, Rebeck & McDonald (2010) 用准试验方法分析发现金融教育是有影响的。

我们按有无利息知识，把一个包含 3010 个农户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分为两组，对比分析他们之间的差异，通过统计检验其差异的可靠性。结果让我们相信，培训能够增加金融知识，提高金融能力；金融能力能够刺激金融需求，改善金融决策，最终改善生活水平。金融知识和能力培训可以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措施。

金融知识对生活水平的影响过程，首先是影响个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增加他们主动获得金融服务，例如拥有银行卡和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等。其次是提高使用金融产品的能力，例如使用比较高额度的金融机构和民间贷款。第三是提高效率，例如更有效地利用金融机构的各种优惠政策，降低贷款利率。同时在利用民间资本时，表现出具有比较高的利息支付能力。说明他们可以使用成本较高的资本进行生产，也证明他们的生产效率比较高。最后，对使用金融服务具有较好的规划。

分析发现了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结果。除了培训以外，手机短信和微信帖子已经成为人们掌握金融知识的重要渠道。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充分利用手机和微信作为重要的渠道，可以有效地提高全社会的金融能力，促进普惠金融发展。

五、 金融能力与贫困

在大兴安岭南麓连片特困区，金融能力低和贫困交织存在，它们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弄清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寻找合适的解决路径。尤其是有利于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提高金融能力来解决贫困问题？

金融能力与贫困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一方面，金融能力作为个人人力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直接参与生产，影响生产效率。因此，金融能力的高低可以影响生产回报，左右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个人生产能力的改善可以提高金融能力。生产能力较高的个体，其生产规模往往比较高，对融资的需求大；也容易得到金融机构和社会的信赖，从而提高自己的信用；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利用各种融资渠道。金融能力不足影响生产能力的提高，导致贫困。另外，金融能力和生产能力可以受到某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例如教育程度、年龄、性别、基础社会、社会和文化背景等等。

金融能力最直接影响普惠金融发展，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使用性和满意度是目前比较普遍使用的衡量普惠金融三个维度。表 29 显示大兴安岭南麓连片特困区在办理银行业务方面，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差别。无论在柜台、ATM 机和村金融服务点，贫困户使用金融机构服务的次数都明显低于非贫困户。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这种差异与金融能力之间有没有关系。我们将通过对比建档立卡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普惠金融能力的表现来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表 29 银行业务办理次数对照表

银行业务次数	贫困户		非贫困户		总计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银行柜台办理业务次数	3.07	5.25	5.57	11.485	4.97	10.399
ATM机办理银行柜台业务次数	1.35	4.025	3.52	8.503	3	7.731
助农取款点/金融综合服务站次数	0.42	1.718	1.32	5.003	1.11	4.462

1. 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的区域差异

农村的金融服务是按区域的总需求来设置的，乡镇一级一般都设有金融服务分支机构，负责对乡镇周围的农户提高金融服务，在大多数的村一级金融机构通过代理商设置简易的终端设备提供服务。金融机构在布局服务网点时，主要考虑的是有足够的业务量来维持以获得成本效益的盈亏平衡点，使服务能够持续开展。不可否认，金融机构在政府的鼓励下在某些地方开设了服务网点，但是实际上有些网点很难维持。服务网点一旦建立，它的服务覆盖的整个范围。表面上，不会对贫困户区别对待。

但是在建设网点以及网点服务的过程中，由于商业可持续性的要求，导致贫困村的服务基础实施比较少，例如 POS 机设施的密度小。在黑龙江和内蒙古调查的数据 31 个行政村中，有 19 个村，占 61%，设有银行分支机构或者综合服务站，为当地村民提供存取款、转账、缴费、信贷和查询服务。简单对比有综合服务站和 12 个没有综合服务站的平均收入，可以发现，没有综合服务站的行政村收入的平均值为 7014 元，而有综合服务站的行政收入的平均值为 15688 元。说明了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的差距主要是村与村之间的差距。

基础设施的差距可以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加以缩小。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电话信号、互联网、电视等在各个村得到普及，成为金融服务的主要通道。虽然这些基础设施的铺设决策往往也与商业可持续性和政府决策有关。通过它提供的服务快捷、成本低、品种丰富，适合各种不同的需求，可以为居住分散、需求额度小的农村家庭提供低价的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无疑可以把金融服务送达一下边远的地区。

当然，数字化普惠金融也不可能消除掉全部的差距。在商业可持续性的约束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也不可能做得村村平等，贫困地区的地理、需求规模同样阻碍当地具备获得和发达地区一样的服务。

对于贫困群体来说，基础设施服务的差异，更主要体现在区域差异。在个体层面的差异主要是贫困户自身特征，引起的差异。

2. 金融供给的地区差异

从规模经营和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考虑，金融供给方愿意为更多的客户提供服务。同样的，商业上的可持续性阻止金融机构对客户进行选择。首先金融机构必须对在什么地区提供服务进行选择，贫困村往往有很多因素，特别是总体规模小、居住分散、金融服务需求少、额度小等等，阻止贫困村成为金融机构的优先服务区域。

长期以来，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得以维持，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政治因素。实践已经证明，离开政治的因素，由市场自由发挥作用，金融要素会主动流向发达地区。扩大金融服务的地区之间的差距。农

信社原本就是一个政治和市场结合并综合发挥作用的金融服务机构。它成立的初衷就是为农村金融服务，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部分地区的政治因素对信用社的影响减少，金融服务趋向于离开农村。

当然大部分地区的信用社坚守初始使命，始终以服务农村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因此形成了贫困地区金融服务非常单一的结果，目前主要是农村信用社为主，部分地区有邮储银行和农行（如图 22，融资服务主要集中在农信社）。

3. 贫困户融资能力小

贫困户的一些特征，造成其融资能力小。其中有金融体系的原因，也有农户自身长期积累的原因。

首先，抵押物和信用记录不足导致贫困片区的农户借贷额度小，而且有能力使用贷款的农户比例不高，其中贫困申请贷款的比例更低，额度更小。在内蒙古和黑龙江 1752 个受访者中，有 426 人表示在过去一年家里申请了贷款，占 24.3%。在申请贷款的农户中有 81 户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占样本中贫困户的 19.4%。对应的非贫困户则有 25.8% 申请了贷款。贫困户申请贷款的比例明显低于非贫困户。申请贷款的差异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家庭的生产经营能力、金融能力以及对金融机构的信任程度等。

其次，生产经营能力的高低，常常反映在生产性借款方面。调查的结果证明了生产性借款是贫困地区农户融资的主要目的。样本户均申请借款总额 24348 元，而生产性借款户均为 14181 元，占 58%。当然不是所有的农户都借款进行生产。具有生产性借款的农户只占样本

22%。与贷款申请情况相似，只有 16.5%贫困户有生产性借款，而非贫困户中达 23.7%。借款额度差有显著差异，贫困户平均借贷 35463 元，非贫困户 53403 元。在房屋建设借款方面，贫困户的借款而定也低于非贫困户。首先，在贫困户中能借到贷款的只有 3.1%而非贫困户有 5.9%。户均贷款额的有差距，贫困户贫困均建房借款额为户均 35923 元，非贫困户为 56991 元。

第三，值得关注的是，贫困户在民间借贷方面，其借贷的机会似乎和非贫困没有太大的差异。在许多人眼里，贫困户是没有信用的，不容易借贷贷款。但是在大兴安岭南麓特连片特困区，从民间借款的人数比例来看，没有明显的贫富差异，分别是 29.4%和 29.0%。但是贫困借贷额度低于非贫困户，分别是 49227 元/户和 34686 元/户。

4. 贫困户缺乏自身的动力

调研中，通过对比建档立卡贫困户与非建档立卡贫困户参加金融教育培训的情况可见，参加培训的农民比例分别为 3.84%和 10.41%。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及较贫困的状态伴随而来的是较低的金融培训意愿，较少的金融培训会影响其金融能力的提升。而非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情况则乐观得多。

除了培训之外，贫困群体中主动从其他途径获得金融知识的比例也是比较少。向亲友请教是一个常见的学习方法，但是贫困人群中，只有 10.1%主动从他们的亲友学习金融知识，而非贫困户有 12.5%愿意这样去做。如表 30 所示，除了电视和其他途径，贫困户通过其他渠道去学习金融知识的比例都比较小。

这些数据都说明贫困人群在获得金融知识方面具有一定的惰性。对是否希望参加进入培训的态度也可以说明这个观点，只有 8.9% 贫困户表示会参加未来半年内的金融培训培训。相对应的非贫困户 14.5% 愿意参加。

这种缺乏自身学习的动力，导致了金融知识的缺乏。表 31 中是贫困人群和非贫困人群的金融知识对照表，在贫困人群中，了解各种金融知识的比例都低于非贫困户。

表 30 金融知识获得途径对照表

获取金融知识途径	贫困户		非贫困户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阅读传单	88	21.1%	367	27.5%
集中培训/讲解	17	4.1%	121	9.1%
观看电视节目	272	65.2%	822	61.6%
一对一指导	7	1.7%	28	2.1%
手机短信	12	2.9%	102	7.6%
微信帖子	8	1.9%	55	4.1%
其它	69	16.5%	177	13.3%
总户数	417		1335	

表 31 金融知识对照表

金融知识	贫困户		非贫困户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如何区分假币	293	70.3%	1033	77.4%
征信	18	4.3%	104	7.8%
如何计算存款、贷款利息	51	12.2%	186	13.9%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的使用方法	14	3.4%	116	8.7%
ATM机、POS机的使用程序	34	8.2%	194	14.5%
到银行类机构贷款的程序	22	5.3%	96	7.2%
受理银行卡支付	11	2.6%	44	3.3%
信用卡使用方法	11	2.6%	38	2.8%
保险	14	3.4%	45	3.4%
期货	1	0.2%	3	0.2%
股票	1	0.2%	2	0.1%
其他	79	18.9%	144	10.8%
总样本数	417		1335	

5. 贫困户面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挑战

数字普惠金融有多种形式，目前最普遍使用的是通过手机和互联网获得金融服务。因此是否拥有智能手机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表 32 显示，在手机拥有方面，贫困人群和非贫困人群没有明显的差异。但是，手机类型上，贫困人群的手机中只有 31.9%是智能手机，而非贫困人群的手机有 61.8%是智能手机，两者相差一倍。其他数字设备例如电脑和无线网也有类似情况。

数字设备的差距不但在短期内直接影响贫困人群使用数字金融产品，从长期看，会影响他们在数字信息的积累，影响他们的信用记

录。从表 33 看出，贫困人群在网上购物、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的使用方面，均落后于非百科人群。信用体系作为一种基础设施，传统金融机构由于信息获得性的困难，其信用体系都是建立在其所掌握的用户信息，对于没有使用过金融服务的贫困户往往没有记录。即使是目前突飞猛进发展的数字普惠金融，其数据也是建立在用户的信息上，由于它包含了更广泛的信息，包括购物、电话、社交和其他活动的信息，使应用系统包含的人群更广泛，扩大到传统金融没有覆盖到的人群。但是，数字普惠金融完全依赖于对数字产品的使用，对于贫困群体来说，其消费、经济和社交活动不一定以数字产品作为平台，在数字系统中没有他们的记录。因此，建立在数字技术上的信用体系，也不一定能覆盖到贫困群体。

表 32 数字设备持有情况对照表

数字设备		贫困户		非贫困户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手机	有	386	92.6%	1225	91.8%
	无	31	7.4%	110	8.2%
	合计	417		1335	
手机类型	智能	123	31.9%	757	61.8%
	非智能	263	68.1%	468	38.2%
	合计	386		1225	
电脑	有	63	15.1%	468	35.1%
	无	354	84.9%	867	64.9%
	合计	417		1335	
无线网络	有	73	17.5%	517	38.7%
	无	344	82.5%	818	61.3%
	合计	417		1335	

表 33 数字产品的使用对照表

数字产品		贫困户		非贫困户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网上购物	有	20	4.8%	185	13.9%
	无	397	95.2%	1150	86.1%
	合计	417		1335	
手机银行	有	17	13.8%	130	17.2%
	无	106	86.2%	627	82.8%
	合计	123		757	
网上银行	有	20	4.8%	116	8.7%
	无	397	95.2%	1219	91.3%
	合计	417		1335	

六、 结论与建议

普惠金融可以成为当前扶贫的一个重要手段，金融扶贫已经成为国家扶贫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各大金融机构纷纷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或相应部门，非传统金融机构，例如蚂蚁金服、微信支付等等，利用及技术优势，迅速占领消费群体中的中高端客户。然而，无论是传统或者是非传统金融机构，在大兴安岭南麓贫连片特困区这样的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其服务的覆盖面和穿透力都不足，形成了少数金融机构特别是有政策使命的金融机构寡头垄断的局面。

长期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化加速，大多数金融机构具有向城市聚集的趋势。为了平衡发展，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

保持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逐渐形成了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依赖政府的局面。由于政府具体提高公共产品的特性，在贫困地区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金融基础设施网络，例如每个乡镇都会保留有至少一个银行的分支机构，每个村都要设有金融综合服务站（中心）等。特别是政府在发放政府补贴和养老等过程中，采用了电子支付的措施，大大地提高了银行账号的拥有率。

分析发现，相对于金融基础设施，贫困地区的金融能力比较滞后，是当前金融扶贫的一个瓶颈因素。造成金融能力滞后的局部，和我国的政府的政策导向、教育体制、金融机构的垄断性、农村金融消费者的生产能力和对金融服务的态度都有密切的关系。

除了一些外在的因素，例如金融体系、金融风险控制方法、区域性的金融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差别，贫困户存在一些内在的因素导致他们不能有效地利用金融服务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分析发现，贫困户由于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限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少，额度小。加上自身的主动性不足，拉大了使用金融服务的差距。特别是在数字化的背景下，贫困户面临着新的挑战。

分析的结果使我们相信，通过金融教育，增加贫困地区居民特别是贫困的金融能力，的确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扶贫措施。根据调查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调查数据证明，在经济和金融知识在正规教育中缺失、针对性培训少的情况下，人们主要从电视、宣传材料、培训、手机短信、微信帖子等途径获得金融知识。尤其是培训、手机和微信，已经成为了比

较有效的普惠金融能力提高的重要途径。分析也发现，金融能力的提高，可以增加金融服务的需求和使用，由此改善生活条件。

本报告提升金融能力建设的对策建议是基于改善外部环境，促使农民金融能力的提高。对策包括消费者自身的金融素养、对金融服务的态度、金融行为等内部因素，也包括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教育等外部因素。

1、增加农村教育投入，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水平与农民金融能力密切相关。受教育水平越高，金融能力越强。通过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尤其是增加农民的金融知识，可以提高农民金融能力，增强农民对风险的管理能力，从而提高农民金融活动参与率。

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教育水平存在相关性，“扶贫先扶智”决定了教育扶贫的基础性地位。首先，消除贫困，当地政府应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当地教育教学水平。其次，金融机构应发挥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合理安排信贷资金，加强银政合作，创新金融服务，助力农村教育和扶贫工程的开展。最后，政府在政策上为金融机构支持教育扶贫保驾护航，比如可考虑采取对片区金融机构实行差别税率政策等政策，创造金融支持教育扶贫的良好条件。

贫困地区教育的现实发展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息息相关，只有基于不断发展的教育，提高贫困地区整体教育水平，形成依靠教育的扶贫。

2、加快金融教育发展，提升金融能力

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金融知识的掌握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金融教育是获取金融能力的前提、内在因素，对金融能力的提高至关重要。金融教育对于普及金融知识、提高金融技能以及提升金融素养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需要从福利模式转型到能力模式，通过金融教育提高其金融能力，以确保低收入家庭可以获得合适的产品和服务。

一是加大金融培训力度，满足农户金融需求。农户的金融教育水平受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影响，令人惊喜的是，虽然目前农户金融知识十分欠缺，但是他们对学习金融知识的热情、提高金融受教育水平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调查未来6个月是否有兴趣参加金融知识培训一题显示，28.94%的农户不会参加，11.76%的农户不知道会不会参加，愿意参加学习培训的农户达59.3%。农户主观参与意愿是提高农户金融教育水平的内在因素，近60%的意愿参与比例说明农户主观上接受金融教育的意愿是强烈的（见图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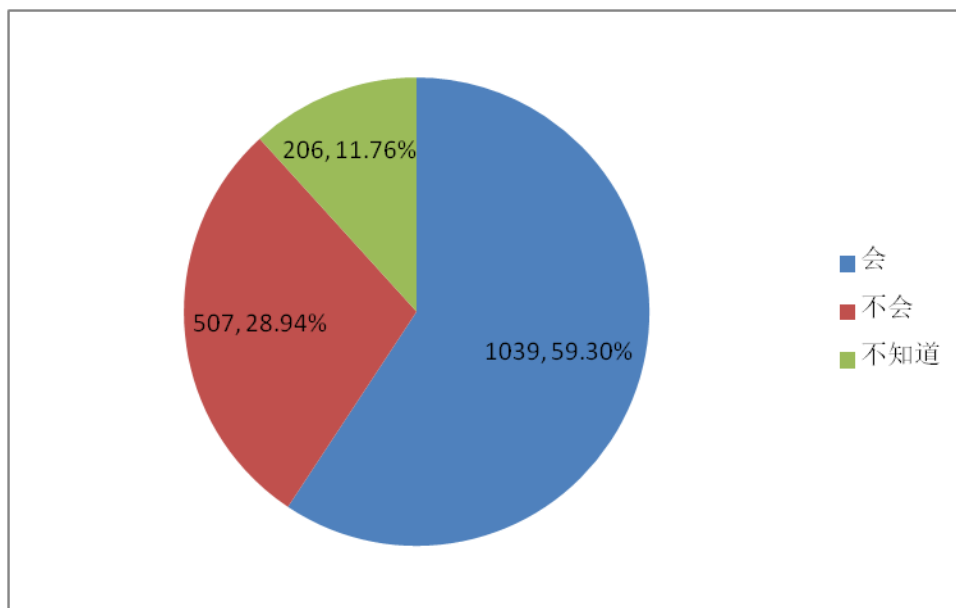


图 72 如果未来 6 月内有关于金融知识的培训，是否会参加

农户对贷款及其注意事项、怎样预防电信诈骗、如何识别假币、有关贷款及其注意事项方面需求最为突出。对如何使用 ATM 机、如何使用手机银行等操作知识也很关心（见图 73）。良好的金融环境、金融教育支持有利于农户金融教育水平的提高，应加大金融培训力度，满足农户金融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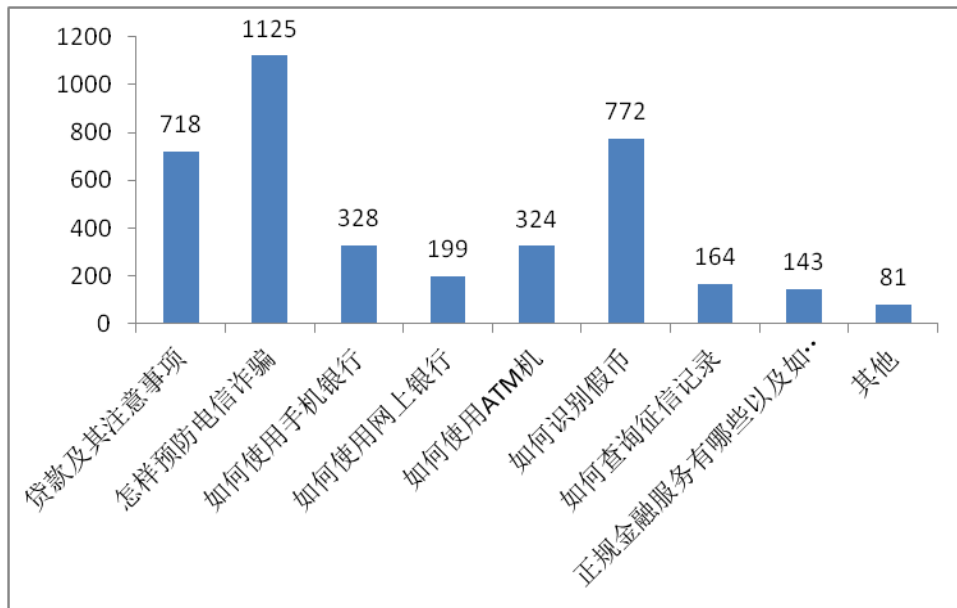


图 73 最想了解金融知识

二是扩大金融知识普及的深度和广度，形成农村金融教育的长效机制。农村金融教育首先要做好金融知识的普及，向农民普及基本金融常识，同时将金融知识普及的典型经验和服务模式进行标准化、规范化，在片区做好推广。向农民群众宣讲农村金融知识，让农民了解金融知识，提高金融素养，运用金融产品，进而借助金融资源，获取金融福利。

持续提升金融知识普通的深度和广度，构建“金融惠民工程”开展的长效机制。扩大“金惠工程”中学生项目的覆盖面，片区要利用

中学生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集中学习的时间，帮助学生接受较为系统、规范的金融基础知识教育，掌握必要的现代金融工具使用能力，并以此带动整个家庭金融素养的提升和获得享受更多金融服务的能力。在片区农村培养金融知识宣传队伍和志愿者，利用当地金融机构了解农民、熟悉农民需求的优势，通过开展农村金融知识大讲堂、现场演示农民感兴趣的金融业务流程等多种贴近农民的形式，帮助其更深入地了解金融产品和服务，并提升金融能力，使农民、农村和农业真正享受到便利的金融服务。

案例集

案例一：“两权抵押贷款”成效显著

内蒙古兴安盟地区的“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在乌兰浩特和扎赉特旗展开。截止 2017 年 5 月末，扎赉特旗土地抵押贷款余额 111554 万元，比年初增加 10994 万元；2016 年以来累计投放 130574 万元，累计投放 35165 笔。本年累计投放 14070 万元，累计投放 4506 笔。五月份，扎赉特旗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3802 万元，期限为一年期限，平均利率 7.95%，最高利率 11.4%，现余额为 111554 万元，发放对象全部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牧民。扎赉特旗两权抵押贷款规模占内蒙古自治区的 80%。扎赉特旗的信用体系建设，特别是信用村建设，走在全自治区前列。

在调研中发现，扎赉特旗农民无论是对贷款等金融知识的认知还是生活水平都明显好于周边县旗。

案例二：突泉县的种粮大户

受访人兰丽丹，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杜尔集镇保安村人。

1. 基本情况：受访人性别女，年龄 37 岁。教育程度为初中，家有二名子女，均为在校学生。家庭住宅面积达到 100 平方米，承包农田 3000 亩，属于种粮大户。农业收入达到 70 万元，如此大额的农业收入，收到收入的方式仍然主要为现金，该农户未投保农业保险，目前农业贷款数量为 250,000.00 元，获得贷款的方式为农户

联保，贷款申请下来很快，如果银行能为她带来更多公司或企业的买家，愿意支付手续费。在调研中发现，该位农民对金融知识了解较多，而且也有兴趣了解更多专业的金融服务的情况。

2. 简要结论：（1）农业政策扶持力度大，种粮大户生产积极性较高。据调研，在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农业综合直补为 72 元/亩，粮食差价补贴为 209 元/亩，灾补为 109 元/亩。（2）农户保险意识较弱。（3）经济水平越高的农户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年教育支出为 2 万元。

案例三：以“物权公司”为依托 盘活农村金融资产

吉林省龙井市作为国家级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和我省农村土地收益保证贷款试点县（市），坚持把农村物权融资作为破解“三农”融资问题的突破口。

在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农民现有的土地、林地等主要资产未能纳入商业银行现行的贷款担保抵押物范围之内。为改变这一现状，龙井市成立了“物权融资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该“物权公司”为平台，在农民和银行之间搭建起金融业务纽带，为农村金融综合改革找到了切入点。一是物权公司担保。将银行暂时不予受理的土地经营权、果树经营权转至物权公司，物权公司接收后向银行出具贷款保证承诺书，农民再依照相关程序向银行取得贷款。二是土地收益补损。由物权公司注资 50 万元、省金融办划拨 280 万元、专业农场自筹 1250 万元，共同成立风险基金。出现贷款违约时，首先按照规定程序使用风险基金代偿贷

款，随后由物权公司与土地流转市场对接，将相关经营权挂牌转让，获得收益划归风险基金，盈余部分退还贷款人。三是创新土地流转模式。为实现整村土地外包经营，推出了“承包地+册外地”的土地流转模式，在逐一核实原承包户的土地面积、流转费支付情况后，由村委会统一与物权公司签订土地流转合同。若原承包户提出终止合同，只能要求撤回承包地，册外地属于集体土地，原承包户无权索要册外地流转费。

依托物权公司发展物权融资，拓宽了农村融资渠道、加快了农业集约化经营，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方面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案例四：吉林省财政积极支持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

近两年，吉林省财政厅紧紧围绕支持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2016年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一是鼓励县域金融机构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放。共给予32个县市的87家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资金1.9亿元，给予20家符合补贴条件的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定向费用补贴资金1.3亿元。

二是支持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累计给44个新设的农村金融机构和在县乡设立的营业网点补助资金660万元。

三是继续加大对农业保险工作的财政投入。全面提高种植业保险保障水平。将种植业保险的保障水平由原来的玉米3000元/公顷、水稻4000元/公顷、大豆2500元/公顷、花生2000元/公顷、

葵花籽 2000 元/公顷，统一调整为玉米 4200 元/公顷、水稻 5200 元/公顷、大豆 3000 元/公顷、花生 2500/公顷、葵花籽 2500/公顷。同时取消了产粮大县玉米、水稻县级财政保费补贴支出。上述两项增加财政支出 1.5 亿元。

四是继续支持吉林省农业信贷担保公司发展。2016 年省财政又为省农业信贷担保公司注入资本金 12.3 亿元。

2017 年在继续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时，吉林省财政厅将继续按照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着重在农村基础金融、物权增信、信用信息三大支柱以及农村综合产权交易市场建设方面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网点建设，增强广大农民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

案例五：九台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丰硕成果

2011 年 12 月 12 日，九台区成功被国家批复为全国 6 个，吉林省唯一的农村金融改革实验区。经过 5 年的改革试验，初步构建了“支农发展、助农增收、农银双赢”的体制机制，有效解决了农村资金外流、贷款难、服务不优等难题，改革试验取得丰硕成果。

优化资源配置，扩大服务半径，实现了互利共赢。自试验区成立以来，金融机构的网点数由 2012 年的 88 个增加到现在的 152 个，铺设和安装的 ATM 机达到 424 台，pos 机 7340 部，助农小额提现电话 375 部，用于扶持本地经济发展的贷款额度同比 2012 年增加了 118 亿元，有效地扩大了金融服务“三农”的覆盖面。各金融机构以方便、灵活、快捷的方式服务“三农”、服务小微企业、服务

地方经济，既降低了农民的存贷成本，也使金融机构增加了自身效益。

创新金融产品，提升服务效能，有效破解了农民贷款难问题。在推进试验项目的同时，带动金融机构发展创新金融新产品。九台龙嘉村镇银行积极创新贷款产品，成功打造了适合自身发展的“苗木花卉经营贷款”、“种子化肥经营贷款”、“农民合作社贷款”、“粮食收储贷款”等四大金融产品，开展了小微企业贷款、个人经营贷款等业务；九台农商行积极推动农村金融创新，先后开发了“贷易达”、“仓贷通”、“银企通”、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等信贷品种；邮储银行九台支行新推出了二手房贷款项目、信誉贷款、经营商铺小经营者贷款、农户联保贷款、粮烟农小额贷款、商户联保贷款、商务抵押贷款以及装修、购车等综合性消费贷款等信贷品种；建行九台支行新推出了小微企业“质保通”、小微企业“信用贷-善融贷”、“医贷通”、核心贷和商联融等信贷产品；农行九台支行新推出了农户小额贷款、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企业流动资金贷款项目、住房按揭贷款等信贷产品；中国银行九台支行新推出了涉农企业贷款、农户苗木种植贷“行业协会推荐+三户联保”等信贷产品。在金融机构推出的新金融产品运作三年中，累计为农民增加贷款 105 亿元。2016 年，以试验区为平台又新增了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验项目，现已开展 15 笔发放贷款 126 万元。截止目前，创新信贷产品已累计为“三农”及中小微企业发展投放贷款 350 亿元。

案例六：黑龙江省富裕县建成 100 个电子商务乡村服务网点

富裕县是国家级首批“电子商务进农村”项目试点县之一。乡村电商服务网点，基本覆盖了全县 10 个乡镇和 80% 以上的行政村。80 个乡村服务网点免费安装 POS 机等设备，满足村民电子结算和转账、汇款、取现的需要，同时能够为村民提供网上缴费、网上购票等多项便民服务。为 100 个乡村服务网点开通 4G 网络优惠进电商网点活动，保障了电商网点的运营需要。带动了农村物流业的发展和神州卖买提合作，神州卖买提公司出资 5000 万元，在富裕县农村设 100 个电商网点，由富裕县农业银行设置“智付通”终端，对 89 家布放了服务终端，62 家已开展了金融服务。代理培训 20 名学员，设立了电商平台，基础工作到位。每个乡镇有示范村，大学生村官包扶指导，开展电商业务。一年来，电商发展较快，城里和乡镇快递物流发展迅速，贫困乡村多数还为空白。支付和结算渠道不畅，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还未解决。试点强力推进，发展势头良好。外出务工农民和经商商户对电商和金融服务需求及消费需求旺盛。

案例七：农村金融的边缘人

受访者乙，性别男，年龄约 65 岁，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子女生活不富裕，生活中依靠子女不多，无稳定经济来源，生活主要凭借 60 岁以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 70 元/月和土地外包租金 7000-8000 元维持生计，该受访者的银行卡主要用于领取社会养老金和直补，补贴发放后，需要用钱时再去取，不会立即取出，不会使用上述银行卡的其他金融服务，没有存款，不了解网络金融服务，所有银行

业务均需要通过柜台办理，没有智能手机，看病买药成为家中最主要的花销。家中尚有两三千元因生病向亲友借的款未还清，目前无其他借款需求。受访者乙的状况在目前农村留守居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案例八：佳木斯中支引导金融机构建立“1+2+3”工作机制，精准扶贫见实效

2016年，佳木斯市中心支行引导金融机构建立“1+2+3”工作机制，精准扶贫见实效。创新推出了“公农商”扶贫贷、“双保双增”扶贫贷等信贷产品，有效带动了辖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取得初步成效。成立一个组织，统筹全市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建立二项机制，强化扶贫任务的落实与督导。一是建立金融精准扶贫网格化管理机制。二是建立金融精准扶贫专项督导机制。抓好三大重点，联动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工作。一是精准对接金融服务。二是精准摸底金融需求。三是精准创推信贷产品。

2016年，佳木斯市中心支行不断提升辖内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水平，取得了较好成效。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机制建设。2016年，佳木斯市中心支行继续加强与市消协的联系，在“3·15金融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提前沟通确定活动形式，组织全辖各金融机构开展好宣传活动。此外，还与市公安局加强沟通合作，于“5·15”打击经济犯罪宣传日受邀参与了市公安局在新玛特广场主办的以“防范风险 护航发展”为主题的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组成金融系统志愿者宣传队向市民普及金融维权法律知识。

大力推进金融知识普及工作。2016年金融消费者权益日活动期间，佳木斯市中心支行按照上级行部署，配合相关部门，组织全辖41家银、证、保金融机构开展了以“权利·责任·风险”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并对部分金融机构进行了现场督导，巡查了网点宣传、资料发放、解答咨询等情况，指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消费者教育、落实工作要求。2016年“金融知识普及月”宣传活动期间，佳木斯市中心支行组织辖内金融机构紧紧围绕活动主题，尤其是针对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门类特殊群体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活动。

此外，为创新金融消保工作宣传形式、增强宣传力度，佳木斯市中心支行还组织干部职工自编、自演制作了原创金融法治知识微电影《投诉有门》。该微电影是根据我中心支行受理的“银行要求兑换人出具残损币原因证明案”案例编辑而来。微电影时长5分钟，将案例进行了生动还原，通过7名职工的分角色演绎既普及了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人民币管理等法律知识，也突出了人民银行12363热线的积极作用。12月1日，佳木斯市中心支行通过微信公众号“佳话青春”发布了《投诉有门》，利用互联网向社会公众普及金融法治知识，有效扩大了宣传范围。

案例九：破解抵押担保难题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桦川实践

人行桦川县支行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加强试点工作的组织协调，完善试点工作机制，制定了《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操作手册》、《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办法》、《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办

理流程》等文件。目前，桦川县开办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有3家，占全县发放农户贷款金融机构的75%，2016年以来共计累放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45252万元。

人行桦川县支行认真贯彻落实上级行关于“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总体部署，通过组织召开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推进会、行长季度例会引导辖内各金融机构开办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已全面在全县开办，目前有四个相关信贷模式：一是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模式，桦川县农村信用社主办的以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的贷款业务；二是依托第三方担保公司担保的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模式，桦川邮储银行和佳木斯金成农村金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的贷款模式；三是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为辅助的贷款模式，桦川融兴村镇银行开办的“公、农、商”联保贷款，以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作辅助抵押的贷款业务。四是农村信用社开办的一年确权登记抵押，授信三年，循环使用的贷款模式。

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贷款试点工作，提高了县域金融机构开办“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全县农村金融产品创新；充分落实农村土地的用益物权，赋予了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提高了全县信贷资产质量，增强了承贷者诚信意识，有效降低了信贷风险，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多层次、多元化的“三农”金融服务需求。

案例十：甘南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案例

近几年，甘南县以县政府主导，多方联合，成立由县政府县长任组长、主管县长和人民银行行长为副组长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统筹协调小组，强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强金融服务基础设施投入。以信用信息为载体，以信用评级为手段，探索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有效方式，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农村信贷支持力度，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农村金融需求。积极倡导诚实守信的文明风尚，营造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努力构建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的长效机制，全面促进农村金融经济良性发展。

目前甘南县农户信用档案存量为 36207 户，评定信用农户数量为 34729 户，评定信用村 2 个，评定信用镇 1 个；采集农民专业合作社 151 户。2016 年个人信用报告查询为 4064 人（次），收费查询 212 人（次）；企业信用报告查询为 61 人（次）。2016 年，完成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等级系统自评统计工作。其中，AAA 级信用户 6084 户、AA 级信用户 29297 户、A 级信用户 593 户、A 级以下 233 户；AAA 级农民专业合作社 3 个、AA 级 7 个、A 级 7 个、A 级以下 10 个。自从“县域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上线以来，运行良好，甘南县中小企业信用采集 150 户，现录入 120 户。

通过信用评级使更多的有信誉的农户获得信贷资金支持，2017 年甘南农商行对信誉农户发放信贷资金累计 16242 万元，满足了农户的信贷需求。